

当 代 外 语 教 育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主编 李渝凤

(第六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外语教育 · 6 / 李渝凤主编 .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 2021.11

ISBN 978-7-119-12948-8

I . ①当… II . ①李… III .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 ①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50560 号

出版策划：王京强

责任编辑：施化敏

当代外语教育 · 第六辑

主编：李渝凤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网 址：<http://www.flp.com.cn>

电 话：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996179 (编辑部)

印 刷：北京东方宝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0.5 字数：280 千字

版 次：202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9-12948-8

定 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外语教育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顾问 (按姓氏音序排列)

申丹 (北京大学)

石坚 (四川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宁 (清华大学)

编委会主任 熊沐清

编委会副主任 杨学前

编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章云 (北京外国语大学)

封宗信 (清华大学)

胡安江 (四川外国语大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李渝凤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刘锋 (北京大学)

刘玉红 (广西师范大学)

刘志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正光 (湖南大学)

乔国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俊菊 (山东大学)

温宾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文旭 (西南大学)

熊沐清 (四川外国语大学)

闫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杨学前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杨毅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主编 李渝凤

执行主编 杨学前

常务副主编 符长青

编辑部主任 孙博

编务 唐珍珍 黎凝

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教育路 178 号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 571321

电子信箱: ddwyjy@hncfs.edu.cn; flvedu69@163.com

内容提要

《当代外语教育》是一部紧密追踪世界外语教育教学研究动态，全面反映中国外语教育和外语职业教育研究最新成果的学术性文集，其目的在于开展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对话，推动和促进国内的外语教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外语教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目 录

名家特稿

“激起一种活力和意识”：谈文化强国战略下的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 … 许庆红 (1)

专家笔谈

整合融通——语言学研究中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汪少华 (14)

外语教学

外国文学教学之“知”“思”“实”“虚” 陈小红 邓楠秀 (18)

翻译能力培养视域下的 MTI 课堂教学原则及其运用 周淑娟 (26)

外语教师批判性思维品质与课堂有效教学的相关性研究 符祝芹 蔡莉 (34)

将思政教育融入商务英语阅读教学的探索 唐珍珍 (44)

语言研究

中美疫情新闻报道的言据性对比研究 薛亚红 卢亚楠 (51)

中国学习者朗读英语定语从句调群切分偏误研究 唐颖 张丽娜 (62)

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附加疑问句语调特征研究 周晓凤 杨迪 (72)

越文化中的概念隐喻研究——以《越绝书》为例 王敏 (81)

文学研究

文本的自我指涉与审美潜势——威廉·加斯的文学语言观 孙明明 (94)

- 爱伦·坡《一桶白葡萄酒》对话中的话轮控制策略 曹峻峰 陈明芳 (103)
《别名格蕾丝》中女性身体叙事与身份焦虑 王艳蓉 (112)

翻译研究

- 关于翻译专业本科“通用型”与“专业型”人才培养的思考
王贊 张政 (118)
俄罗斯培养译员的专家模式及其启示 王晓阳 (128)

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

- 柬埔寨民间文学中的华侨形象 陈俊源 (136)
《金云翘传》主要中文译本的比较研究
——以节选“第 655 句—755 句”为例 朱斯 (142)

书评与动态

- 《口腔医学语言的学习——学科语料库在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评介
肖庚生 姜会敏 (155)

Contents

“To Generate a Sense of Vitality and Awareness”: Foreign Literature/Culture Education with Its Strategic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Socialist Culture	XU Qinghong (1)
Integration — The Running Water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Linguistic Studies.....	WANG Shaohua (14)
Highlighting “Knowledge” “Thinking” “Concrete Matters” and “Schematic Things” in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CHEN Xiaohong DENG Nanxiu (18)
MTI Classroom Teaching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ZHOU Shujuan (2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L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FU Zhuqin CAI Li (34)
An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Business English Reading</i>	TANG Zhenzhen (44)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videntiality in China and America’s News Reports on Epidemic Situation Update	XUE Yahong LU Yanan (51)
A Study on Chinese Learners’ Tonality Errors of English Attributive Clauses	TANG Ying ZHANG Lina (62)
Intonation Patterns of Tag Questions of Chinese Northeastern EFL Learners	ZHOU Xiaofeng YANG Di (72)
The Stud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Yue Culture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i>The Glory of Yue</i>	WANG Min (81)
The Self-referentiality and Aesthetic Potentiality of Text: William Gass’s View on Literary Language	SUN Mingming (94)
The Use of Turn-Control Strategies in the Dialogues from <i>The Cask of Amontillado</i>	CAO Junfeng CHEN Mingfang (103)

Female Body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xiety in <i>Alias Grace</i>	WANG Yanrong (112)
On the “Universal” and “Voc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Bachel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ANG Yun ZHANG Zheng (118)
The Specialty Model of Training Translators in Russia and Its Reference Value	WANG Xiaoyang (128)
The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n Folk Literature	CHEN Junyuan (136)
Comparison of the Ma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n the Vietnamese Classic <i>Kim Van Kieu Truyen</i>	— Take the Excerpt from “Sentence 655-Sentence 755” as an Example	ZHU Si (142)
A Review of <i>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ntistry: Disciplinary Corpora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i>	XIAO Gengsheng JIANG Huimin (155)

“激起一种活力和意识”：谈文化强国战略下的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

许庆红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1699)

摘要：近二十年来，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作为外语学科的核心素养课程，一直处于相对低迷的发展态势，“教什么”和“如何教”始终是困扰外语教师的教学难题。本文借鉴爱德华·霍尔 (Edward T. Hall) 提出的“激起一种活力和意识”这一观点，从学习外国文化的最佳理由来探讨文学 / 文化教育的内容选择与方式创新。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对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充分认识到其内在知识性与认知复杂性，建立起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契合关系，将思辨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融入知识的传授之中。教师角色应定位于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助产士”，学生则应有“意识”地参与教学过程，系统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增强文化自信，进而获得文化素养、人文精神与批判性思维上的综合提升。

关键词：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文化强国战略；内在性与复杂性；价值与意义

“To Generate a Sense of Vitality and Awareness”: Foreign Literature/Culture Education with Its Strategic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Socialist Culture

XU Qingho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foreign literature/culture education, as the core literacy course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has been underdeveloped. What to teach and how to teach has always been on the discussion tab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nt and ways of literature/culture education with the light of Edward T. Hall who suggested the best reason for exposing oneself to foreign culture was “to generate a kind of vitality and awareness”. With its strategic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realize the internal intellectuality

项目基金：本文系 2019 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共同体研究”（编号：AHSKZ2019D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许庆红，女，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

and cognitive complexity of foreign literature/culture education, establis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socialist culture, and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shaping of values into the teaching of complicated knowledge. Teachers should act as Socratic “midwives” of knowledge, while students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ith “awareness”,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nhanc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quire cultural literacy, humanistic spirit and cri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culture education;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socialist culture; the internality and complexity; values and meanings

1. 问题的再提出

近二十年来，随着人文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逐渐被边缘化，外语学科的地位亦渐趋没落，尤其是近年来，其处境更加艰难，既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也跟不上其它社会科学（如经济、商学、金融、法律等）的发展速度，甚至被视为受众狭小的冷门学科。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对当前外语学科发展境遇的成因做过有意义的探讨，并从工具性与人文性或通识性之争、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用主义的垄断、学科自身的“单一性”偏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效果不佳等角度给出了相应解释（张冲，2003；胡文仲、孙有中，2006；郭英剑，2019）。同时，学界在文学之“用”、文学课程设置等问题上的论争也持续了近二十年（虞建华，2002、2010、2013；殷企平，2002；张中载，2003；金衡山，2019），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无外乎强调文学的有用、文学的智性，具体观点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学界对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的定位长期存有偏差，导致其遭遇的困境更为深重。有学者指出，“曾几何时，中国大学中英语学科的文学课程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文学课程的萎缩成了普遍现象……文学课程的式微基本上已成事实”（金衡山，2020: 59）。可以说，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已陷入由被边缘化到弱势化的恶性循环，其专业发展严重滑坡。个中缘由，除了前文提及的外语学科乃至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势头没落，文学不及语言学的偏自然学科性与翻译的实用性也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另一个十分突出但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教育理念上的问题，即系统知识传授、思辨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三者间的脱钩。因此，如何实现三者间的融合，进而彰显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的价值与意义，需要不断摸索与实践。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迎来了实现赶超跨越的关键发展机遇，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的作用更加凸显，也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胡锦涛在 2011 年 10 月 18 日发表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讲话中首次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即“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战略”。而“国家文化软实力”指的就是文化建设、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直接关乎人的思想素质、道德修养与文化素养，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为响应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近年来外语学科频频推出改革举措，践行创新理念，其中不少主张直接指向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领域。2018年出台的《外国语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对文学课程教学作出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相较于2000年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主张，《国标》在回归英语专业人文学科属性上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查明建，2017: 24）。此外，在教育部2019年5月公布的“外国语文学”一级学科下，纳入了跨学科的发展理念与措施，其中包括“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新的交叉学科领域，拓宽了文学与文化学科的边界，体现了重新回归外语学科的本体性。面对新形势与新机遇，有着百余年悠久历史与半个世纪辉煌传统的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也要认真思考采取何种举措来应对学科困境，以有效的方式推动当下中国外语学科的发展、人文学科的振兴和社会科学文化的繁荣，为实现新时代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做出贡献。

2. 问题的新思考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为响应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如何将提升文化软实力落实到高等教育，尤其是外语学科范畴内的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的实践之中，这一问题需要作新的思考。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的关键在于寻找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以跨文化比较与对比的方式，建构起其与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的内在契合关系。因此，深化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改革还需回到本质问题——到底何谓文学？何谓文化？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如何通过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途径来理性看待文化差异并作客观对比？从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为我所用，进而增强文化自信，用中国的价值观塑造中国的世界观？

何谓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文学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其基本学术架构包括文类、流派、文学理论、批评理论等。从文类上来看，文学不仅有诗歌、戏剧和小说，还包括书信、日志、传记、政论文、历史和文学评论等；在文学流派方面，包括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学理论包含大量的文学术语——那些构成文学文本特征或构成作品“文学性”¹的要素；而批评理论则是从新批评到新历史主义等各种“主义”的大箩筐，它为理解文学提供视角，是进入文学文本阐释的重要通道。可见，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建构。正如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詹姆斯·安格尔（James Engell）给文学的界定，“文学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不啻于对人类经验

的全部文字记录……任何性质的文字，只要凭借才思而达到语言和智识交织的较高复杂程度，都可划归在文学范围内”（安格尔，2008: 4）。国内学者蒋承勇（2020: 71）在讨论文学的本质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文学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对人类活动和知识蕴含的无所不包的统摄性”。总体而言，上述关于“文学”的界定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知识的内在性，文学是对人类经验的呈现，具有知识的广度；二是认知的复杂性，文学是对人类经验的复杂呈现，具有认知的高度。

何谓文化？“文化”概念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周易》的《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人文”指的是一切文化活动及其产品。英语中的“文化”的拉丁词源意义是“培养”，意指文化是习得、形成与建构的。18世纪以来，“文化”概念的演化越来越宽泛，由18—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界定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Edward Burnett Tylor, 2016: 23），到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亚当森·霍贝尔的“一个学习行为模式的综合系统”（E. Adamson Hoebel, 1976: 6），又由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拓展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智力的和精神的”（Raymond Williams, 1989: 4）。同样，中国文化学者余秋雨将文化定义为“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余秋雨，2012: 6）。可以说，文化是真正包罗万象的，涉及“艺术、科学、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演变”（巴尔赞，2013: XIX）。由此可见，文化与文学相似，也是一个复杂的构成，诸多构成要素相互交叉、相互作用。

上述关于文学和文化的定义，彰显出在一个思想和文化的分裂程度愈加明显的世界里，外国文学/文化教育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尤其体现在将知识传授、思辨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三者串联为一体，最终起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增进对自身文化体系的了解，从而培育自己的灵魂。美国跨文化交际学奠基人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 1959: 53）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指出：“文化所隐藏之物远远超过其揭示之物。奇怪的是，它所隐藏之物对文化的参与者最为有效。多年的研究使我坚信，真正的工作不是理解外国文化，而是理解自己的文化；我也坚信，从研究外国文化中所能得到的不过是象征性的理解，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化体系的运行机制。学习外国文化的最佳理由是激起一种活力和意识——一种唯有当体验到文化的强烈对比和差异时才会产生的对生活的兴趣。”因此，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文化教育不应该被理解为可有可无的门面装饰，而应既回归自身，回归其知识体系或专业性，又超越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边界，走跨学科、跨文化路径，最终借由“跨”而抵达对中国文化观的深入理解，激发对文学/文化学习和研究的真正兴趣。

文学与文化课程均为知识性的课程，不仅要维系自身知识的内在性与专业性，还要领会时代精神及其蕴含价值的复杂性，要“适当地回到常识，同时兼及当代范式”，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历史研究”（陈众议，2020）。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将这两者与价值观培养融为一体，将价值塑造融入到知识传授与专业教育中，增加学生对文学 / 文化思想知识的深度，提高其思辨的强度，从而客观、理性地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首先，新时代文学 / 文化知识传授的关键在于更新知识，提升厚度，拓宽视野，走多元交叉的路径。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立足创新教师教育模式，注重课程内容不断更新，带动学习积极性。尽管文学与文化作为知识性课程，其本体性在于知识内涵的传授，如文学 / 文化史的框架、理论术语、思想潮流或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艺术家的个体经历、文学 / 文化表现的艺术或美学特征等，但在庞杂、固定的内容背后也隐藏着更多的“新”知识。就内容而言，文学 / 文化关注的是“世界”，是“现实”，包括政治理念、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作家个人情感等，由于“世界”与“现实”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而它所揭示的价值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重新评价。因此，文学 / 文化教育也要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已不再囿于文学审美主义的固有原则或坚守所谓的文学“本质主义”，不再无视与文学之外的众多学科之间存在交叉的客观事实，而是要走跨学科路径——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的互渗与对话，这也是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即便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学科分工愈加细致完善的条件下，“文学研究也依旧天然地、不可避免地具有学科内涵的包容性、知识生产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性”（蒋承勇，2020: 71）。

以外国文学为例，欲跟上新时代的研究趋势，其教学内容一方面要囊括传统架构上的外国文学史及经典作家作品，讲授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核心思想的发展脉络，说明思想潮流对文学所产生的塑形作用。例如，针对美国文学的教学，可将其置放于美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或者社会潮流中加以阐释，进而呈现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如帕灵顿在《美国思想的主流》中所提及的，美国文学研究目的在于考察美国思想的产生背景、争议点及其影响，而其研究方法是“选择了一条宽阔的道路，融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于一体，而不是狭窄的基于‘美文’的纯文学作品，主要研究内容放置于构成文学流派和运动发展的各种势力之中，它们形成了思想的体系，而文学的潮流最终是从中发展出来的”（金衡山，2018: 101）。美国文学与美国国家同步发展，从沿袭英国文学传统，到美国民族文学的形成和成长，再到美国现代性的巅峰时刻、战后美国文学的多元化景象，呈现

了美国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占据核心位置的思想潮流，如 17 世纪殖民时期的清教思想、18 世纪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与美国梦、19 世纪上半叶超验主义时期的文化自觉、19 世纪下半叶的机器工业时代与现实主义、20 世纪转型时期的进步主义与自然主义、20 世纪上半叶工业化、两次世界大战与现代主义、20 世纪下半叶的后工业时代与后现代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转向等等。这些“常识”是美国文学课程的必讲内容。

另一方面，要注重当下的意识形态环境，借助文学 / 文化来讲解意识形态问题，做到知识传授的更新，即不再限于对所谓主流作家或精英意识形态的讲解，而是要打破主流与边缘的界限，拓宽人文视界。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掀起多元文化思潮，即文化的多面化呈现——非裔美国文化、华裔美国文化、拉丁裔美国文化等。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得到拓展，呈现复杂多元的景象。加之文化研究的渗透，文学研究跨越了其自身的边界。仍以美国文学为例，“文化研究的渗透打破了纯文学研究的界限，而泛政治化的敏感则使美国文学价值判断的共识不再具有统一性”（金衡山，2018：108）。美国文学中呈现的阶级、族裔和性别等（文化）身份政治话语问题在美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也一直是热点议题，改变了 20 世纪主要研究所谓的主流思想脉络，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美国价值观的单一模式，跨越了族裔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美国文学思想的大一统价值体系，这一解构揭示了美国文学中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性，迈向了更加多元、激进的身份政治话语。

同样，对于西方文化课程，在对其源流和发展脉络作出系统性与专业性的梳理的基础上，要聚焦不同时期的核心思潮来展开分析，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民主理念、中世纪末期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7 世纪的科学精神与现代观念、18 世纪的启蒙思想与理性主义、19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革命与帝国意识、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其之后的全球化思潮。在具备了一定基础后，要上升到知识更新层面，讲授一些核心文化概念的意义变迁。比如，现代“人文主义”理念，广义上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关怀，强调人的主体性、个体尊严的价值取向，启蒙运动时期至 19 世纪的自由平等主张和自我价值体现等；而在狭义上，可以指 20 世纪 60、70 年代盛行于美国的教育理念——改变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过程中加剧的异化现象，以人的潜能发展为目标，塑造健全完整人格，最终获得自我实现，这一教育理念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具有适切性。对文化概念意义变迁的厘清，不仅帮助学生拓宽视野，也将相关知识盘活串联为一体。

另外，在近年美国逆全球化思潮的裹挟之下，民族——国家意识层面的文学与文化探讨被提升到新的层面。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渗透，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同时，在文化输出方面，与西方文化的输入相比，中国文化的输出做得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化失语”的问题。因此，文学 / 文化课程需要加强对作品的整体优选、新选，增加能够与中国思想文化进行比较的内容。比如美国文学方面，可以增加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美国文学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作家作品，或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美国文学思想等，找到契合点，多角度、多层次地比较与对比文化的异同点，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并在思想的碰撞下孕育中国的文化创新，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认同。

其次，新时代的文学 / 文化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强思辨强度，提炼价值观。

思想纷争、文化纷争、政治纷争异常活跃是当前时代的鲜明特征，“充满着深深的关切和忧虑，又有着它特有的躁动不安”（巴尔赞，2013: XXI）。而文学 / 文化教育涉及的大多是包括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问题，因此，其根本要落在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与价值观的塑造上，这就是霍尔在谈及“什么是文化”时所言及的“文化所隐藏之物”，也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指出的批判的目的，“批判不是挑出缺点加以改造。它是运用判断力辨别各种价值……（杜威，2015: 230）。另外，由于外国文学 / 文化蕴含的一些价值观念与中国文化的思想认知体系是不相适应，甚至矛盾的，这就需要避免唯西方马首是瞻或思维被西方思想同质化、一体化，要引导学生追根溯源，在认知西方文学文化的系统与结构基础上，找准中西文化的契合点或者差异处，在思考的基础上，理性、客观地判断孰优孰劣，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国的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以美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美国梦”主题为例，作为美国价值观的一个具体凝聚，“美国梦”是一个伴随美国诞生及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梦想。“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是带着所谓自由、平等、民主的梦想寻找新大陆。虽然在时代变迁中“美国梦”经受了诸多考验和质疑，由18世纪启蒙时代的正面性，到19世纪个人主义放浪形骸时期的膨胀，到20世纪之交的异化导致的负面性和虚幻性，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被解构，但其最初的个人成功与平等的核心理念依然比较稳定地支持着美国主流文化。美国清教思想文学作品中，以富兰克林的《自传》为典例，更是将美国梦内化成一种“美国精神”。不同于建立在个人成功与财富基础上的“美国梦”，深受集体主义影响的“中国梦”是个人梦想、社会梦想、国家梦想相融合的集体梦想，其实质是个人梦想与社会、国家梦想的协调一致和有机统一，有集体主义的内涵。虽然“美国梦”和“中国梦”也有共通性，都充分尊重个人梦想的基础性地位，发挥着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是美国梦彰显的过度个人主义体现了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平衡和文化的不包容。通过讲解，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领会“美国梦”在特定现实背景下的“虚幻性”，从而增强对于个

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理解，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理念在现代发展和运用中的优越性，进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再以西方文化涉及的政治和国家治理体系为例，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所谓超越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普适价值——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是不是都可以成功嫁接到其他国家？对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打开历史视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历经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思想等二三百年的影响，经过了漫长的摸索和演化过程，建立在其复杂的法律体系之上。就“自由”这一价值而言，虽然自由主义是美国自独立革命以来政治思想的传统，但在其半个多世纪以来讲究政治正确的语境里，个人的话语自由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限制的。再者，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治理体系事实上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和非洲，正是由于生硬嫁接欧美制度模式而最终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映出西方价值观的问题以及西方制度的不健全。与此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行推行其价值观的深层动机与破坏性后果。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推行违背了历史文化的轨迹，暴露出极大的不科学性，最终产生了排斥反应。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科学理性地思考复杂世界，不要对西方的价值观亦步亦趋，而是要进行反思性质疑，认识到不同国家应遵循符合自身实情的价值观与发展模式，任何一个制度都要平衡民主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治国政策进行对比，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所以，外国文学 / 文化就像一面敞开的窗口，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等多维人文景观。教师如能在课堂上传授这些知识，则可以激发学生们的人文“意识”，通过中外价值观比较，引导学生突破定势思维，对复杂世界做自觉的思考与理性的价值判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文化自信，激发倡导中国价值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 观点的新实践

在上述谈及“教什么”问题之后，“如何教”则是另一个问题。《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要立足创新教师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方式。传统的文学 / 文化课程教学方法仍依赖于教师的独角戏或填鸭式教学。以文学课程为例，其教学套路往往是介绍作家的生平经历、作品主题、风格特色（包含人物塑造、叙事视角和语言特点等）、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四大板块的内容；文化课程与之类似，即聚焦某一时期文化的框架、代表性人物和作品、文化产品的特点以及语境等板块。内容介绍面面俱到，教学效果往往却流于形式，学生浅尝辄止、转眼即忘。因此，文学 / 文化教育亟需在

教学方法上有所创新，使之符合学科特色。如前所述，文学 / 文化都是系统知识性的人文教育核心素养课程，蕴含着大量深刻的思想与智慧。如何最大效度地理解这一深刻性，需要在教师和学生双方主体上下功夫。当然，教材与辅助材料的选用问题同样影响课程的教授方式，限于篇幅局限，本文暂不做探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应对标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助产士”(midwife)。苏格拉底在和泰阿泰德对话时说他的“助产术”(midwifery)“关心的是灵魂的分娩”，是“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产生于幻想、错觉还是真知灼见”(Plato, 1997: 167)。可见，苏格拉底“助产”出来的东西是美好的、伟大的、高贵的。作为文学 / 文化教师，要走出知识灌输误区，不囿于照本宣科，采取步步引导的追问模式，激发学生思考。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将前文提到的文学版块如主题、叙事、人物塑造等植入文学文本的阅读。在讲解能引起大学生生活与情感共鸣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教师可以延伸拓展，以小见大，由表及里，以点带面。首先，教师可以以小见大。基于小说文本，引导学生通过细读发现其“反成长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有着怎样的成长困惑与内心挣扎？他具有怎样的个体品性？所处的社会又是怎样的？主人公与所处社会之间有着何种冲突？对主人公的态度有什么看法？如何理解作家的态度？继而针对“反成长小说”的要素提问：文本有着怎样的情节设置？作家如何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刻画形象？其次，教师可以由表及里。教师从文本延伸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战后物质主义与中产阶级的发展，加上杜鲁门主义、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等所导致的庸俗世道与精神危机，让同学们深入思考这一时期美国青年的反文化特质，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精神危机之下个体对独立价值的追求，从“反英雄”成为英雄，从社会的反叛者到社会的救赎者身份的转换。最后，教师可以以点带面。教师引导学生从以上主题、情节、人物、背景的讨论中提炼作品承载的人文思想——人如何在腐败颓废、唯利是图的世界守望天真与正直，做“麦田里的守望者”。由此可以体现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助产士”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做到有“意识”地参与。由于教师不再采取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就必须主动围绕课程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不间断的思考，表达自己对问题的发现与看法，就如霍尔所说的激起一种“意识”，或者如诺顿出版的《西方文明》编者所言的“让学生能够自己分析和阐释历史证据，从而成为历史工作的参与者”(Coffin, 2005: XXV)。只有形成有“意识”的“参与者”身份，才能使学生真正对课程的学习产生兴趣。以下是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的《美国文学选读》和《西方文化入门》两门课的具体实践。两门课程全程采用多元化的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方式，如展示、讨论、辩论、朗诵、表演、续写、改写、评论、读书报告等口头或笔头活动，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主体性，

在不断的沟通和交流中提高自身对文学 / 文化的掌握和理解能力。

课前的任务主要是要保证学生有充分的阅读量，比如细读一定页数的原文教材，并辅之以阅读相关文本，如文学作品的中译本、相关的历史文本，观看网络相关视频或者文学改编和相关文化内容的电影。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师布置的思考题进行思考，完成每次课的具体任务，如提出自己的问题、做 PPT 汇报等。比如，在讲霍桑的《红字》之前，为真正了解作品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可以布置学生观影《萨勒姆的女巫》。虽然该电影改编自美国 20 世纪的剧作家亚瑟·米勒 (Arthur Miller) 的《坩埚》 (The Crucible, 1953)，但是其背景却是基于 17 世纪驱巫案这一真实故事，导演只是运用话语再生产的方式影射相隔两个世纪的米勒时代的麦卡锡主义这一历史事件的荒谬和美国的冷战反共思维。通过完成这一课前任务，学生可以自觉地将政治事件与社会文化事件的知识进行串联，从而深刻了解一直没有褪去的源自宗教绝对观的思想，从而借助社会历史背景更好地理解作品共同的主题——折射丧失理性后的人性之暗。由此，学生的学习“意识”便可以得到激发。

在课堂活动设置方面，可在每次课要求一个 / 组学生做口头报告，将课前教师布置的宽泛题目窄化，聚焦到某一点来分享自己的理解以及发现的问题。教师将从材料查询、问题意识、内容创新、组织逻辑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对学生的口头报告予以评价，激励学生精心准备口头报告。比如，西方文化课上可以引入戏剧教育方法，采用个人或者小组短剧 (5—10 分钟) 的表演方式呈现某个知识点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在讲到哲学时，可以鼓励学生扮演中西哲学家并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如古希腊哲学时期孔子与苏格拉底关于教学方法的对话、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托马斯·阿奎那与新儒家关于理性思考论证信仰问题的对话、18 至 19 世纪哲学时期黑格尔与康德、叔本华与尼采之间的争辩等。课堂短剧的用意不在表演，而在于考察学生是否比较熟练地表达了所扮演人物的思想，而不是照读 PPT 内容来做课堂报告。此外，学生从中可以寻找到中西文化重要的契合点并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激发学习兴趣，主动思考中西文化的异同点，了解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这一方式也可以提升学生用外语表达较为复杂思想的能力。

在课后实践方面，可布置各式各样的写作任务，如文学课常见的文学作品赏析或更具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后者需要在写作前给予一些关于批评话语构成的学术训练，评论写作可以用来检验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以及学术写作等应用能力。此外，文学课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创作实践，常见的有诗歌翻译、小说改写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到文学的实践创新中。比如，笔者曾收到 2017 级英语文学班级和 2018 级文典文科实验班 13 份对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 (The Road Not Taken) 的译作，其中有七言绝句、离骚体和图形诗等近 10 种不同风格。

这里仅展示一篇 2017 级梅晴莉学生的习作：

殊 途

罗伯特·弗罗斯特

金秋密林展双路兮，恐维一路可择；
踌躇伫立良久兮，吾独游目乎此时也；
目随道之蜿蜒兮，道尽林之竣茂；
哀路之幽昧芜秽兮，无先人之踵武；
然则弥觉其缤纷兮，历殊途吾将行兮；
朝相羊于此双路兮，行踏空林落叶声；
路修远以多艰兮，恐漫漫无归期；
喟今吾以追往事兮，行迷且焉止息；
林开双路且各异兮，独行踽踽于殊途；
尔来决吾生！

虽然古典形式的翻译与原诗的现代主义形式出入较大，但可以看出学生对诗歌作品的理解、文本细节的关注以及翻译上所花的心思。另有学生颇具匠心地把这首诗歌的英文改写成另一首诗 “The Road Taken”。这反映出学生在文本“细读”上所做的努力。有的学生从“项链”的角度改写詹姆斯的《首饰》，既吻合詹姆斯善用叙事视角来呈现主题的写作技巧，又尝试了当下的“物叙事”。通过这些实践，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意识到，文学 / 文化的解读往往没有现成、固定的答案，各种发现与可能性都是建立在充分的阅读、思考与一定的想象力之上，如同托马斯·福斯特 (Thomas C. Foster) 在《如何像教授一样阅读文学》中告诉学生的，“阅读是一种想象的活动，这种想象不仅仅是作者的” (Forster, 2014: 27)。

文学 / 文化课程的考核形式多为撰写论文，包括平时的小论文和期末的大论文，按照不同比例计入期末总分。除了字数要求外，还要给出具体要求，如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的《美国文学阅读》与《西方文化入门》课程的考核要求包括：“一、自选题目要包括一个研究问题，表达要抢眼；二、观点的提炼要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三、阐释必须有具说服力的支撑材料（理论观点与文本细节）；四、自己的反思要有一定的质疑性；五、论文必须是议论性的，而不是介绍性的或者教材编写式的知识点归纳；六、写作要符合学术规范，文中得有引述，文后列出文献”。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做到，但这些要求无疑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与规范作用，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与评论写作能力，本身也是从“激起一种活力与意识”角度出发的做法。

4. 结语

在当今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和智性是最有效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和资源。人文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着个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文明思想的发展轨迹。外国文学 / 文化作为一门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知识性课程，教师若能在课堂上一方面做好“助产士”角色，注重系统知识传授及其方式，寓价值塑造和思辨能力培养于其中，另一方面激发出学生的参与意愿，就可以在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下，更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中国价值观塑造中国的世界观，加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对外吸引力，培养出有知识、有智性、有理性的人才。这便是中国当下外国文学 / 文化教育或是人文教育的根本所在。再次引用安格尔的一句话，“在最终的意义上，涉及人类的事务、动机和权力，只有依赖有关语言、文化、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知识，我们的判断才最可靠。如果没有这种对人类深层精神的知识，我们在政治或经济领域作出的判断虽然也可能有效，但肯定不会深入和充分，肯定少了些东西”（安格尔，2008: 9）。

注释：

1. “文学性”：这一概念由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提出，指的是“文学之学科的目标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让一个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见朱刚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参考文献：

- [1] Coffin, Judith G. & Robert C. Stacey. *Western Civilization*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 [2] Foster, Thomas C. *How to Read Literature Like a Professor* [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4.
- [3] Hall, Edward T. *The Silent Language*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9, 1981.
- [4] Hoebel, E. A. & Frost, E. L.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 [5] Plato. *Plato: Complete Works* [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6] 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M]. Volume 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16.
- [7] Williams, Raymond.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M]. London: Verso. 1989.
- [8] 陈众议. 让蝴蝶飞一会儿：新世纪外国文学与研究点乱. 中国作家网 , 2020.07.14.
- [9] 杜威. 杜威全集, 第五卷 [C]. 孙有中, 战晓峰, 查敏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
- [10] 郭英剑. 新中国英语专业教育七十年——历史考查与反思 [J]. 语言教育 , 2019(4): 2-18.
- [11] 胡锦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J]. 求是 , 2012(1): 3-7.
- [12] 胡文仲, 孙有中. 突出学科重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J]. 外语教

- 学与研究 , 2006(5): 243-247.
- [13] 蒋承勇 . 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 [J]. 外国文学研究 , 2020(3): 61-71.
- [14] 金衡山 . 边 : 美国 (文学) 研究的范式确立与转换及问题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4): 98-108.
- [15] 金衡山 . 人文教育、批判性思维与课程设置 : 《西方文明导论》课的实践与启示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19(1): 22-29.
- [16] 金衡山 . 规范与深入 : 文学导论课教学的要素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20(1): 59-66.
- [17] 雅克 · 巴尔赞 . 从黎明到衰落 : 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 1500 年至今 [M].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3.
- [18] 殷企平 . 文学何尝不实用 [J]. 郑州大学学报 , 2002(5): 8-9.
- [19] 虞建华 . 致知是一种最高的学习 [J]. 郑州大学学报 , 2002(5): 7-8.
- [20] 虞建华 . 谈我国高校英语专业 “两个走向” 问题 —— 兼及英美教学 [J]. 中国外语 , 2010(3): 14-18.
- [21] 虞建华 . 从外语专业文学教学看高等教育的 “用” 与 “知” [J]. 中南大学学报 , 2013(4): 205-209.
- [22] 余秋雨 . 何谓文化 [M].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12.
- [23] 查明建 . 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与人文课程的意义 —— 以《国标》人文课程为中心 [J]. 外国语言与文化 , 2017(1): 18-26.
- [24] 詹姆斯 · 安格尔 , 人文学科的重要性 : 主谈英语文学 [J]. 外国文学评论 , 2008(4): 3-11.
- [25] 张冲 , 关于英语专业定位的思考 [J]. 外语界 , 2003(4): 7-13.
- [26] 张中载 . 外语教育中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03(6): 53-57.

整合融通

——语言学研究中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汪少华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理论创新是各学科的生命线, 如何突破以往的研究范式, 并建立凸显本学科特色的理论体系, 不仅影响学科发展基石, 更关乎学科发展前景。就语言学学科而言, 如何在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创新, 是摆在广大语言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新文科驱动学科交叉、整合融通的研究

2019年, 新文科建设正式启动。根据教育部的部署, 全国高校在2019—2021年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新文科”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提出, 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 文理交叉, 即把新的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专业课程之中, 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跨学科的学习体验。“新文科”的提出, 顺应了科学发展的规律, 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一次新的互动与融合, 倡导运用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重新审视和阐释人文社科领域的传统问题。

进一步而言, “新文科”新在交叉融合, 至少包括3个方面, 即文理层面的交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相较之下, 文理交叉难度较大,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难度较小。因此, 在“新文科”的背景下, 语言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需顺势而为, 汇入“新文科”建设和改革的潮流之中, 以学科交叉、整合融通为主线, 推动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语言风格研究”(编号:18AYY022)和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的子课题“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编号:19ZDA3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少华,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和话语研究。

和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2. 整合融通需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研究创新的路径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整合融通。首先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人认为创新就是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或者在某一学科建立起一套全新概念的新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继承与创新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继承是基础，为创新提供前期准备；创新是发展，是继承的升华。科研创新要求在继承的同时敢于怀疑，善于扬弃，整合融通，探索创新。换言之，只有在充分消化并吸收以往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融会贯通，整合创新。笔者认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摸象的盲人”！不同学科、不同理论都只不过是提供给研究者从多元视角认识“大象”全貌的工具而已。在语言学领域，任何语言学理论都不是万能的，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语言问题。因此，认知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实际上，认知语言学并非一个语言学流派，而是一个集大成者。认知语言学兼容了基本观点一致的诸多学科，认为语言是认知的组成部分，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交际和功能等多维度的互动，认知语言学可运用认知科学的一切有益成果来解释语言现象。而认知科学本身也是多学科研究，涵盖了教育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

福科尼耶和特纳（Fauconnier & Turner）曾指出：我们一直强调创新源自于概念整合。但是，创新也依赖于长期被人们熟知和使用的心理结构。人类文化和人类思维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是源自于心理结构和现有观照的产物。同样，概念整合也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特征，通常运用输入空间、整合模框和固着于现有概念结构的类属空间，在支配原则的驱动下使合成空间朝着人类尺度结构的熟悉方向运行。因此，概念整合本身就固着于现存的实物，层创结构——概念上的和形式上的——均可通过概念整合在保守的整合网络中形成。

即使是新的理论体系的创建，也离不开对以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语言学领域架构理论（Framing Theory）的创建过程。21世纪初，认知语言学创始人、美国语言学家莱可夫（Lakoff）将架构语义学、社会学和传播学中的“架构”（Frame，曾译：框架）概念引入政治话语领域，并结合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创立了架构理论。架构理论的源头可追溯到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架构”概念，其发展演变与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Minsky）、美国语言学家、“架构语义学之父”菲尔莫尔（Fillmore）、美国学者恩特曼（Entman）等提出的架构概念均有关联。尽管各学科领域关于“架构”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解释不尽相同，但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孤

立，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语言学领域架构理论的发展轨迹体现出继承与创新、整合与融通的紧密关联和内在价值。

此外，在语言学领域，与架构概念类似的术语还有不少，比如域（domain）、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心理空间（mental space）等，那么架构与类似概念间究竟有何异同呢？综合科韦克斯（Kövecses）、福科尼耶和特纳的观点可知，意象图式、域、架构、心理空间均指说话者用来组织自己体验的一种概念结构，但是四者的图式化等级（schematic hierarchies）程度有所不同。意象图式的图式化程度最高，心理空间的图式化程度最低，概念最为丰富，域和框架介于二者之间。心理空间与语境相连，储存在工作记忆之中；意象图式、域和架构均储存在长时记忆之中；意象图式属于类似性结构，域、架构和心理空间是非类似性结构。换言之，四者之间是包含关系：意象图式包含域矩阵、域矩阵包含架构、架构包含心理空间。由此可见，从认知科学到认知语言学，再到架构理论的创建，都是整合融通的结晶。整合融通是语言学研究中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3. 语言学整合融通研究的具体路径

鉴于社会学科和人文科学的继承性，作为研究者必须广泛阅读相关学科已有的代表性文献，汲取其理论精髓，整合融通以往的概念和原理，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否则，研究者的所思所写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新时代，外语工作者也能有所作为，尤其是在语言服务、跨文化沟通、中国话语构建、中国文化的译介、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使语言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少走弯路、走得更远，孕育出更多、更有生命力的语言学理论创新的成果。

当然，创建新的语言学理论流派绝非易事，创建新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语言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可以在某些方面或者某个点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体而言，语言学可与其他学科整合融通，如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与神经科学、语言学与心理学、语言学与社会学、语言学与新闻传播学、语言学与计量学、语言学与政治学等；语言学内部不同研究方向也可整合融通，如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与话语研究、句法学与文学、生态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多模态与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内部不同研究方法的整合融通，如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内省法与实验法、语料库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等；国外的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实践、话语实践等

方面结合，即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话语理论的本土化等。具体而言，目前认知语言学可以整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神经科学中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脑电波（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脑磁图（MEG, magnetoencephalography）等技术原理。此外，参考语料库、计量学等学科的方法，也可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语言教学、话语研究、网络语言分析等多个方面。近 20 年来，笔者的研究方向从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探讨与应用转到架构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从认知语言学研究与应用转到话语研究，尝试运用语料库的方法研究美国政治话语中的架构与隐喻，整合认知语言学与话语研究理论、认知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莱可夫的架构理论本土化，应用于中国政治话语的阐释和建构研究之中。

总之，我们要以学科交叉、整合融通为主线，走出科研误区，在充分消化和吸收现有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多一双慧眼，发现以往理论的不足，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理论视角，在继承的同时力争创新。有了整合融通的源头活水，我们才能产出更多有生命力的成果，不断提升自己的科研素养。

外国文学教学之“知”“思”“实”“虚”

陈小红 邓楠秀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我国高等外语教育正迎来建设“新文科、大外语”的重要历史机遇,而文学教育作为文科建设的核心之一,需要结合新文科建设要求系统梳理教学模式。本文以英语专业开设的文学课程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学教育中的“知”“思”“实”“虚”。其中,“知”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外国风土人情、历史背景以及语言等,也指信息输入;“思”指思辨能力的培养;“实”是指文学教育的务实性,即立足本土,具有时效的特色教学;“虚”是指文学非“致用”特性,注重人文素养的养成。理想的文学教学应兼顾“知”“思”“实”“虚”等四个维度。

关键词: 文学教学; 思辨能力; 本土特色; 人文素养

Highlighting “Knowledge” “Thinking” “Concrete Matters” and “Schematic Things” in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CHEN Xiaohong DENG Nanxiu

Abstract: Literature teaching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constructing “New Liberal Arts,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 of higher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in China. Targeting English major literature courses, this paper has an insight into such four dimensions as “Knowledge” “Thinking” “Concrete Matters” and “Schematic Things”. “Knowledge” refers to the input of information, covering the exotic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history, language, etc. “Thinking” means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Concrete Matters” gives a stress on distinctive teaching deeply rooted in timelines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seemingly impractical “Schematic Things” is approximately relevant to humanistic quality in literature education.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dimens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shaping an ideal literature teaching model.

Key words: literature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humanistic quality

项目基金: 本文为 2016 年市属高校科研项目“‘垮掉一代’之中国因子”(编号: 120161056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小红, 女,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后, 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邓南秀, 女,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当前，我国高校“重语轻文”的现象较为普遍。师范类专业、翻译与国际商务等专业因其较强的实用性，可直接服务社会，故而成为热门。而文学教育则门可罗雀，以致文学“无用论”盛行。客观而言，我国高等教育逐渐注重专业的社会实际需要，侧重技能培训，这和目前社会需要甚至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但大学教育不应且不能等同于强调技能培训的职业技术教育。彼得·阿巴斯曾批评把“训练”和“教育”两词相提并论，“使它们的含义相互靠近，并将它们混为一谈”的行为（Abbs, 1994: 14）。他认为在培训机构里，“个人沦落为在传送带上移动并被填入有用知识和必要技能的、被动的容器。其结果……使学生产生了严重的惰性：反应迟钝，毫无主见——或者可以被描述成病态的倦怠”（Abbs, 1974: 2）。

大学教育不同于职业技术教育，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致用”，而大学教育应更侧重“致知”。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英文系所开设的课程中，语言能力课（相当于现在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课程）占总学分的比重不到16%，学生英语语言水平的提高，更多是通过诸如散文、英诗、西洋戏剧等其他课程来达成的。基于此，黄源深（2009）建议大幅度调整课程结构，语言技能课应控制在25%以下，文化知识课，包括语言学、文学、欧美文化等，比例应占60%左右，除哲学等个别课程外，一般用英语授课。虞建华（2013）也认为，像外国文学这类“看似无用”但通向“学以致知”广阔天地的课程，应成为外语教学的真正主干。

1. 文学教育之“知”

文学教育的“知”包括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两方面。经典阅读是学习语言的最好途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语言是语言最佳、最美、最多元的呈现，经典往往成为语言学习的典范，是本土外语学习者二语习得最重要的目的语语料。文学作品在语言技能培训中举足轻重，是外语学习最为厚重的部分，也是英语专业学生增强内力的主阵地。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外语教学更为注重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但如果缺乏丰富的知识积累，就仿佛习武只学招式却没有内力修为，最终只能是隔靴搔痒。

经典阅读是文学修养、语言学习的重要部分，浩瀚的文学作品仿佛大海之水取之不绝、用之不勤。文学作品是构建外语教育大楼的砖瓦，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外语教育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相较而言，文学研究学者向语言和教学法的转型会相对轻松，而语言教学研究学者转型研究文学的几乎没有，这是因为文学积累需长年累月的大量阅读。目前在外语教育过程中，学生们普遍反映每天忙忙碌碌但又不知道学到了什么。各门课程都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但因课时有限，这些理念往往并未能得到充分落实。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不少学生成为了裱糊匠，很多作业沦为网络资源的剪辑拼贴工作。经典阅读有助于语言各项技能的协调发展和人文素养的提升。笔者曾有一位本科毕业生参加东

莞地区的中学教师招聘，最终在 300 多名（其中一半以上为研究生学历）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被录取者。她的成功秘诀就是大量的阅读，据其本人介绍，本科期间至少阅读了 100 多本英语原著。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尽管很多学生也能通过培训等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但相信那位学生能更灵活地应对以后的工作，因为她真正做到了满腹经纶，而非流于一时应对。

文学阅读是外语学习者修炼内功的最佳方式，不仅有助于技能修炼，还能增加知识信息的储备量。文学作品里原汁原味的表达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文学史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到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地理环境间的密切关系。文学作品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曲折离奇的情节事件有助于学生多角度地审视当时的社会。这是政治、历史、哲学以及国家概况类书籍都无法做到的，因为这些书籍多受特定视角的局限。而文学作品包罗万象，涵盖百态人生、历史沉浮沧桑和社会各行各业，可谓是一个万花筒。可以说，文学就是真正的生活，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又高于生活。

从经典文学作品中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威尼斯商人》折射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业发展状况，犹太商人与新兴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哈克·贝利历险记》揭露了种族歧视；《乱世佳人》反映了美国内战时期南北之间的尖锐冲突；《简·爱》刻画了一个新型的独立的女性；《呼啸山庄》则让读者体验到人类原初野性的本能之爱；《红字》批判了宗教对人们心灵的折磨和迫害；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更是书中那个小郡的地方志，世系中共 600 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各个长篇、短篇小说中穿插交替出现。

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信息有助于学生拓展知识面，开阔眼界，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上有着独特优势，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在经典阅读过程中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还能实现语言学习到语言习得的转化。文学作品里的各种方言和大量俚语，具有原汁原味的本土性。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所说：“若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大脑；若你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他交谈，可以传递至他的心灵”（蒋洪新，2018）。

文学教育的“知”需日积月累，也需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国内许多高校提倡并大力推广经典阅读。例如湖南师范大学规定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必读 30 本英文原著（20 本指定 +10 本自选）。本人所在的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近年来为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列出了 16 本文学经典推荐书目，并成立了经典阅读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将经典阅读和低年级泛读与视听说有机结合。此外，选修课有了更多的自由度，新开设了《英美影视作品赏析》《英美短篇小说》等课程；文学课程设置也做了适当调整，从以往的三年级提前到二年级，并新增开了《西方文学导论》

必修课程。文学团队近3年开设的通识课程《现代英语诗歌赏析》采取团队合作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们进行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颇受欢迎。

文学教学中“知”的维度拓展更多的是依靠课外阅读和习得，需要学生自我修行。课堂环节主要以学生为中心，检测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以及理解程度。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掌握的知识点以及文本细读，逐步培养学生从创新角度提出问题、论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文学教学之“思”

文学教学之“思”即思辨能力。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是集思维、分析、论述和问题解决为一体的综合能力，同时思辨能力还是一种“可迁移”的能力，一经掌握、终生受用(孙有中, 2011)。黄源深认为学外语的人十分容易“感染思辨缺席症”，“易感性”的根源在于目前高校外语专业的认知偏差和教学设置的短板。他认为，“不摆脱‘思辨缺席’，走上岗位后，充其量只能做一个虽掌握一定技能却亦步亦趋的人”“思辨的缺席直接影响人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人的素质”(黄源深, 1998)。利维斯在《英文学院概述》一文中也指出：“英文学院最重要的专业是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它是一个真正的不可替代的专业”，因为“它训练智性与感受力，这是任何其他专业做不了的，它培养一种敏感性、精准的反应力和精妙的执行统一体”(Leavis, 1979)。

邓颖玲(2013)指出，“不少英语专业的学生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后，其听、说、读、写的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文科其他专业如中文、法律、经济专业的毕业生相比，英语专业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思辨和创新能力方面都出现了差距”。现实中也时常看到英语演讲赛和英语辩论赛的最佳选手往往并非来自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学生表现欠佳并非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缺乏批判性思维。在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一般有中、英文两大阵营的学者，他们的发言从选题到路径方法等方面均显著不同。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包括外语教师)在文化视野、创新思维、逻辑推理、解析能力和理论功底等方面都相对薄弱，基本原因可归根于“思辨缺席”。

对人文学科而言，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应成为目前大学教育尤为关键且备受重视的内容。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没有文化底蕴，就缺乏深邃的思想。一个有自己想法但英语结结巴巴的学生也胜过英语流利却“无话可说”的学生。当然，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出既有思辨能力，又能用外语流利表达的人才。将思辨能力的培养纳入英语教育的中心范畴已势在必行。但如何才能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融入于课堂教学实践中呢？

笔者认为，文学教学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思辨能力”培养在文学课堂有

独特优势，因为文学作品的解读品评赋予“思辨能力”以足够的拓展空间。一部经典作品包罗万象，从古到今、从西到东，上有天文、下有地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科学、地理等各领域相互交织。文本解读形成的结网中任何一个结都可成为论点和视角，因为文本意义可视为动态流，其流程及最终归宿取决于读者，验证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如何培养与提升学生“思辨能力”是文学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本人曾在“文学教学的不确定性：以《花园独角兽》为个案”一文中为文学课堂如何引导学生“思辨能力”做了演示。例如，广州大学新开设的《英美影视作品赏析》中没有采用现有教材，因为它们往往侧重语言技能训练，比如配音模仿、经典对话节选以及问题设置，而问题设置往往是针对影片中的细节以及背景知识，并未以启发思维为最终目的。本人比较注重经典文学作品鉴赏与评价中批判性思维的引导以及每部影片的个性展示，即创新思维。在文学“思”的环节多以“教师为主体”引导学生提出质疑，深度探讨文本。目前，这一思路仍在探索阶段，尚需长时间努力和摸索，才能形成有风格、有观点、有思路的文学教学，确保“思辨能力”培养不沦为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点点滴滴地渗透到课堂教学实践中。

3. 文学教学之“实”

文学教育之“实”指文学教育虽不以实用为目的，但也应立足于现实社会，其教育应有当下性和时效性。习近平总书记（2014）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并特别强调：“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中国特色的外语文学教育可理解为外国文学中的中国视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外国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中国景观，或所体现的中国元素；二是指中国视域，是一个人进行领会或理解的中国构架，包括中国视角、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需求、中国资源等。

如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体现中国元素和中国景观？现以美国文学为例做相应讨论。美国文坛曾在20世纪掀起过两次“中国潮”。第一次是20年代中国古典诗歌和儒家思想的大潮，因此现代主义流派的讲解可以侧重该角度。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的“垮掉一代”掀起了一场环保革命——“背包运动”，他们推崇中国老庄哲学以及禅宗生态智慧，对寒山子顶礼膜拜，对寒山子幕天席地的生活方式趋之若鹜。学习“垮掉一代”时可以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如赛珍珠以及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景观”均可以适当涉猎；也可以用中国视角去审视外国经典作品，如用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探讨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斯芬克斯之谜，或把中国山水诗和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歌进行比较。当然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要把握好尺度，毕竟中国元素并非唯一的解读角度。

特色教学应与时俱进。当下性一直是外国文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教材相对陈旧，外国文学教材的出版时间多在 20 世纪初，少数较新的也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教材；另一方面，文学教育的师资储备对学术的时效性缺乏敏感度，大多是跟着教材照本宣科。但值得庆幸的是，部分高校已走在前列，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了“丝路经典文学”；再如深圳大学开设了自然文学课程，在生态环境研究已成为当下热点的背景下，相当合时宜。

特色教学需考虑地域特色。以广州大学为例，它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综合性大学，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广东省“冲一流”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广州市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2018 年 11 月，广州大学入选广东省“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重点学科建设高校。这样一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高校，其文学教学要如何推进？

广州大学的文学教学应该以所处地理位置，即岭南文化为支撑点。地方特色文学教学可开设一门选修课，从岭南文化视角解读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寻找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岭南因子，如六祖慧能的禅宗思想在西方文学界颇受重视，因此可以大力发掘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禅风。广东籍学者叶维廉和杜维明在西方文学以及哲学界举足轻重，可采用其思想及其文学理论来研究探讨文学作品。同时也可关注本地文学资源，如清远生态诗歌学派已数次举办国际生态诗歌会议，因而生态诗歌学习中可纳入清远诗派，或组织外译活动，推广清远厚重的生态资源及文化，将清远塑造成中国的“瓦尔登湖”、生态的“香格里拉”。广州杨文丰教授的生态散文已被收入中学教材，可以将其作品与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品如《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屋》《心灵的慰藉》《低吟的荒野》等进行比较研究。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提出的“文学地理学”虽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主阵地依然在中国，因此依靠外语学科的共同努力将之推广传播并嵌入世界文化共同体中，从而将“文学地理学”与生态批评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在生态蔚然成风的研究热点中各显身手。以上都是广府文化的现代资源，是大湾区文化建设的名片，广东外国文学研究者应以独特视角，立足于深厚的岭南文化，走出一条创新而特色鲜明的文化之路。正是通过这样立足于本土的外国文学教学才能更好地做到向中国讲好世界故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4. 文学教学之“虚”

“虚”指文学的“无用之用”，即文学的“致知”（虞建华，2010）。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2012）在瑞典的授奖晚宴上，讲到文学“有用”与“无用”的关系：“文学与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外语专业的“新国标”也凸显了外语专业的人文属性。王俊菊（2018）指出：“中国的外语学科正处在从工具性、应用型向人文性和创新性转变的历史节点”。

潘光旦（1999: 459）说：“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蒋洪新（2018）认为：“英语教育要始终坚持人文教育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解读经典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其人文素质。人文教育是一种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旨在培育人类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外语教育不能只关注技能层面，忽视其人文学科的本质内涵。换言之，外语教育并不只是外语教学，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吴宓曾提出，外语教育要把培养博雅的文化人作为目标，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蒋洪新，2009）。

理工和人文因其各自不同的学科特性，往往容易对彼此产生偏见。但对人文学科的不够重视应该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广东省实验中学高中部的理科与文科学生人数比例基本是4:1，2020年高考时甚至高达5:1。广东省位列前茅的几所重点中学，如华南师大附中、二中、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和执信中学等情况也基本相似。重理轻文不仅体现在现行教育体系中，更是体现在社会观念中。最普遍的理由就是理工专业更实用，人文专业无足轻重。其实细究起来，人文情怀贯穿人的一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文学修养更是与人的一生形影相随，指导和影响着为人处世，帮助人类诗意地栖居。鲁迅的医术只能拯救个人，而他弃医从文拯救的是整个民族。文学不只具备内在人文精神和美学价值，同时也富有教育意义，折射现实，反映生活，从而影响和改变社会现状。

文学的务“虚”可以尝试与课堂思政相结合。文学作品中的百态人生可以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引导学生学会如何适应社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学会包容和坚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倡导进取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老人永不言弃的积极进取精神，并了解人和自然之间不仅有竞争，同时有共生。《红字》中海斯特从通奸——能干——天使的转变都是她个人成长的足迹，让人感受到：人非圣人，孰能无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而《哈姆雷特》中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追问更是从不同角度诠释着各类决择。从文学伦理学角度来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也颠覆了常规的爱情唯美论，更好地赋予了作品的社会性，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文本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有了全新的阐释，象牙塔里的学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理解形形色色的生活和社会的全貌，从而以更加包容的心胸和更加共情的感受理解他人，养成豁达的处事态度。

文学课堂不能局限于知识信息层面的介绍，更要注重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提升其人文素养。文学作品中的百态人生和多元文化能丰富人生阅历，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塑造着人的品格。课堂教学已非纯粹的课堂教学，而是生活智慧的

转化。

5. 结论

文学丰富生活，滋润情感，启迪智慧。文学的“无用之用”反而在当下社会弥足珍贵。在 21 世纪的今天，外国文学教育如何规划课程，选择什么样的“文学经典”，都值得深思。文学教学是外语教育之重阵。文学作品阅读有助于学生了解外语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在一定程度实现语言教学向语言习得之转换。文学教育也有助于提高思辨能力，实现艺术向生活转化的人生智慧并培养人文素养。文学教学要求做到“知”“思”“实”“虚”等四个维度有机结合，这是“新文科，大外语”语境下的外语学习要求所在。

一堂理想的外国文学课程应以学生为中心，根据“知”“思”“实”“虚”的维度做出相应的教学调整。“知”维更多以学生为中心，检测学生对文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思”维中教师的启迪和引导至关重要；“实”维须酌情考虑文学教育的时间和空间，巧妙结合学科当下的语境以及本土特色；“虚”维指人文素养的培养，是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是新型人才必不可少的品质。

参考文献：

- [1] Leavis, F. R.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 Abbs, Peter. *The Educational Imperative: A Defense of Socratic and Aesthetic Learning* [M].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4.
- [3] Abbs, Peter. *Autobiography in Education* [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4.
- [4] 邓颖玲. 注重英语专业的人文性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5): 436-441.
- [5] 黄源深. 思辨缺席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7): 1-19.
- [6] 黄源深. 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 [A]. 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论坛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7] 蒋洪新. 大学的意义与英语专业的教学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9(5): 104-107.
- [8] 蒋洪新. 关于新时代外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J]. 外语教学, 2018(2).
- [9] 蒋洪新. 持守初心，笃行致远 [J]. 外语界, 2018(6): 7-11.
- [10] 莫言. 在瑞典诺贝尔文学授奖晚宴上的发言 [N]. 文汇报, 2012-12-12.
- [11] 潘光旦. 潘光旦选集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 459.
- [12] 孙有中. 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 [J]. 中国外语, 2011(3): 49-58.
- [13] 王俊菊. 英语教育六“新”谈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4).
- [14] 习近平, 2014.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05/content_2671258.htm. 2018-02-25.
- [15] 虞建华. 关于我国高校专业英语“两个走向”问题 [J]. 中国外语, 2010(3): 14-18.
- [16] 虞建华. 从外语专业文学教学看高等教育的用与知 [J]. 中南大学学报, 2013(4): 205-209.

翻译能力培养视域下的 MTI 课堂教学原则 及其运用

周淑娟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东欧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翻译能力在翻译人才培养中占据着首要位置。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MTI) 旨在培养应用型专业译员,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重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根据翻译能力的发展阶段, MTI 专业硕士阶段应以技能训练为核心, 把翻译活动融入交际情景, 让学生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世界, 同时借助网络提高自己的言语水平, 全面提升翻译能力。基于此, 本文提出翻译教学的基本原则, 以期提高 MTI 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翻译能力; 交际情景; 形象性; 言语规范

MTI Classroom Teaching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ZHOU Shujuan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s self-evident. The education of MTI is to cultivate applied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so it is necessary to train students' translation ability in classroom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ranslation ability, the courses of MTI master's degree should focus on skills training, incorporat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to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let students discover the hidden world behind the text, improve their language level and cultivate translation ability by means of the network.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TI graduat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imagery; speech norms

基金项目: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以翻译能力为中心的 MTI 课堂教学策略研究(编号: GH1807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周淑娟, 女, 吉林外国语大学中东欧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俄语语言学和翻译教学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翻译的优劣取决于译者翻译能力的高低，因而翻译能力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能力并非单一类型的能力，而是多项能力的综合体。作为交际能力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能力“实质上存在于由环境、译者、知识等要素交叉的多维空间，是译者依托翻译问题求解空间不断养成高阶思维能力的过程。译者能力是一种动态结构，寓于环境驱动的认知空间之中，是由初始态、中间态和目标态构成的一个连续体，呈现渐次发展和演进的动态特征”（李瑞林，2011: 49）。随着时代发展，翻译能力的内涵要求不断变化，其构成要素也与时俱进。因此，对翻译能力做出发展式的阐释是培养新时代翻译人才的根本需求，对提升翻译教学水平尤为关键。

1. 基于翻译能力培养的 MTI 人才培养特点

随着国内 MTI 教育的深入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师就翻译人才培养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别于传统翻译教学和外语教学，MTI 人才培养具有其特殊性。

1.1 MTI 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特点

任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应以人才需求为基础，即社会需求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MTI 研究生教育目标的核心就是要求高校能够培养出为市场所用，为国家、社会和区域经济发展所用的应用型翻译人才。该类人才培养力求和市场需求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备受学生青睐。

1.2 MTI 人才培养对教师的要求特点

众所周知，承担翻译教学任务的教师应当具有相应的翻译经验，但它并非保障课堂教学成功的充分条件。“我做了 30 年的翻译，我就是一名出色的翻译教师”是一个假命题。重要的不在于教师做了多少年翻译，而在于他是否能把翻译经验提取出来，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促进学生翻译能力的养成和提升。当然，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目的也非常重要。从理想的教育结果出发，MTI 翻译教学的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一名职业译员，使之能够理解翻译活动的实质，能够理解和分析文本的信息，挖掘其深层含义，并用相应的语言领会和表达其整体内容，即所谓的翻译能力。综上，承担 MTI 翻译教学的教师应当集教学经验和翻译经验于一体，并且了解翻译行业需求。

1.3 MTI 人才培养的学习阶段特点

由于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其翻译能力核心要素的训练也不同。根据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MTI 专业硕士阶段应以技能训练为核心，突出练习的自动化过程，辅之以语言能力的提高。在教授语言技能时必须首先了解语言是学习翻译的必要条件。MTI 课堂教学的任务就是定义所需的语言水平，基于特定的“能力”条件进行“技能”训练，尤其解决“练习”所需的方法，从而保证学生具有“抉择能力”，具备完成具体目标的策略和方法。

2. MTI 翻译教学基本原则

当一名教师走进课堂时，他不仅要参与教学过程，还要围绕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的目标，按照一定的教学原则组织课堂活动。针对 MTI 这一阶段学生翻译能力的核心构成元素和不同的课程设置，教学原则应有所不同，应以具体的课程特点为基础，而翻译能力的培养应该建立在翻译职业特点、翻译内容、译员任务、客户对译员的要求和期待等基础上。上述人才培养特点决定了 MTI 人才培养需要突出以下教学原则。

2.1 把翻译活动纳入交际情景中

感同身受是译员从事翻译活动的重要前提。“译者必须将自己融入原文的语境，深刻领悟原文的语境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强烈的心灵感应，才能超越时空界限，和作者达到心灵上的契合”（郑诗鼎，1997）。此外，就理想状态而言，翻译活动应当保证使用不同语言的交际主体在具体情境中能够实现无障碍的交流互动，因为“翻译是一种语言中介，是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交际形式”（毛荣贵，2003: 44）。而实际上，译员往往只能做到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译员要保证中文读者和莎士比亚之间的相互交流，彼此之间要相互影响。因此，从实践意义来看，教师在翻译教学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激发学生作为一名译员从事翻译活动时的自觉思维，以保证交际者在情景中相互作用，构建符合客户期望值的言语文本。

正如奈达所言：“大多数话语理解和表达错误都源于没有思考好语境问题”（Nida, 2001: 125）。因此，首先必须要将翻译活动置于真正的交际情景中，但是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往往只能想象大多数的交际情景。对此，可以采取情景模拟法，翻译教学中的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的实质就在于此。翻译实践活动的完成、翻译理论的认知以及翻译教学都应该以此为基础。

遗憾的是，在翻译教学活动中无法严格遵循上述原则。当一篇需要被翻译的文本，而非单个句子摆放在学生面前时，学生翻译的唯一依据就是该文本。可以将翻译实践活动视为“请翻译我吧”的一个游戏。翻译课堂上，学生通常拿到源语文本后马上着手翻译，并没有考虑文本在现实条件下的交际情景。等翻译活动结束后，老师马上开始带领学生讨论翻译过程中各种翻译方法的使用以及翻译语言规范等，有时也可能会讨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等。于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最终结果就变成：学生们用所要翻译的语言创建了一篇独立于某一具体情景的文本，由于老师的指导，尤其是引导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去创建该文本时，其翻译结果还是让人满意的。

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把翻译模拟活动理解为类似编辑校对的工作。事实上，这种模拟方式远比情景模拟法更实用，因为它会让学生有一种职业紧迫感，给学生一种客户就在眼前的效果，尤其是学生做笔译时，这种效果表现得更加明显。因

此，在实践中要经常重复类似的模拟活动，并且应贯穿翻译教学的全过程。

此外，文本的翻译分析是翻译过程和翻译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文本的翻译分析要扩大到交际情景本身的分析。在分析文本时应该学会提出并解决诸如以下问题：原文的作者是谁？刊登原文出版物的特点是什么？原文作者创作原文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还有更重要的问题：翻译原文的目的是什么？译文的受众对译文有怎样的期待？译文想要对其受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译文的交际效果和原文的交际效果是否应该保持一致？原文的受众和译文的受众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在文本分析和情景讨论中，我们可以探讨一系列与翻译目的、对受众（客户）影响、受众（客户）期待相关的问题。而原文体裁、语体属性、文本结构、文本内部意义之间的联系特点等语言学问题也非常重要。因此，对文本的翻译分析并非只停留在翻译过程的初始阶段，而应融入翻译的各个阶段。对原文意义、作者观点等更为深入的理解不仅应该体现在翻译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对翻译结果的讨论中。因此，最主要的还是要回归到以下两个问题：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受众对译文有什么样的期待？

2.2 看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世界

读懂文本所描绘的世界，即为翻译著作中经常被提及的形象性（直观性）问题。在翻译教学中，不仅要协助学生理解并传达文本的字面意义，还要教会学生将原文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作者所指的情景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学会用原文作者的眼睛去观察该情景。意识中所建立情景的形象是充分理解文本的前提，该形象越清晰，说明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越深入。学生只有在意识中对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世界获得了和文本意义表达相对应的形象后，学生翻译的质量才能得以保证。否则，整个翻译过程就会变成简单的词义复制，最终翻译出来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被理解。正如毛荣贵（2003: 61）所言：“翻译是一种渗透创造性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译者运用形象思维。没有形象思维的翻译，其译文或舛误迭现，生硬呆板；或形象枯槁，味同嚼蜡。”

在课堂上能否教会学生看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世界？答案是肯定的。举例而言：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和寻找某一句子意义的表达方式时，某学生十分苦恼地说，她看不到隐藏在这个句子背后的世界。虽然教师也替学生着急，但内心是喜悦的，因为这意味着，学生所着急的只是暂时不能完整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思，即文本所要表达的情景。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只要学生在意识中形成了相对应的形象，那么“如何用汉语来创建该文本”这一纯粹性的技术问题将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这需要一个过程，而学生努力的过程正是其翻译思维形成的过程。

教会学生看到并分析可能实施翻译活动的交际情景和看到文本中的实物情景二者间仍存有一定差异。在第一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充足的办法，通过大量的提醒、暗示和引导性问题，使学生置身于恰当的交际环境中，直到他们习惯该情

景，不再总是有和具体的人或者为具体的人工作想法为止。该训练是为了让学生从知道分析情景的必要性向能力和技能转化。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强迫性的训练就完全不起作用，完全取决于学生的意愿。准确地说，类似的能力是可以自己获得的，不可能强迫养成，需要学生完全自觉的、作为职业译员的学习方法。

有观点认为，如果必须将翻译活动和交际情景联系在一起，那技术翻译是不可能教会的。翻译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会从事技术文本的翻译活动，因为他们获得了相关的毕业证，就意味着必须面对各类翻译。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翻译专业毕业的学生都能在医学、物理、石油等专业领域的国际会议上表现出色。他们能够成功是因为掌握了必要的信息，并通过自己过滤这些信息并将其系统化。他们看见了文本背后隐藏的世界。如果他们不擅长独立自主地做一些经济预算的方案，那至少他们理解了类似经济预算的实质和内容，这就使得他们可以自信地用翻译语言谈论所涉及的内容。

龚光明（2004: 6）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的创造包括科学形象和艺术形象的创造”。因此，作为翻译思维主要形式之一的形象思维，不仅应该体现在艺术文体，还应该在科技文体中唱主角。目前科技术语结构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象思维的“产儿”，因此，新科技术语的翻译当然也需要“亦步亦趋”地运用形象思维（毛荣贵、范武邱，2003）。

但也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情景都可以形象化。准确而言，并不是所有的实物情景都可以在意识中被形象化。作为教师，有时可能会怀疑是否可以将诸如哲学、语言学等文本中所描写的情景形象化。诚然，抽象的概念很难被形象化，那应该如何处理类似讲述语言学历史变迁的文本呢？在这样的文本中可以看见什么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充分理解概念和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从事翻译的基础。

类似于这种不可想象的文本并不多，大部分译员需要处理的文本都是非常具体的。例如，可要求学生，如果翻译的文章是有关于内燃发动机的，那他们就应该想像自己位于汽缸内部，观察活塞如何往复运动。如果是和一名在石油领域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交谈，那在翻译过程中，思维必须聚集到石油的特点上。

如何做到这一点？显然，一定要掌握相关的主题，也就是原文所属的具体领域。对于任何一个职业译员而言，这种要求是必须的。从教学的角度而言，它意味着教给学生一个简单的思维暗示：在不明白或者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定要了解和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开始翻译工作。在理解原文之前寻找必需的信息完全可能做到，因为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在学校，学生应该尝试接触各个领域的翻译。在课堂上翻译汽车方面的相关材料时，不能因为不擅长该领域就规避相关问题。如遇到“Porsche”（Порше）一词，学生可能会好奇，它究竟是哪个品牌的汽车。借助网络，学生可以搜索和汽车相关的任何问题，不仅能找到相关的信息和照片，还能将该汽车品牌和其他品牌进行比较。诸如此类的信息虽然不属于翻

译相关的范畴，但正是由于获取了这些信息，才使得译员和作者的视域趋于重合，从而更为自信地翻译文本。

上述翻译教学原则的目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职业翻译思维。遵循上述两个教学原则可以促进翻译思维的提升和形成。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作为一名译员，要了解具体的交际情景，考虑到交际者的需求，并能准确理解文本，用标准的语言表述出来。

上述讨论的都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向。理解原文是翻译实践活动的首要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作为一名译员，80% 至 90% 的努力都会花费在这一阶段。

2.3 准确地使用翻译语言

准确使用翻译语言即遵循语言规范和翻译语言的习惯性用法，在翻译文献中被称为翻译的言语规范。

言语规范包括语义和语法规范，语义规范体现在表义须明晰，语法规范则表现在系统须规整。而语言规范不是指语言的词汇构成，任何一门语言的词汇都是动态发展的，完全可以借助其他语言而变得丰富起来。语言规范是指语言状态，这种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应该是稳定的。但是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便利的公共言语平台模糊了个体语言和公众语言之间的界限（陈红燕，2013）。有别于传统语式表达的网络语言，如一些有悖于传统语法规则的成分颠倒的“电话我（给我打电话）、微信我（给我发微信）……”、高简略度用语“爱就不累、喜大普奔……”以及“单身狗、老司机、亲……”等高频网络用语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译员可以使用诸如此类的语言，对此笔者并不赞同。“语言建立维持社会规则，包括由语言本身造成的交际角色……通过此功能……社会团体被划分，个人也得到识别与强调，因为通过人们之间的语言互动，自身人格得到了表达和发展……”（胡壮麟，2002）。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译员有责任，也有义务在翻译时使用标准规范的语言。但遗憾的是，很多译员已经开始习惯在正式语言中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上述不规范言语。

在探讨言语规范问题时，不难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学生的压力并不是源自于对原文的理解，更多的是不明白汉语所表达的意思或者不知道如何用汉语表达。实际上，大多数学生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汉语，因此，在读学生的译文时经常会读到错误的汉语表述。汉语水平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教授翻译的教师虽然不擅长教授学生汉语，但是要引导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不断检查自己的汉语表述，用规范的语言标准来打磨、推敲自己每一次的翻译作品。这是每一个翻译，尤其是初学者必需具备的品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教会学生对自己翻译成果的准确性时刻保持怀疑态度，教会他们学会自我检查。

现今的学生们虽生活在网络时代，对网络非常依赖，但在翻译活动中往往忽

略网络的作用。实际上，网络中的语料库等资源提供了检验词组或句子语言规范的可能性。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学生会经常反馈自己的翻译效果不理想。如果细问其中原因，学生通常会说不太确定或者不知道某些语言的表达是否规范。当继续追问他们是否在网上查阅这些语言的使用情况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这就意味着学生根本没有养成时刻检查的习惯。因此，对于教师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养成检查的习惯，让他们意识到翻译过程中网络的重要性。这样能帮助学生提高翻译质量，尤其是语言质量。

如果学生还不会使用与翻译相关的搜索系统，不了解能够用于翻译的资源，教师应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教他们使用网络资源，熟悉翻译系统和软件，帮助解决翻译中语言不规范的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提高学生的计算机使用能力并不是翻译教师的基本任务。若能开设一门《翻译中搜索引擎的使用》课程就非常适合。如此，学生就会清楚，翻译中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网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重要的是，不应在翻译课之前开设这门课，应该与其平行开设，否则效果就有所折损。当然，即使是没有学过这门课程的学生，如果他们能够领会教师的思想，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感兴趣，也能成功掌握搜索系统和其他的相关资源。

语言规范问题往往产生在将原文翻译成译文时，学生在翻译实践中，教授其形成正确语言规范思维的整体方法应该是类似的。实际上，“对语言的规范本不存在是否必要的问题，而是是否自觉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范标准是否恰当的问题”（戴昭铭，1999）。

3.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MTI教育的不断发展，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培养质量也备受关注。在翻译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能够促使他们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享受到其带来的好处和优势，让学生的外语素质得到质的飞跃。上述翻译教学原则建立在明确翻译职业现实特点、认清职业翻译要求的基础上，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译员思维。若翻译教师在和学生交流时能够贯彻上述翻译教学原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翻译质量，而且可以保证其未来的路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 [1]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0.
- [2] Nida, E.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3] 陈红燕. 动态观照下的言语规范与言语创新——当下言语规范状况的检视与批评 [J]. 学术界, 2013(09): 133-141.

- [4] 戴昭铭 . 语言功能与可能规范 [J]. 语言文字应用 , 1999(2): 3-10.
- [5] 龚光明 . 翻译思维学 [M]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04.
- [6] 胡壮麟 . 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2: 135-136+9 .
- [7] 李瑞林 . 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 : 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 [J]. 中国翻译 , 2011(1): 46-51.
- [8] 毛荣贵 . 英汉翻译技巧示例 [M].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2003.
- [9] 毛荣贵 , 范武邱 . 形象思维与科技术语翻译 [J]. 中国科技翻译 , 2003(04): 45-46.
- [10] 郑诗鼎 . 语境与文学翻译 [M].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7.

外语教师批判性思维品质与课堂有效教学的 相关性研究

符祝芹 蔡 莉

(海南医学院 外语部, 海南 海口 571109)

摘要: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课堂教学评价和访谈, 考察了解高校外语中青年教师的批判性思维的现状、其课堂教学有效性情况以及思维品质和课堂教学有效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工具为基于《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 (CCTDI-CV)》的中文修订版、美国加州学术机构提出的有效教学 5 项原则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优质教师协作机构开发的课堂评价量表 (RTOP) 等设计的《外语课堂有效教学评价表》。研究结果表明, 高校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一般;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偏中上; 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由此可见, 高校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是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项重要指标。研究还发现, 外语教师对批判性思维品质内涵的理解及其在课堂教学的作用相对模糊, 外语教师自身批判性思维品质的培养有待加强。

关键词: 高校外语教师; 批判性思维品质; 课堂有效教学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L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FU Zhuqin CAI Li

Abstract: Via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data gathered from six college EFL teachers of Hainan Provin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college EFL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ness of EFL classroom teaching. It also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classroom teaching. The research tools included a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项目基金: 本文系 2018 年海南省应用外语研究基地课题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高校外语教师批判思维倾向现状调查及培养策略”(编号: HNWYJD180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符祝芹, 女, 海南医学院外语部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批判性思维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蔡 莉, 女, 海南医学院外语部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教师发展和教育研究。

Inventory (CCTDI-CV) and the Scale of Effe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Standard for Effective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formed Teaching Observation Protocol (RTOP).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of EFL teachers are intermediat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classroom teaching is at upper middle level. The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FL teachers seem not to have a clear percep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s well as its important role in classroom teaching. From the study, it can be indicated that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of college EFL teachers i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effe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t is crucial to develop college EFL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Key words: EFL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0. 引言

当下，随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颁布，“金课”成为广大高校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而“金课”建设自然要落实为有效的课堂教学。最新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强调，“在推进教学手段现代化中应把提高教学与学习效果放在首位”。在此背景下，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性显然更为凸显；而实现有效的课堂教学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同时新《指南》在教学目标中还增加了“思辨能力和人文精神”，突出了对学生综合文化素养和高阶认知能力的培养。这无疑对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有研究表明，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对学生的学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学生深度参与学习活动（Unal & Ergin, 2006）；还有研究提出教师是否对自己的批判思维能力有强烈的信念对于其课堂上成功地实施教学和管理课堂发挥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Dunn, 1988; Smith, 2002）。虽然国内有关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也积累了不少成果，但在外语教学语境下，学者们更多关注如何帮助学生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刘伟、郭海云, 2006; 文秋芳, 2008; 文秋芳、孙旻, 2015; 周舒怡、董元兴, 2017），相比之下少有研究专门关注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李加义, 2014），特别是对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现状及其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作用的研究更为稀缺。因此，本研究重点探讨批判性思维品质作为外语教师的一个重要的综合素养，对其课堂教学有效性有何影响和意义，以期对提升大学外语教育教学质量有所启迪。

1. 外语教师批判性思维品质与课堂有效教学

1.1 外语教师批判性思维品质的内涵

批判性思维品质，又称批判性思维倾向（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以下简称 CTD），是主体对自身思维过程进行洞察、分析和评估的内在心向，是进行

批判思维的先行条件。虽然 CTD 的构成要素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因每个个体所处的环境不同，其 CTD 的具体表现有所差异。德尔菲报告（The Delphi Report）（1990）指出，新时代的外语教师应具备 CTD 的 5 个核心特质，分别是：思维的开放性，即愿意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接纳和包容不同的观点；求知欲，指对事物保持浓厚的兴趣，能够主动扩充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愿意探索具有挑战性和新颖性的教育教学实践；思维的系统性，即在解决问题时有计划性和完整性，能够从不同角度鉴定教学问题所在，整体把握学科的本质和结构；分析性，指能够公正客观地思考问题，寻求恰当的支撑证据再做出判断，主动思考从而有条理地解决问题；思维的认知成熟度，即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的思维，正确认知不同的观点，能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剖析自己的错误和自我矫正。

1.2 外语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内涵及要素

有效教学广义上指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的条件下，充分教学并发挥学生的潜能，让学生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是“关注学生及学习进步的教学”（Devlin & Samarawickrema, 2010）。聚焦到课堂教学上，有效教学的影响条件包括学生、教师、教学活动和教学情境四大因素（Ellis, 2012），但由于有效教学本身就是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教学价值观、教学理论及教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而不断扩展，还会因不同学科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要素有所区分。外语课堂的有效教学是师生共同积极参与的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和意识性的活动，它建立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体现于教学的整个过程，通过清晰的教学目标、设计合理的教学方案和科学的课堂教学组织，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健康的教学生态情境中实现的（蒋亚瑜、刘世文，2015）。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校外语教师批判性思维品质与课堂有效教学的相关性，具体包括以下子问题：

- (1) 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现状；
- (2) 外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3) 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与外语课堂有效教学的相关性；
- (4) 外语教师对批判性思维品质内涵的了解程度以及其在课堂教学中发挥的作用。

2.2 研究方法及对象

本研究方法为在线问卷调查、课堂教学评价和访谈。研究对象从性别、年龄、教龄和职称等因素综合考虑，最终选取所在院校的 6 位中青年外语教师为调查对象。具体信息如下：4 位女性，两位男性；年龄介于 30-40 岁；5 位获硕士学位，

一位持本科双学士学位；5位讲师，一位副教授；一位曾获省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两位分别获得系部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三等奖。

2.3 研究工具

2.3.1 CTD 调查问卷

研究问卷蓝本为《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CCTDI-CV）》中文修订版（彭美慈、汪国成，2004）。根据被试的职业特点，对该问卷中“开放性”“求知欲”“系统性”“分析性”和“认知的成熟度”5个维度相应题项作进一步筛选，整理成适用于教师的《外语教师 CTD 测试问卷》。新问卷初稿共设计 42 个题目，经前测结果分析和征求专家意见，最终保留了 40 个题目，形成《外语教师 CTD 测试问卷》最终版。问卷信度测试 α 值为 0.761，信度较好。整合后的问卷量表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收集被试教师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龄、学历和职称；第二部分是教师 CTD 的正式问卷内容，共 40 个题目，涵盖开放性、求知欲、分析性、系统性和成熟度 5 个核心特质子维度；每个维度下设 8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格式，从“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记作 1 至 5 分（正向赋分），最后得分越高说明其 CTD 越强。依据法乔恩等人（Facione, 2001）的研究结论进行等比换算，本研究中 CTD 的总得分区间为 40-200，得分低于 100 为负性倾向，表明无 CTD 或 CTD 极弱；100-139 为较低水平，CTD 较弱；140-180 显正性倾向中等水平；高于 180 以上表明 CTD 整体较强。CTD 特质子维度的得分区间为 5-40 分，其中得分低于 20 的被认为负性倾向，即相应的批判性思维特质没有或极弱；20-27 分属于较低水平，表明思维特质倾向较弱；28-36 属于正性倾向中等水平；得分高于 36 为较高水平，表明该特质倾向较强（具体评定见表 1）。

表 1 CTD 评定量表

评级	得分	
	总 CTD	CTD 核心特质
负水平	<100	<20
较低水平	100-139	20-27
中等水平	140-180	28-36
较高水平	>180	>36

2.3.2 外语课堂有效教学评价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外语课堂有效教学评价表》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据，依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的精神要求和学科特点，基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承办的学术研究机构提出的有效教学五项原则（Dalton, 1998），即师生合作输出

活动，以对话开展教学，意义建构，语言及技能发展，复杂思维培养，同时借鉴美国亚利桑那优质教师教育协作体开发的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并具有较强操作性和权威性的 RTOP 课堂教学评价量表（吴维宁，2011；邢红军、田望悬，2020），构建适合我国本土外语课堂有效教学的评价体系和量表，并通过了专家审查和信度测试，最终形成了适用本研究目的和当前教育培养目标的《外语课堂有效教学评价表》。量表涵盖教学目标与内容、课堂师生互动和会话、课堂意义建构、语言知识及技能发展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五大版块，每个版块下设 4 个评分项，共 20 分。18-20 分为优秀，16-17.9 分为良好，14-15.9 分为中等，12-13.9 分为合格；每个评分项 5 分，4.5 分以上为优秀，4-4.4 分为良好，3.5-3.9 分为中等，3-3.4 分为合格；总分为 100，90 分以上为优秀，80-90 为良好，70-80 为中等，60-70 为及格。

2.3.3 访谈提纲

- (1) 请您谈谈对批判性思维品质内涵的理解；
- (2) 请您谈谈批判性思维品质在您的课堂教学中发挥的作用。

2.4 研究实施

研究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整理了 6 位教师 CTD 的相关数据，同时通过督导课堂观摩对 6 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有效性进行了逐项评分，并就“对 CTD 内涵的理解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访谈。为保证课堂教学评价的公平性，先由课题组两位老师采用一致的评分标准进行预评分；然后再听课并分别打分，取两位老师的平均分作为该受试课堂有效教学的最后得分。

3. 数据分析和讨论

研究通过 SPSS17.0 统计软件对 6 位教师的 CTD 和课堂有效教学进行了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由于研究样本较小，相关性分析采用的是专门适用于样本小于 30 的“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软件。访谈内容通过语音转换成文字进行定性分析和归纳。

3.1 外语教师 CTD 和 5 个核心特质现状

表 2 外语教师 CTD 和 5 个核心特质描述统计结果

项目	N (人)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CTD		6126.00	154.00	139.0000	12.69646
成熟性	6	25.00	35.00	29.8333	3.60093
求知欲	6	24.00	35.00	29.6667	4.88535
系统性	6	18.00	31.00	26.6667	4.760
分析性	6	24.00	30.00	26.5000	2.50998
开放性	6	22.00	32.00	26.3333	3.44480

表 2 的数据显示，高校外语教师 CTD 均值为 139.000，没有达到中等水平的临界值 140，表明外语教师 CTD 值虽呈现正性偏向，但程度不高，处于居中略偏上的水平。CTD 的 5 个特质从高到低排序为：认知成熟度 ($M=29.8333$)、求知欲 ($M=29.6667$)、系统性 ($M=26.6667$)、分析性 ($M=26.5000$) 和开放性 ($M=26.3333$)。其中认知成熟度 ($M=29.8333$) 和求知欲 ($M=29.6667$) 达到中等水平的临界值 28，其余 3 个都处于较低水平，表明思维特质倾向较弱。从离散值来看，外语教师批判性思维倾向的总体离散值较高，表明各被试之间的思维品质差异较为明显。

3.2 外语教师课堂教学有效性

表 3 是外语教师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汇总统计。6 位教师的课堂有效教学总体评价平均分为 80.92 分，刚好达到良好水平，但从最高分 (90.50) 和最低分 (73) 及标准差 (6.06) 来看，教师的课堂教学有效性存在一定差距。在具体的 5 个版块里，只有教学目标与内容、语言知识与技能两个版块的均值达到了良好等级 (16-17.9)，其他 3 个版块都在中等水平范围内，其中批判性思维版块的得分最低。

表 3 外语教师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描述性统计（汇总）

评价指标 (分)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有效性总评价 (100)	6	73.00	90.50	80.9167	6.06149
教学目标与内容 (20)	6	16.00	18.00	16.8333	.75277
师生互动和会话 (20)	6	14.00	19.00	15.9167	1.77247
课堂意义建构 (20)	6	14.50	18.00	15.8333	1.25167
语言知识与技能 (20)	6	14.50	18.50	16.5833	1.49722
批判性思维 (20)	6	13.50	17.50	15.3333	1.36626
有效的 N	6				

在表 4 的 20 个评分项里，教师语言素养平均分是 4.75，达到了优秀等级，证明教师的语言功底是过硬的；平均分最低的题项是“V12 以测促学” (3.4 分)，可见教师对于学习目标是否达成的关注意识相当薄弱；在平均分达到良好水平 (4-4.4 分) 的 11 个题项中，只有语言知识与技能版块的 4 个题项都包含其中，这体现了教师语言素养对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平均分处于中等水平 (3.5-3.9 分) 的有 8 个题项，其中批判性思维的版块约占 40% (3 项)，可见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教学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新《指南》中明确提出了“批判思维能力”的相关内容，显然这是个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此外，外语教师课堂教学的总体有效性是否与其 CTD 水准有关联呢，表 5 的统计结果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表4 外语教师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描述性统计(评分指标)

课堂教学评价项(v)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V1 教学目标具体全面, 可操作性强	6	4.00	4.50	4.3333	.25820
V2 重视所讲授知识与相关知识前后衔接	6	3.50	4.00	3.8333	.25820
V3 课程内容适量, 重难点突出, 结构清晰	6	4.00	4.50	4.3333	.25820
V4 内容渗透思政教育, 体现人文素养情感价值	6	4.00	5.00	4.3333	.40825
V5 课堂互动形成学习共同体, 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6	3.50	4.50	3.9167	.37639
V6 教学活动循序渐进, 组织引导有序, 衔接逻辑流畅。	6	3.50	4.50	3.7500	.41833
V7 创设真实情境, 强化师生和生生互动, 平等对话。	6	3.50	5.00	4.0833	.58452
V8 合理应用教育技术, 开展教学活动和学习管理, 创造学生自我评价和互评的机会。	6	3.50	5.00	4.1667	.51640
V9 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不同的活动, 体现各等级水平的知识, 技能和情感价值目标, 促进意义建构	6	4.00	4.50	4.2500	.27386
V10 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和学科技能联系起来	6	3.50	4.50	3.8333	.40825
V11 教师提供必要的支架和指导, 帮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	6	4.00	5.00	4.3333	.40825
V12 以测促学, 关注学习目标达成, 点评及时确切, 有利于促成学生进步	6	3.00	4.00	3.4167	.37639
V13 教师学科基础扎实, 表达流利, 清晰简练	6	4.50	5.00	4.7500	.27386
V14 通过听说读写活动将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内容知识联系起来	6	3.50	4.50	4.0000	.31623
V15 教学过程中内容知识多元呈现, 在会话活动中促进技能的发展。	6	3.50	4.50	4.0000	.44721
V16 在有目的对话中通过适当的建模、引出、探究提问和表扬等来帮助语言发展	6	3.50	5.00	4.2500	.52440
V17 设计的教学任务能将学生的理解提升到更复杂的水平。	6	3.50	4.50	4.0833	.37639
V18 教师的提问激发学生发散思维	6	3.50	4.50	3.9167	.37639
V19 学生在教学主题中既有面的理解, 又有点的掌握	6	3.50	4.00	3.7500	.27386
V20 教师对学生的表现与具有挑战性的标准相比给出清晰直接的反馈。	6	3.00	4.50	3.5833	.49160
有效的N(列表状态)	6				

(注: 教学目标与内容: V1-V4; 师生互动与会话: V5-V8; 课堂意义建构: V9-V12; 语言知识与技能: V13-V16;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V17-V20)

3.3 外语教师 CTD 与课堂有效教学的相关性分析

表 5 外语教师 CTD 与课堂有效教学相关性分析表

项目	N	相关系数	教学目标与内容	师生互动	意义建构	语言与技能	批判思维
CTD	6	.564	.986**	.882*	.971**	.928**	.971**
	Sig.(双侧)	.244	.000	.020	.001	.008	.001
求知欲	6	.636	.912*	.746	.925**	.794	.866*
	Sig.(双侧)	.175	.011	.088	.008	.059	.026
开放性	6	.626	.928**	.809	.941**	.841*	.897*
	Sig.(双侧)	.183	.008	.051	.005	.036	.015
分析性	6	.000	.771	.522	.696	.657	.725
	Sig.(双侧)	1.000	.072	.288	.125	.156	.103
系统性	6	.064	.736	.552	.687	.647	.702
	Sig.(双侧)	.905	.096	.256	.132	.165	.120
成熟性	6	.062	-.086	.058	-.116	.029	-.029
	Sig.(双侧)	.908	.872	.913	.827	.957	.957

表 5 的统计数据显示, 教师的 CTD 和外语课堂有效教学的相关系数高达 .971, 在 0.001 的显著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说明教师的 CTD 与其课堂教学有效性有相当的关联。同时, 除了教学目标和内容板块, 教师的 CTD 对课堂师生互动、意义建构、语言知识和技能及批判性思维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也非常显著。从表中还可以发现, CTD 的 5 个核心特质中, 教师的求知欲和思维的开放性对其课堂有效教学的显著意义最大 ($P=0.000 < .05$)。

3.4 访谈结果分析

在访谈中, 受访的 6 位教师都听说过 CTD, 但具体到 CTD 的内涵时只有一位教师能够较清晰地说出一些思维品质特点, 比如善于提问、自我反思、独立思考等, 其他 5 位教师或是不清楚该概念, 或是把其内涵与批判性思维技能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简称 CTS) 混淆, 这与王璇 (2015) “教师的批判性思维概念比较薄弱”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而对 CTD 是否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发挥作用, 4 位教师回答在课堂上引导过学生进行批判地思考问题, 1 位老师说没有该意识, 1 位老师觉得比较难。其实, 教师 CTD 对于课堂教学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是否有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具体环节, 而是体现于对整个教学过程更高层次的把握, 体现在引领学生的认知, 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 从而提升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效果, 对学习活动产生主导作用, 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等。显然 6 位教师的理解不够深入, 没有真正地认识到

CTD 在课堂教学中的潜在价值和意义。

3.5 讨论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教育教学研究的重点，而进行有效教学的基本前提是教师具备较高的素质。在课堂上成为有效的教育工作者需要了解学生是如何学习和发展的（Besoluk et al., 2010），需要思想开放，善于分析，这样才能转化自己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探究的好奇心、勤奋努力、谨慎判断及客观公正、善于反思等批判性思维品质也是有效教育者不可缺的素养。教师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的思维能力会阻碍其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Kowalczyk & Hachworth, 2012）。如果教师自身的 CTD 不强，自然很难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Paul, 2005），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调查数据的验证。外语教师应该意识到，成为批判性思考者有助于其成为更灵活、更思辨、有效的教师。正如恩尼斯（Ennis, 1986）指出，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教师在二语教学过程中发展和组织自己的思想，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对其课堂教学设计的认知、课堂活动的组织、师生的互动、意义建构及对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发展的培养等产生积极意义。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课堂教学评价和访谈，讨论了部分高校中青年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现状、其课堂教学有效性以及批判性思维品质和课堂教学有效性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高校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和课堂有效教学有显著的关联性。可见，作为课堂主导者的教师是否具有思维开放、求知欲、自我反思等思维品质对其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意义重大。但是，相关问卷结果显示当前高校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一般，这也导致了其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不高。教师对于批判性思维品质的概念内涵理解不够清晰，自然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其作用。因此，提升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是提高外语课堂有效教学的关键所在。不管是对教学还是教师自身的发展，批判性思维品质都应该引起教师的高度重视。外语教师应加强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学习，培养和提高自身批判性思维品质，同时还需要切实研究如何将批判思维的培养有机融合到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大学教育及教师的再继续教育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但由于本研究的样本规模偏小，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未来研究进一步扩大课堂观摩范围，更充分地探究高校外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品质与其课堂教学效果的相关性，为提升外语教育教学效果提供更客观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1] Beşoluk Ş, Önder İ. Investigation of Teacher Candidates' Learning Approaches Learning Styl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J]. *Elementary Educ.* Online, 2010(2): 679-693.
- [2] Dalton S. Pedagogy Matters: Standards for Effective Teaching Practice 1998. [EB/OL].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6d75h0fz>. 2020/10/10.
- [3] Devlin, M. & Samarawickrema, G. The Criteria of Effective Reaching in a 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 [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0(2): 111-124.
- [4] Dunn T.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n Alternative High School Program: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Learners* [D].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98.
- [5] Ellis, R. Editorial [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2(3): 285-287.
- [6] Ennis, R. *A Taxonomy of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and Abilities: Teaching Thinking Skills Theory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6.
- [7] Facione P. A., Facione, N. C., Giancarlo, C. A. F.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CCTDI* [M]. Millbrae, CA: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2001.
- [8] Kowalczyk N, Hackworth R. Case-Smith J. Perception of the Use of Critical Thinking Methods [J]. *Radiologic Technol.* 2012(3): 226-237.
- [9] Paul R. The State of Critical Thinking Today [J]. *New Directions for Community Colleges*, 2005(130): 27-38.
- [10] Smith L. *Re-conceptualizing Context From a Situated Perspective: Teacher Beliefs and the Activity of Teach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Science Reform* [D]. The University of Utah, 2002.
- [11] The Delphi Report.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Prepared for the Committee on Pre-college Philosophy* [M]. Millbrae, CA: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90.
- [12] Unal G, Ergin O. Bulus yoluyla fen öğretiminin öğrencilerin akademik başarılarına, öğrenme yaklaşımlarına ve tutumlarına etkisi [J]. *Turk Fen Eğitimi Dergisi*, 2006 (1): 36-52.
- [13] 蒋亚瑜 , 刘世文 .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现状剖析及有效性研究 [J]. 集美大学学报 , 2015 (3): 76-79.
- [14] 李加义 . 我国批判性思维综述 [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 2014(6): 135-138.
- [15] 刘伟 , 郭海云 . 批判性阅读模式实验研究 [J]. 外语界 , 2006(3): 14-18, 23.
- [16] 彭美慈 , 汪国成 . 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的信效度测试研究 [J]. 中华护理杂志 , 2004(9): 644-647.
- [17] 王璇 . 高校英语教师批判性思维认知现状研究 —— 以武汉市某高校为例 [J]. 长江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15(10): 67-69.
- [18] 文秋芳 . 论述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2008(2): 1-4.
- [19] 文秋芳 , 孙旻 . 评述高校外语教学中思辨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15(3): 6-12.
- [20] 邢红军 , 田望璇 . 课堂教学评价理论 : 反思与建构 [J]. 课程 . 教材 . 教法 , 2020(6): 53-58.
- [21] 吴维宁 . 专业化的课堂教学评价工具 RTOP 评介 [J]. 教师教育研究 , 2011(5): 76-80.
- [22] 周舒怡 , 董元兴 . 英语教师提问类型与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发展的实证研究 [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7(3): 87-92.

将思政教育融入商务英语阅读教学的探索

唐珍珍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系，海南 文昌 571321)

摘要：本文以商务英语阅读课程为例，结合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经验，阐释并剖析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授课教师的能力、素质及其对既有教学资源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整合，需要教师从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评价、教学总结与反思等多个环节进行充分思考和灵活调整，从而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实现对学生价值观念和能力素质的全方位引导。

关键词：课程思政；教学探索；商务英语阅读

An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TANG Zhenz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 way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based on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key lies in teachers' competence in digging and integrating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existing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ers need to ponder and flexibly adjust among the multi-links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evaluation, as well as teaching summary and reflection, so as to fully guide students in their values and qualities during the teaching of specialized cours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xploration;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0. 引言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课程思政”的理念最早发端于2014年上海高校推行的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打卡微学习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编号：Hnjg2019-1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珍珍，女，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后于 2017 年上升到国家层面，被写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成为全国高校的关注焦点，直接推动了高校课程内容体系和路径方式的进一步完善。教育部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印发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其目的在于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课程思政不是教师的孤军作战，不是重智轻德，不是主观片面，而是重德育德，注重价值引导，实现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在此背景下，占高校课程总量 80% 的专业课程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依托。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全国各高校围绕《纲要》所提出的分类推进、全程融入等具体要求，以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为突破口，掀起了一轮教学改革热潮，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以突出应用技术实践操作能力为特色的高等职业院校也应该加大力度推进课程思政和专业课程教学的融合。

1. 《商务英语阅读》课程思政教学的优势

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能够适应现代各类经贸活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商务英语阅读是商务英语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提升英语阅读能力，增加商务知识储备，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拓宽知识面与国际视野。

一方面，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决定了教学内容应凸显较强的实用性和工具性，注重对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综合培养；另一方面，该课程还包含丰富的人文元素，特别是注重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提升商务文化修养，培养职业道德素养，拓展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内容（见表 1），与思政教育资源的引入及设计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可从中挖掘出很多精神养分，进而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保障思政教育效果。

表 1 阅读文本主题的人文元素和课程思政要点

阅读文本主题	人文元素	课程思政要点
Western Cultures	国家文化	爱国、文化自信
Etiquette	商务礼仪	商务文化修养
Work	职业素养	职业道德素养、工匠精神
Business Environment	国际视野	爱国、“世界公民意识”

2. 课程思政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本文以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为教学对象，以商务英语阅读课程中的重要章节，即《世纪商务英语阅读教程（基础篇）II》（赵洪霞等，2018）中的“工

作态度”（“Work Attitude”）一章为例，从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评价、教学总结与反思等3方面探讨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教学方式，以期为高职院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并助力实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课程思政建设总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有必要探索培养德业兼修合格人才的教学模式。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将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教学有机融为一体，需要周密的策划设计。首先教师应围绕课程思政建设内容重点，结合授课需要，建构系统化的思政教育框架；其次要挖掘现有课程教育资源中与思政联系密切的元素，选择恰当的方式进行导入和深入探讨，引起学生共鸣，引发学生思考；最后通过拓展的方式来巩固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提升学生内驱力。在实际教学中，各环节的安排设置应详略得当、环环相扣，以达到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的目的（陈晓姣，2020）。本文以“工作态度”一章的教学过程为分析对象，详细阐述将课程思政的理念、要求及内容贯穿至教学活动的方式方法。

2.1 课程思政的教学导入

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曾指出，教育应贯穿于学生的兴趣之中。激发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关键在于导入环节，精心设计的教学导入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引导学生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换言之，导入的过程是搭桥、铺路的过程，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启发积极思维，为学习做好心理和知识准备。因此，课程思政教学的导入非常关键。依据章节特点，教学导入采用热点新闻，以One Doctor's Life on the Coronavirus Front Lines: “If We Fail, What Happens to You All”（一位抗疫医生的故事：“我不能倒下”）（*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04-04）作为切入，迅速将案例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起来，讨论并分析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直接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整章课程思政的有效展开作好铺垫。同时，也从侧面提醒并引导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关注时事，开拓视野。

2.2 课程思政在课堂教学中的融合

通过导入环节的铺垫，学生初步了解关于“工作态度”的主题阅读，并对所学内容有所期待。此时应紧抓学生的期待心理，顺势回到课堂内容。首先，列举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抱怨工作和热爱工作的正反面案例（刘英杰，2018: 38-40），引出“态度”的概念；然后引导学生预测不同案例的未来发展结果；进而引出主题，即不同的工作态度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

学习是一个不断归纳总结的过程，归纳总结有助于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在预测的过程中，学生通过仔细观察案例中的内在逻辑关系，归纳总结“预测”的英语阅读技巧要点，逐步掌握阅读技能，实现知识的过渡和转化。在富有成就感的课堂环境中，学生从心理上更乐于接受，为课程思政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接下来的练习环节，主要通过作答练习题帮助学生巩固阅读技巧。由于练习题均是与工作态度直接相关的内容，教师可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自主总结“积极工作态度”与“消极工作态度”的利弊，培养学生及时调整自身心态的意识，帮助他们未来直面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非母语者若要独立理解阅读内容，必须掌握所阅读文本约 98% 的词汇（Laufer & Ravenhorst-Kalovski, 2010: 15）。因此，商务英语阅读教学需重视学生对英语词汇的学习和掌握（唐珍珍，2020）。课前，布置学生提前预习生词，包括查音标、中英文释义和例句。课上，教师对重点词汇进行梳理和拓展。课后，要求学生根据喜好，发挥创造力，用至少 8 个本章节出现的生词编写不少于 5 句话的小故事，目的是在词汇输入的基础上加强词汇输出，提高学生的词汇运用能力。以下是某位学生使用“quit, talent, enroll, vacation, steady, capture, prevalent, recall”等生词编写的小故事：“Twenty-four years ago, Kobe Bryant decided to quit college and join NBA. He enrolled in NBA during a vacation. Thanks to his steady scoring and jumping ability, he was recruited by the Hornets and was immediately traded to the Lakers. Kobe instantly captured people's attention and won many fans. The color of the Lakers became prevalent on the street. That's my recalls of Kobe.”学生编写的这则小故事介绍了科比坚守职业，不断努力，从不退却，从不放弃，从不逃避，忍辱负重，在困难中创造奇迹的职业精神。此外，在教学中穿插与重点词汇密切相关且充满创意的讲故事环节，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开阔学生视野，激发阅读欲望，还能顺其自然地引入诸如工匠精神之类的思政要点。

通过对本章节课文 Why Are People Unhappy in Their Jobs?（人们在工作中为什么不开心？）（刘英杰，2018: 43-44）的深入学习，学生进一步了解职场中人们不开心的原因，并在讨论分享中意识到拥有正确的工作态度，爱岗敬业是商务人士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教学中还引入钟南山、袁隆平等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对工作乐此不疲的正面励志案例，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职业精神。

2.3 课程思政的拓展

主要教学任务完成之后，应引导学生做单元小结，其形式可以是语言知识汇总，也可以是行业知识总结，还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工具帮助学生及时回忆所学的主要内容，目的在于巩固专业知识内容的教学效果。在此基础上，可引导学生继续发散思维，即由工作态度引申到学生的学习态度，让学生大胆表达自己在学习中的疑难和困惑。通过互动，师生之间建立起基于情感信任的关系联结；一方面

有助于学生主动表达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促使教师根据学生的困惑和需求对教学内容和进度作相应做出调整，助力学生的成长。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充分认识到积极态度对学习和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并在心中埋下职业精神的种子。

商务英语阅读课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实践的能力，因此阅读文本不应局限于课堂内容，还要设置阅读拓展的实践，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外探索，拓宽视野，实现课程思政效果的可持续性。在教学实践中，效果颇佳的方式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阅读职场故事，合作撰写读后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激发其对专业领域的探索热情。就课外拓展的内容而言，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兴趣点，让学生自主选择课外学习的内容。本章节供学生选择的课外阅读文本有：*It's Never Too Late to Pursue a Dream, A Graduate Says. He Can Back it Up* (《活到老学到老：意大利爷爷 96 岁大学毕业》)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08-07), *Ruth Bader Ginsburg, A Pioneering Justice on Supreme Court* (《大法官的传奇一生》)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09-19), *How Tim Cook Made Apple His Own* (《库克如何把乔布斯的苹果变成了自己的苹果》)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08-07) 等。学生也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自主选择其他相关的课外拓展材料。

3.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方法

为检验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需要借以适当的评价模式对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及效果进行评估和总结，进而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由于课程思政评价的主观性较强，其教学效果评价方法的有效性也就成为难点和挑战。本文借鉴了陈晓姣（2020）的评价方法，指标及权重如表 2 所示。

表 2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

	学生评价（100%）		教师评价（100%）		
评分权重	70%	30%	30%	30%	40%
评价方面	课堂参与	思政收获	教师自评	教师互评	专家总评
评价内容	课前准备、课堂互动与问题回答、讨论参与、作业完成	心得体会	思政目标的完成情况、思政元素的融入情况、教学技能与思政能力的提升	目标体现、内容融合、效果评价	教学效果、意见与建议

3.1 学生评价

学生评价主要体现在课堂参与和思政收获两方面。课堂是学生思想品德素质淬炼提升的重要场所，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课堂

思政的效果。因此，教师要针对学生的课前准备、课堂互动与问题回答、讨论活动的参与及作业完成情况，制作课堂参与表现评分表，直接记录学生的真实状态。课堂参与评价通常可以采用直观的检核表、评价量表和轶事记录等方式（张文雯，2020），节省时间，也更加简便易行。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在网络教学平台（如“云班课”）发布主题讨论作业，鼓励学生分享学习收获，进而提高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同感。学生的课堂参与表现和思政收获评分都将折算纳入其平时成绩中，旨在吸引学生更好地参与并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

3.2 教师评价

教师评价是客观呈现课程思政引入效果的有效方式，具体包括教师自评、教师互评和专家总评。通过引入多维评价有助于保证教学评价的公正性和准确性，综合反映教师课程思政的教学情况。其中，教师自评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政目标的完成情况、思政元素的融入情况、教学技能与思政能力的提升情况。相较于主观性较强的教师自评而言，来自其他教师和专家的评价、建议则相对客观，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师自评的短板，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方式的优化改进。同行教师可随机听课，就目标体现、内容融合、成效展现3方面互评思政设计的契合度。课程育人中的专家推门听课，总体评价教学效果并给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有助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改进（陈晓姣，2020）。就“工作态度”一章的课程思政教学过程及其效果来看，授课教师在自评环节认为课程思政设计合理，思政目标顺利完成，思政元素融入得当，思政形式丰富多样，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思政引导能力得到一定提升，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效果。但仍有待同行教师和专家给出评价和建议，以便形成更为全面、客观和准确的教师评价结论。

4. 课程思政教学的总结和反思

4.1 教学总结

商务英语阅读课程现有教学资源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思政元素，授课教师应根据课程特点和要求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工具，力求将思政内容有机融合并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高职院校在商务英语阅读课中开展课程思政，一方面可以结合正、反面多项真实有效的案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场道德观；另一方面可通过介绍与知识点相关的名人轶事，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此外，还可以在阅读拓展的实践环节，鼓励并引导学生自主寻找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和时事新闻，将所学与实际联系起来，开拓视野，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激发学习主动性，逐步培养探索精神。

4.2 教学反思

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思政内容绝非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技能传授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从设计、实施及评价等多个环节作充分思考和灵活调整，

实现二者间的深度融合。作为课程思政的主导者、实施者和评价者，专业教师提升其自身素养是关键（杨爱美，2018；杨静，2019；冯惠芳，2020；闵翠，2020）。

首先，专业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的政治素质。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只有正确认识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才能切实提高课程思政的效果。要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发展，主动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和责任。

其次，专业教师要大胆创新，开创教育新体验。在课程目标设定、教学资源选定、教学设计与实施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积极挑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理念，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再次，专业教师要不断夯实专业知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快速更新，专业教师须学习前沿学科知识，了解语言和商务发展的最新动态，向学生传授最亟需的技能和知识。

最后，专业教师应牢记高等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以战士的斗志、深沉的情怀、广阔的中外视野，把爱国感情、社会责任、文化信念等内容融合到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进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 Laufer, B., Ravenhorst-Kalovski, G. C. Lexical Threshold Revisited: Lexical Text Coverage, Learners' Vocabulary Siz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J].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2010(22): 15-30.
- [2] 陈晓姣.高职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以“配位化合物”的思政教学为例 [J]. 化学教育（中英文），2020(8): 77-81.
- [3] 冯惠芳.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综述 [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0，40(6): 79-84.
- [4] 赵红霞等.世纪商务英语阅读教程（基础篇）II[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 [5] 闵翠.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以《综合商务英语》为例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10): 133-135.
- [6] 唐珍珍.学生词汇学习策略调查及在线词汇教学建议 [J]. 语言与文化研究，2020(20): 59-65.
- [7] 杨爱美.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及反思 [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2): 93-96.
- [8] 杨静.高职商务英语课程与德育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J]. 焦作大学学报，2019 (1): 83-84.
- [9] 张文雯.“互联网+”背景下形成性评价在思政课中的应用研究 [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 37(11): 37-44.

中美疫情新闻报道的言据性对比研究

薛亚红 卢亚楠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长春市解放大路中学,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在回顾言据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以《中国日报》(英文版)和《华盛顿邮报》的60篇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为语料, 对其中的据素类型及其使用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 在同题疫情新闻报道中, 中美主流媒体在言据性及其据素的使用方面共性远大于差异, 两者不仅各类据素使用频率相似, 而且其据素所体现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也相似。既表明中美两大主流媒体对疫情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要求一致, 也表明第三方信息源与新闻报道者拥有权威和话语权, 是客观公正的信息提供者。

关键词: 寨卡疫情 ; 言据性 ; 据素 ; 概念功能 ; 人际功能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videntiality in China and America's News Reports on Epidemic Situation Update

XUE Yahong LU Yana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videntiality, and with 60 news reports of Zika epidemic situation update taken from *China Daily* (English version) and *Washington Post* as its data, this article makes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evidentials and their use in the news reports on Zika epidemic situation update, and then analy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ideational function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function theory of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ore similarities than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evidentiality and use of evidentials in the same topic news reports on epidemic situation update in *China Daily* and *Washington Post*, which reflects from one aspect the real and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ews reports.

Key words: epidemic situation update; evidentiality; evidential; ideational metafunction; interpersonal metafuncion

基金项目: 本文为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语篇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编号: 2020B201) 和教育部项目“语篇—历史分析法框架下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与国家形象良性建构研究”(编号: 20YJA740027)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薛亚红, 女,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研究。

卢亚楠, 女, 长春市解放大路中学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

言据性¹（evidentiality）是一个语法范畴，用来表明说话人的信息来源及其对所述命题的态度评价和介入程度。言据性已是学界热点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言据性研究始于西方，较早见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博厄斯对言据性现象进行的讨论（Boas, 1947）。博厄斯第一次使用了“证素”（evidential）这个术语来指代语句中那些能够说明信息来源的“证据”（evidence）（Boas, 1947）。此后，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言据性的定义、分类及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Jakobson, 1957; Chafe & Nichols, 1986; Mushin, 2000; Mushin, 2001; Aikhenvald, 2003; Aikhenvald, 2004）。国内的言据性研究始于胡壮麟对西方相关研究的介绍以及对汉语言据性类型和表现形式所作的讨论（胡壮麟, 1994; 1995）。此后，国内学者对言据性范畴在语法系统中的地位、概念范围、言据性标记的语法化、语义对比和认知语用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张伯江, 1997; 严辰松, 2000; 牛保义, 2005）。朱永生（2006）在概述西方学界在言据性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艾亨瓦尔德和迪克森（Aikhenvald & Dixon）的做法，将言据性分为目击型和非目击型两种，同时分析了汉语言据性的形式标记，论述了汉语言据性的强、中、弱3种不同程度以及主观和客观两种基本取向。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对目前言据性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的方向（房红梅, 2006; 杨林秀, 2013），并对不同类型语篇中的言据性展开了研究（汤斌, 2007; 杨林秀, 2009; 王国凤、喻旭燕, 2011; 徐昉、龚晶, 2014; 冉永平、杨娜, 2016）。重点对言据性的语篇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言据性是语篇的一个重要特征，语篇言据性分析应包括据素的信度分析、语用策略及据素所体现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等（陈征, 2015; 陈征, 20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言据性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借鉴。然而，研究侧重言据性的语义特征、语法化及其在不同语篇中的使用，而言据性跨语言对比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关于新闻语篇言据性的跨语言对比研究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文依据穆欣（Mushin, 2001）对言据性的认知立场分类标准，从系统功能语法的纯理功能理论视角，对选自《中国日报》（英文版）和《华盛顿邮报》（时间跨度从2016年1月到2017年6月）的60篇寨卡疫情新闻报道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对比分析中美主流媒体关于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言据性的特点，旨在发现中美主流媒体的同题疫情新闻报道在据素类型、使用频率及其概念功能、人际功能方面的共性与差异。

1. 寨卡疫情新闻言据性的认知立场分类

如上所述，言据性是指说话人对信息来源以及可靠程度的说明。言据性在语法层面的体现被称为“据素”，主要有形态据素和词汇据素两种表现形式。形态

据素指某些语言中动词的前、后缀；词汇据素指动词、情态助动词、副词、形容词、副词短语等（房红梅，2006）。说话人言据性表达方式的选择因交际语境而异，言据性分类也与说话人参与信息构建的角色定位相关联。穆欣认为这种角色定位表现为交际主体的认知立场，即说话人选择表述言据语言方式时所带有的观点或态度（Mushin, 2001）。说话人在信息构建过程中，参与度越高，言据性所发挥的主体性就越强（冉永平、杨娜，2016）。这意味着说话人在选择言据性语言表达形式时，存在不同程度的主体取向。因而穆欣将认知立场分为事实类、转述类、推理类、个人感知类及想象类等5类（Mushin, 2001）。本文依据穆欣对认知立场的分类标准，将据素也分为以下5类。

1.1 事实类据素

事实类据素指说话人对信息来源做出零标记的语言形式（Mushin, 2001），主要以交际过程中参与者所共知的事实为依据，表现为交际者共有的文化习惯、一般常识、经媒体传播的公共信息等。这部分共知信息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不可挑战性等特征（冉永平、杨娜，2016）。研究发现，在《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有关寨卡疫情的新闻报道中，报道者使用了大量事实表述类据素形式（相关据素见以下各例中的划线部分）。例如：

- (1) The patient developed a fever when he returned to the city of Yiwu in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on Feb. 15 from Fiji and Samoa.

<China confirms another imported Zika case> *China Daily*

- (2) There were 122 birth defects out of more than 2,500 pregnancies.

<Zika birth defects in US territories similar to other places> *Washington Post*

从例（1）和例（2）可见，两大主流媒体的疫情相关报道在事实类言据性的语言表达上，多采用具体数字、时间指示语等来表述寨卡疫情突发事件的时间、地点、涉及人数等客观情境要素，这是因为疫情新闻报道多为客观描述，是不可挑战的事实，是通过媒体手段在某一区域内已被证实或已被大众所共识的信息。

1.2 转述类据素

转述类据素指说话人通过转述第三方话语而获取信息的语言表达方式（Mushin, 2001）。这类据素表明信息源自第三方，其可靠性程度也取决于第三方。转述类认知立场可分为间接转述和直接转述，如例（3）a 和（3）b。

- (3) a. John says that Peter is having a party on Saturday night.

b. John said, “Peter is having a party on Saturday night.”

穆欣（Mushin, 2001）认为，直接转述有如下语言特征：（1）明示第三方身份（如例（4）中的 GAQSIQ said）；（2）对时间、地点和人物指示中心的转换（如 last time）；（3）使用转述类词语（如例（5）的 according to...）。考察语料发现，转述第三方权威机构话语是疫情新闻报道者常用的言据性表达方式。例如：

(4) China confirmed a second imported Zika case on Monday, six days after the first was detected,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GAQSIQ) said.

<China confirms second imported Zika case> *China Daily*

(5) For infections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5 percent were affected, and in the third trimester, 4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CDC.

<Zika risk for birth defects drops for each trimester, CDC finds> *Washington Post*

在例(4)和例(5)中，报道者使用...GAQSIQ(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said和according to 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明示第三方的身份，通常是权威人士或机构，使所述信息“有据可查”，令人信服。类似的语言表达还有很多，如...suggested、...told、...announced等。

1.3 推理类据素

推理类据素²指说话人基于相关证据而推导出信息来源的语言表达形式(Mushin, 2001)，主要通过认知动词(如think、estimate、find等)、认知情态动词(如must、might、can等)、情态形容词(如likely、possible等)、程度性副词(如probably、undoubtedly、possibly等)以及一些表推断的短语(如it appears to、it seems to)等来表达。有时一些疑问句也用作推理据素。语料考察发现，寨卡疫情新闻报道者通常依据自己对事实证据的信任程度，选择相应的情态标记表述信息。例如：

(6) Also, Zika or its related products might even be used to develop novel diagnostics and therapeutics, just as in the case of many other toxins.

<Zika, Zika everywhere: Another tale of two cities> *China Daily*

(7) The number will almost certainly rise sharply in coming weeks, making it ever more likely that the virus will spread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Zika is expected to infect in 5 Puerto Ricans, raising threat to rest of U.S.> *Washington Post*

在例(6)和例(7)中，might与will是情态动词，almost certainly为程度性副词，它们都是推理类据素形式，用以表达说话人对事实证据的不同信任程度。

1.4 个人感知类据素

个人感知据素是指说话人亲身经历或感知的信息，表明说话人与原信息来源中的参与者体悟相同，主要通过第一人称指示语(如I、we等)、感官类动词(如see、hear、feel等)以及情感表达句式(如感叹句等)(Whitt, 2011)等来表明说话人愿意对所述信息的可靠性承担全部责任。中美寨卡疫情的新闻报道中个人感知类据素都较为少见，在随机选取的30篇《中国日报》新闻报道中甚至没有出现一处个人感知类据素，在随机选取的30篇《华盛顿邮报》新闻报道中也仅

出现 13 处个人感知类据素，如：

(8) Over the past year, we've seen the life-altering effects of the Zika virus on newborns.

<One year later, Zika still affects us all> *Washington Post*

(9) As we approach the one-year mark of this emergency response, we reflect on the lessons we've learned.

<One year later, Zika still affects us all> *Washington Post*

由于新闻报道要求客观真实，所以个人感知类据素在上述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出现较少，仅见于例（8）中的第一人称 we 和感知动词 seen 及例（9）中的第一人称 we 等少数个人感知类据素。

1.5 想象类据素

想象类据素是基于说话人在虚拟构建的空间获取信息来源的语言表现方式，如假设、打比方等 (Mushin, 2001)，语言上常表现为 wish、if、as if 等虚拟结构和比喻修辞等。这种据素形式表明说话人所陈述的信息并不真实存在，无法或很难被对方质疑或否定，属于虚幻性或揣测性信息 (冉永平、杨娜, 2016)，很少出现在新闻消息报道中。语料显示，《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中仅出现 3 处想象类据素，在《中国日报》中没有这种虚拟表达，如：

(10) If nature was threatening us with serious injury and evacuations via fire, flood or hurricane, the president could use his authority under the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to provide immediate aid without waiting for Congress to act.

<Zika is coming, but we're far from ready> *Washington Po*

从例（10）中可见，想象类据素较为常见的语言表达为 if 虚拟结构，表示对虚拟事件的假设和期许。

2. 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各类据素的使用情况对比

基于以上据素分类，我们对随机选取的 30 篇《中国日报》和 30 篇《华盛顿邮报》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各类据素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穷尽式考察，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类据素的使用频率

单位：百分比

据素类型	事实类	转述类	推理类	个人感知类	想象类	总计
《中国日报》	54.86	34.26	10.88	0.00	0.00	100
《华盛顿邮报》	51.00	32.40	14.80	1.46	0.34	100

表1显示，在两大主流媒体寨卡疫情的新闻报道中，事实类据素和转述类据素的使用均远高于推理类据素、个人感知类据素和想象类据素。其中，《中国日报》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事实类据素和转述类据素比《华盛顿邮报》中的略高，推理类据素略低，个人感知类据素和想象类据素没有出现。而《华盛顿邮报》中的个人感知类据素和想象类据素也极为少见，仅占1.46%和0.34%。

表1还显示，《中国日报》寨卡疫情新闻中事实类据素占54.6%，《华盛顿邮报》中占51%，均占各类据素之首。在随机选取的全部60篇寨卡疫情新闻中，59篇为纯消息报道，其主要目的是第一时间传递时疫信息，告知读者何时何地发生了何种疫情，因此多用事实类据素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展现真实情况。《华盛顿邮报》相关新闻报道中事实类据素使用频率略低于《中国日报》，这是因为《华盛顿邮报》中有一篇评论性报道，其中也偶尔出现了表达个人主观情感的据素（1.46%）。但总体来看，《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中事实类据素所占比例相当。

尽管直接证据证明消息的准确性是最可靠的，然而报道者不可能亲自去验证所有消息的真实性，因此，他们通常还会使用转述类据素，以转述第三方话语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凸显信息来源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标识信息的可信度。其次，有些报道者同时转述多个信息来源，以表明自己的中间立场，充分说明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卫生部列出38例寨卡病毒导致的天生缺陷，其它关于此方面报道的数据显示病例数将达100例。虽然转述类据素在《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使用频率相差不多，但在据素的种类上，《华盛顿邮报》要比《中国日报》丰富很多。当然，二者也有一些共同的据素表达，如...said, ...suggested, according to...等，其使用频率也相对较高。

推理类据素体现了推断的过程，人们利用有限资源做出推断，很可能造成误差。由于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为纯消息报道，即报道新近发生的寨卡疫情时事新闻，其主要社会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最有价值的时疫信息，因此，推理类据素使用频率较低。即使出现也大多有据可循，有比较权威的机构或人士作为信息来源等。《华盛顿邮报》仅在一篇评论性报道中，出现较多的推理类据素，而其它报道中几乎没有报道者使用第一人称进行直接推断的情况。这是因为报道者既要保证新闻的客观性，还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也就解释了推理类据素在两大主流媒体报道中使用频率不高的原因。

想象类据素是新闻报道者以已有的经验对事件作出主观判断。报道者寻找自己和读者之间共有的某种语境，构建某种假设基础，以期演绎得到的结论获得读者认同。假设虽非报道者的亲身经历，但也非道听途说，假设是基于现实之上的合理虚构，因而假设所得的结论不一定是现实。这种不确定性显然与新闻报道追求客观真实的行为准则相悖。不难理解为何想象类据素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中使用频率很低，在《中国日报》的报道中没有出现。

纯消息报道以传递消息为主要目的，强调消息的即时性、有效性及客观准确性。而个人感知类据素多表达个人的主观情感和经历，主语通常为第一人称 I 或者 we，这与纯消息新闻报道的目的是相悖的。在随机选取的 60 篇寨卡疫情新闻中仅有《华盛顿邮报》中的一篇新闻为评论性报道，因此出现了 1.46% 的个人感知类据素，《中国日报》中的寨卡疫情新闻均为纯消息报道，个人感知类据素为零。

总体而言，在《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关于寨卡疫情报道的新闻报道中，就各类据素的使用频率而言，其共性大于差异性。

3. 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据素的纯理功能对比

“纯理功能”是指在语言所必须完成的众多功能中，最为抽象、最具概括性的功能，它是语言所固有的，具有语言的普遍特征（Thompson, 2008）。韩礼德（Halliday, 2000）将纯理功能划分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语篇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三种类型。

概念功能指人们用语言来谈论他们对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用语言来描述周围所发生的情形或事件。概念功能主要通过“及物性”（transitivity）予以体现。“及物性”是一个语义系统，是关于小句表述“过程”（process）类型及所涉及“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的系统网络。它将人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即通过语法将经验进行范畴化，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在“及物性”系统中，人类的经验通过 6 种不同过程体现，即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人际功能指人们用语言与他人交往，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用语言影响他人的行为，并用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改变世界。人际功能主要体现为语气、情态、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等。言语具有 4 种基本功能，即给予信息、索取信息、给予货物和劳务及索取货物和劳务，它们的功能标签分别是陈述、提问、提供和命令（Thompson, 2008）。人际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说话人对自己所述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做的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表达的个人意愿。人际意义是由语法的情态系统来实现的（胡壮麟等，2005）。语篇功能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组织信息的方式，它表明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人们说话或写作时所处的语境的关系。

3.1 据素的概念功能

大部分据素都具有概念功能，只有少数据素由于缺少人类活动或事件发生动作，没有概念功能，如 according to 等。本文对选取的 60 篇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能体现概念功能的据素进行及物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主要据素的及物性分析

及物性	物质过程	言语过程	关系过程	心理过程	存在过程	行为过程
《中国日报》	48.38%	28.68%	16.21%	4.73%	2.00%	0.00%
《华盛顿邮报》	40.89%	29.14%	22.21%	4.70%	2.59%	0.47%

从表2可见，在中美两大主流媒体对寨卡疫情的新闻报道中，主要据素体现的及物过程比较相似，言语过程、心理过程以及存在过程的使用频率都很接近。这是因为在新闻语篇中言语过程发挥着独特作用，方便报道者清晰地陈述信息源头（何伟等，2017），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两大媒体转述类据素使用频率相近的原因。《中国日报》相关报道中物质过程的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中关系过程的使用频率相对较高，这说明《中国日报》的相关报道侧重对事件发生过程的描述，而《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则侧重对事物之间关系的反映。心理过程的使用频率均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心理过程是表达感觉、反应和认知的心理活动过程，而新闻报道注重真实性和准确性，仅凭感觉推测出的结果并不可靠，由此心理过程在两大主流媒体相关新闻报道中的使用频率都相对较低。限于文本体裁，据素的行为过程使用频率最低。行为过程在《中国日报》的相关报道中没有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中所占比例最低，仅为0.47%。分析各类据素使用频率发现，事实类据素和转述类据素均占很大比例，而事实类据素大多体现在物质过程中，转述类据素大多体现在言语过程中。

3.2 据素的人际功能

据素具有人际功能，是体现人际意义与实现人际功能的语言手段之一。通过这一功能，说话人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以此来建立或维系一定的社会关系（房红梅、方伟琴，2012）。在新闻报道中，报道者标注信息来源的结构通常为“主语+限定成分”，其中，限定成分由据素充当。考察发现，在所选取的60篇寨卡疫情新闻报道中报道者使用的小句类型几乎都是陈述句，是由“主语+限定成分”构成的“直陈语气”（indicative）范畴中的“陈述语气”（declarative），表明报道者与读者之间是一种给予信息和接受信息的关系。由于二者之间具有信息不对等性，且报道者处于给予信息的位置，这就增加了报道者和报道的权威性和唯一性（陶瑞，2010）。不同据素的使用体现了报道者选择对其所述消息承担责任的程度。例如：

(11)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work out truly what is going on,” said Oliver Brady,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who has been working with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on Zika.

<Zika virus now actively spreading in Miami Beach, CDC expands travel advisory> Washington Post

例(11)直接提及Oliver Brady, 明示其身份为流行病学家(epidemiologist)及其任职的机构为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和巴西政府(the Brazilian government)等。这些转述类据素的使用,一方面体现了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暗含了报道者对此消息认可的态度,同时也使报道者对此消息的可靠性承担或逃避责任成为可能。同样,事实类据素的使用也表达了报道者对所述信息的认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报道者希望与读者之间建立紧密关系。

情态同样可以反映报道者的态度和信息的权威性。根据商品交换的类型,情态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情态化”和“意态化”。如果交换的商品是信息,情态从可能性或者经常性角度来标记信息的可靠性程度,即情态化。情态化可以通过如will、would、should、can、could、must等情态动词或者probably、certainly、sometimes、usually、always等情态副词来表达。韩礼德还主张通过情态取向来判断不同情态类型是如何体现的。情态取向分为显性主观、显性客观、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4种。显性主观取向和显性客观取向都是隐喻性的,由小句(如I think..., It is possible that...)表达。隐性主观取向和隐性客观取向都是非隐喻的,由情态动词、情态副词或短语表达(如will、usually、be supposed to)。推理类据素的语言表达形式恰好实现了人际功能的情态意义。在《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中可以体现情态值的推理类据素的使用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推理类据素的情态分析

		《中国日报》			《华盛顿邮报》		
情态词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高值情态词	must need certainly	1	2.78	2.78	5 1 4	5.56 1.11 4.44	11.11
中值情态词	will would should probably usually	8 2 3 1	22.22 5.56 8.33 2.78	38.89	20 3 3 1 1	22.22 3.33 3.33 1.11 1.11	31.10
低值情态词	may might can could possible perhaps likely	5 7 7 2	13.89 19.44 19.44 5.56	58.33	10 0 26 6 3 2 5	11.11 0.00 28.89 6.68 3.33 2.22 5.56	57.79
总数		36	100		90	100	

表3显示，《中国日报》相关报道(12435字)中共出现36个情态词。其中，高值情态动词仅出现must一词，使用频率为1次，占总情态词的2.78%；中值情态词占38.89%，低值情态词占58.33%。《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30199字)中共出现90个情态词。其中，高值情态词为must、need和certainly，占总情态词的11.11%；中值情态词占31.10%，低值情态词占57.79%。可见，两大媒体相关报道中出现的情态词的情态值大都是中、低值的，如will、should、may、can等，而且它们的情态取向也大多是隐性主观型。从报道者的角度看，一方面要保证新闻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降低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很少使用直接表明自己观点和立场的言语。仅《华盛顿邮报》中有一篇评论性报道，报道者表达自己的观点较多，其目的在于鼓舞人们对抗寨卡病毒。

4. 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同题疫情新闻报道在据素的使用方面共性远远大于异性。二者各类据素使用频率相似，据素所体现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也相似，表明中美两大主流媒体对疫情新闻报道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是一致的，也表明第三方信息源与新闻报道者拥有权威和话语权，是客观公正的信息提供者。因此，事实类和转述类据素使用频率相对较高，推理类据素、个人感知类据素以及想象类据素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在体现概念功能的及物性方面，《中国日报》相关新闻报道侧重对事件发生过程的描述，而《华盛顿邮报》相关新闻报道则侧重对事件之间关系的反映。在体现人际功能的情态动词使用方面，《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均多使用中、低值情态词，较少使用高值情态词，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新闻报道对客观性的追求。

注释：

1. evidentiality 与 evidential这对术语有多种汉译名，如将前者译为“可证性”“言据性”“实据性”“传信性”“传信范畴”，将后者译为“证素”“据素”“传信语”“实据”“实证标记”等。本文依据房红梅(2006: 191)的译法，将前者译为“言据性”，来指说话人对信息来源和可靠性的说明；将后者译为“据素”，来指言据性的语言标记。
2. 这里的主要推理类据素是指除认知动词之外的、具有情态动值的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情态副词，统称为情态词。

参考文献：

- [1] Aikhenvald, A. & R. Dixon (eds.). *Studies in Evidentialit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 [2] Aikhenvald, A. *Evidential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Boas, F. (ed.).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C].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4] Boas, F. *Kwakiutl Grammar* [J].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7(3):

- 203-377.
- [5] Chafe, W. & J.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C]. Norwood: Ablex, 1986.
- [6]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7] Jakobson, R.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A]. In R. Jakobson (ed.). *Russian and Slavic Grammar* [C]. Amsterdam: Mouton, 1957.
- [8] Mushin, Ilana. Evidentiality and Deixis in Narrative Retell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 32(7): 927-957.
- [9] Mushin, Ilana. *Evidentiality and Epistemological Stance: Narrative Retelling*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10] Thompson, G. 功能语法入门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11] Whitt, R. A Cross-linguistic Survey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videntiality [J]. *Studies in Language*, 2011(1).
- [12] 陈征. 基于言据性的语篇可信性语用分析 [J]. 现代外语研究, 2014(4): 23-28+76.
- [13] 陈征. 论辩语篇言据性研究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 [14] 房红梅. 言据性研究述评 [J]. 现代外语, 2006(2): 191-196+220.
- [15] 房红梅, 方伟琴. 言据性的人际功能阐释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3): 33-37.
- [16] 何伟等. 汉语功能语义分析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 [17] 胡壮麟. 语言的言据性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1): 9-15.
- [18] 胡壮麟. 汉语的可证性和语篇分析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13-23.
- [19] 胡壮麟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0] 牛保义. 国外实据性理论研究 [J]. 当代语言学, 2005(1): 53-61+94.
- [21] 冉永平, 杨娜. 危机语境下媒体信息的言据性及其语用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6): 12-21+147.
- [22] 汤斌. 英语疫情新闻中言据性语篇特征的系统功能研究 [M]. 上海：复旦大学，2007.
- [23] 陶瑞.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新闻英语语篇特点分析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0(3): 61-64.
- [24] 王国凤, 喻旭燕. 汉英新闻语篇言据性类型学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2): 30-33.
- [25] 徐昉, 龚晶. 二语学术写作言据性资源使用的实证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4): 12-22+159.
- [26] 严辰松. 语言如何表达“言之有据”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1): 4-7.
- [27] 杨林秀. 英语科研论文中的言据性 [D]. 厦门：厦门大学，2009.
- [28] 杨林秀. 国内言据性研究：现状与展望 [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6): 64-68.
- [29] 张伯江. 认知观的语法表现 [J]. 国外语言学, 1997(2): 15-19.
- [30] 朱永生. 试论现代汉语的言据性 [J]. 现代外语, 2006(4): 331-337+436.

中国学习者朗读英语定语从句调群切分偏误研究

唐 穗 张丽娜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以哈尔滨英语学习者为例, 研究中国学习者朗读英语定语从句时调群切分有何偏误, 并探讨产生偏误的原因。研究发现: 学习者调群切分边界位置与英语母语者不同, 调群个数也比母语者多。学习者主要依赖停顿来实现调群切分, 而很少使用其他边界指征来切分调群, 而且停顿次数和时长都大于母语者。学习者常常把关系代词读成一个调群, 或者将其归属于主句调群。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可能一是英语定语从句的结构比较复杂, 学习者没能准确掌握焦点信息; 二是英汉两种语言的韵律特征差异较大, 学生易将汉语的韵律特征迁移到英语朗读中。

关键词: 定语从句; 调群切分; 调群边界指征

A Study on Chinese Learners' Tonality Errors of English Attributive Clauses

TANG Ying ZHANG L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onality errors of English attributive clauses made by Chinese learners from Ha'erb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learners divide tone group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from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nd into bigger number; learners mainly depend on pauses to realize tonality, rarely use other boundary indications to divide tone groups, and pause much more frequently and longer than native speakers; learners often read the relative pronoun as one tone group, or divide it with the main clause. These errors may be attributed, firstly, to the complicated structure of English attributive claus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learners to grasp the key information, and secondly, to the different rhythmic pattern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which may make learners attach Chinese rhythmic features to English reading.

Key words: attributive clause; tonality; boundary indications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方言区英语学习者语音习得机制的跨学科研究”(编号: 15ZDB1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唐 穗, 女,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张丽娜, 女,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硕士, 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0. 引言

调群是语调单位，通常与句法的吻合度较高，反映出语调、句法及信息三方面的关系（陈桦，2006）。调群切分是指将较长的话语流切分成与句法相关的片断（O'Connor & Arnold, 1973: 4）。中国 EFL 学习者对于英语句子的调群切分存在各种问题，尤其是对于复杂句子的调群切分。定语从句属于主从复合句，包含主句和从句，句子结构相对比较复杂，而且与汉语句子结构有较大差异，所以，中国 EFL 学习者定语从句的调群切分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不同的方言具有不同的发音特点，方言区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音语调会受其汉语方言发音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语音特征和偏误类型。因此，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语调，需考虑不同方言区学习者的语音特征。本文以哈尔滨 EFL 学习者为例，研究其朗读定语从句的调群切分特征，以探究其中的具体原因，进而提高其朗读能力。

1. 实验设计

本研究旨在回答如下问题：相对于英语母语者，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英语定语从句的调群切分有何特征或者偏误？出现这些偏误的原因是什么？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来自 AESOP-CASS (Asian English Speech Corpus Project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语音库。AESOP 是一项由亚洲多国承建的研究项目，目的在于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开放的语音数据资源。在录音设置、程序、核心数据设计和常用注释系统相一致的情况下，研究者通过此语音库可以探究亚洲英语的不同变体以及目标语言和母语之间的差异，进而研究母语迁移对二语语音习得的影响。AESOP-CASS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主导的中国各大方言区英语学习者语音库，我们从中选取了 6 名哈尔滨方言区英语学习者（3 男 3 女）的朗读语料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了 6 名英语母语者（3 男 3 女）的朗读语料作为参照。他们的朗读文本相同，是如下 5 个定语从句。

- (1)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for us.
- (2) Darkness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engulfed us.
- (3) He beat up the men who welshed on you.
- (4)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is not available in books.
- (5) That's from my brother who lives in London.

本文用 Praat 软件对选取的朗读语料进行标注，结合使用了 ToBI 和 IVIE 的标注系统，标注了单词层、音素层和间断指数层。提取的相关数据包括调群切分位置、调群个数、调群边界指征比例、停顿时长、关系代词时长等数据，并且用 EXCEL 生成图表。通过对哈尔滨 EFL 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数据，本研究试图发现哈尔滨 EFL 学习者相对于英语母语者在调群切分上的特征及偏误，并探

讨产生偏误的原因。

2. 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本文从 4 个方面阐述哈尔滨 EFL 学习者定语从句的调群切分特征：调群边界位置、调群个数、调群边界指征比例、关系代词时长和所属调群。

2.1 调群边界位置

下面两个表格分别是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 5 个定语从句(S1-S5) 的调群切分边界位置以及采用每种切分模式的人数。

表 1 英语母语者调群边界位置和人数

	句子调群切分位置 //	人数
S1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for us.//	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 that you did for us.//	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 that you did for us.//	2
S2	Darkness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 engulfed us.//	2
	Darkness //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 engulfed us.//	4
S3	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4
	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2
S4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is not available in books.//	4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is not // available in books.//	2
S5	That's from my brother who lives in London.//	5
	That's from my // brother who lives in London.//	1

表 2 哈尔滨 EFL 学习者调群边界位置和人数

	句子调群边界位置 //	人数
S1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for us.//	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 that you did for us.//	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 that you did for us.	1
	Thank you/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for us.//	1
S2	Darkness//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 engulfed// us.//	1
	Darkness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engulfed us.//	1
	Darkness //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 engulfed us.//	1
	Darkness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engulfed us.//	1
	Darkness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engulfed us.//	1
	Darkness// that// could almost be felt //engulfed //us.//	1

S3	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1
	He beat up the man // who welshed on you.//	1
	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2
	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1
	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1
S4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is not available in books.//	2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 is not available in books.//	1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is not available// in books.//	1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is not available in// books.//	1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eeking is not available in books.//	1
S5	That's from my brother who lives in London.//	5
	That's from my brother who lives in // London.//	1

从两个表格中的调群切分位置和人数统计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英语母语者调群切分位置遵循一定规则，一个句子有 2 种，至多 3 种切分模式，一致性较强。而哈尔滨 EFL 学习者的调群切分随意性较大，无规律可循，对同一句子几乎每一位发音人都有不同的切分方式。另外，学习者的调群切分位置也与母语者的切分不同。

哈尔滨 EFL 学习者的切分偏误可能是因为英语定语从句结构比较复杂，而且与汉语的句子结构差异较大，学习者在理解句子结构和语义上有困难。另外，这 5 个句子都有各自的特点，表达不同的语义，传达不同的信息，所以即便都是定语从句，调群切分模式也并不能一概而论，调群切分需要结合说话人所表达的信息焦点和句法关系来判断，这增加了学习者朗读英语定语从句的困难。

2.2 调群个数统计

表 3 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调群个数统计

	句子数	调群数	平均每句调群数
母语者 6 人	30	64	2.13
学习者 6 人	30	91	3.03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所朗读的句子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对句子的调群切分差异很大。哈尔滨 EFL 学习者划分的调群个数要远超英语母语者，换言之，哈尔滨 EFL 学习者在朗读中将句子切成更多片段，这样朗读出来的句子听起来断断续续，破坏了连续语流的流利性，会影响整个句子的语义表达和信息传递。造成学习者调群切分数目过多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如何正确切分调群不清楚，也可能是英汉两种语言的韵律差异造成的负迁移。英

语是重音节拍型语言，其节奏是在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有规律的交替变化中体现的，重读音节突显，发音比较长而饱满，非重读音节发音则短而弱，有连读、省音等现象。而汉语是音节节拍型语言，一字一节，每个字都发音清晰；而且汉语音节种类较少，双音节音步是主要的节奏模式。哈尔滨EFL学习者有可能会将母语朗读习惯迁移到英语朗读中来。

2.3 调群边界指征

克鲁特登(Cruttenden, 2002)提出了调群切分的四个边界指征：停顿、非重读音节的音高重设、起首轻音节和延时音节。这些指征可以在Praat语音学软件的频谱图中显示出来，具体情况如图1-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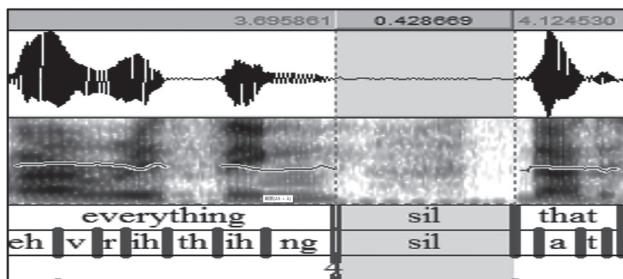


图1 停顿的频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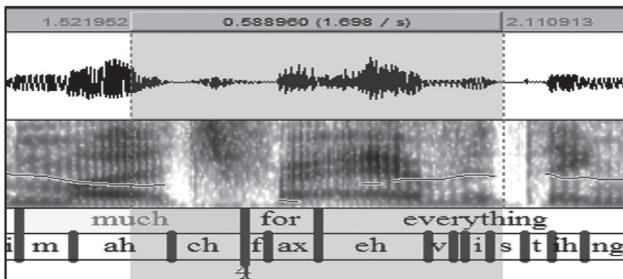


图2 非重读音节音高重设的频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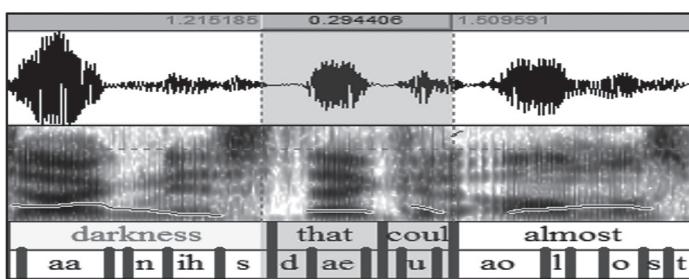


图3 起首轻音节的频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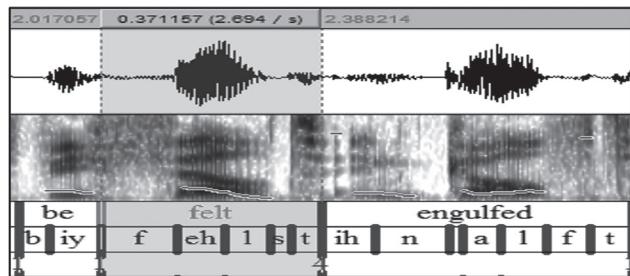


图 4 延时音节的频谱图

停顿是最常见的调群边界指征。停顿通常有两种形式：无声停顿和填声停顿。无声停顿在频谱图上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完全空白或非完全空白，非完全空白停顿一般为呼吸停顿（陈桦，2006）。如图 1 中停顿的频谱图中，“everything”和“that”之间就是一个非完全空白停顿。

非重读音节中出现音高水平和音高方向的变化常常成为调群的指征（Cruttenden, 2002）。如图 2 中非重读音节“for”的音高骤降，与前面音节的音高水平差异很大，“for”多被认作为调群的起点。

起首轻音节是指话语开头的一个或几个无重音音节，通常这种音节发音快而弱，被认为是一个新的调群的开始（Cruttenden, 2002）。例如图 3 中所示，“that could almost”均为非重读音节，发音较快，所以是新的调群的开始。

一个调群中最后一个音无论是不是重音，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延时。这种延时有时候也可以被认作是填声停顿，常伴有音高变化，通常是调群的一个边界指征（Cruttenden, 2002）。

调群的切分可以依据频谱图中这些边界指征判断，但研究者的听感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个人的经验也是判断调群切分的一个好方法。

根据克鲁特登调群切分的四个边界指征，我们统计出每个指征在这四个指征中所占比例，绘制成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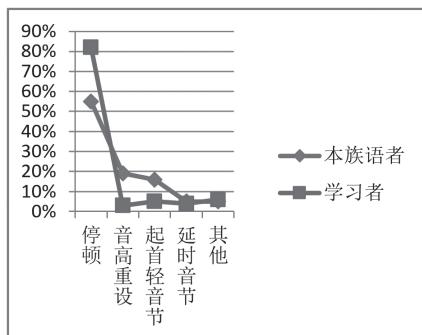


图 5 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调群切分边界指征比例

由图 5 我们可以看出，每个调群切分指征在哈尔滨 EFL 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朗读中所占百分比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停顿是调群切分最常见的手段，但哈尔滨 EFL 学习者使用停顿作为调群切分手段的比例非常大（82%），而英语母语者则是 55%。这说明哈尔滨 EFL 学习者在朗读中过多地依赖于停顿来切分语流。表 4 统计了停顿作为边界指征的情况。

表 4 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停顿时长统计

	次数	总时长	平均时长
母语者	17 次	1838 毫秒	108 毫秒
学习者	48 次	12030 毫秒	251 毫秒

由表 4 可以看出，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中停顿次数远远大于英语母语者，并且平均每次停顿的时长也长于英语母语者（251 毫秒 / 次 和 108 毫秒 / 次）。停顿的意义可能是突出信息焦点，给予听话人一个短暂的反应空间，并且使整个句子更有主次，而不是从一而终的平铺直叙。但是停顿意味着连续语流被打断。适当的停顿可以使信息焦点得以凸显，但如果停顿过多，则会使整个句子语义的表达变得支离破碎，信息的焦点也不能凸显出来。句子是一个整体，词与词的间隔太多或者时间太长，都会影响听者对整个句子的理解。

以下两图分别是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同一个定语从句 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的频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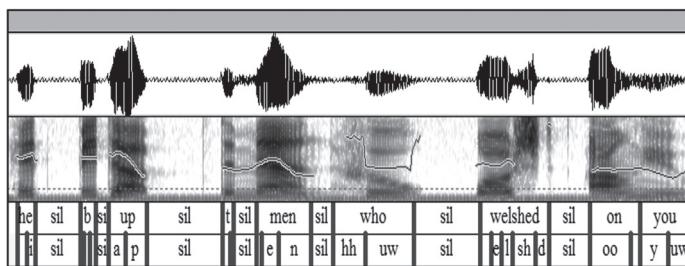


图 6 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定语从句频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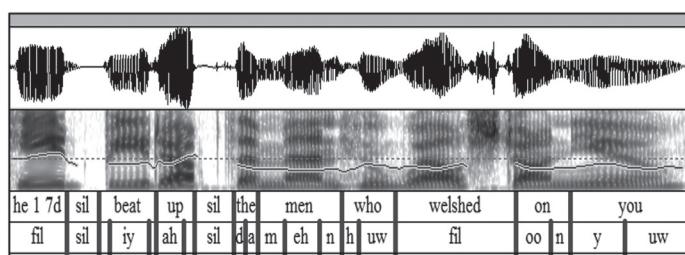


图 7 英语母语者朗读定语从句频谱图

对比图 6 和图 7 可以看出，同一个句子，英语母语者朗读时有两处停顿，而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时停顿高达七次。并且从基频曲线可以看出，英语母语者的基频曲线是连续的、有韵律的起伏，并且幅度不是特别大，没有突升和骤降的情况。而哈尔滨 EFL 学习者的基频曲线断断续续，停顿太多是主要原因，因为停顿不断发生，语流不断被打断，所以语调的起伏也加剧，有几乎近 90 度角的突升和突降。可见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句子时仍需多加练习以提升朗读流畅度。

从图 7 可以看出，英语母语者在“he”和“beat up”后面停顿，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这个例句的中文翻译是：他打了那个欠你账的人。联系句子语义和调群切分的关系，“he”后面的停顿是为了突出“打人”这个信息。而“beat up”后面的停顿突出的信息焦点是“man”，也就是整个定语从句的先行词。先行词通常情况下都会成为信息的焦点，而后面的定语从句就是为了修饰先行词。

相比之下，从图 6 可以看出，哈尔滨 EFL 学习者的停顿次数则过多，He //beat up //the man// who //welshed// on you.// 几乎每个词之间都断开了，一个连续的语流被不停地打断，使一个完整的信息被切成不同的语流段。其中几处的切分问题尤为严重：（1）关系代词“who”被处理成单独的调群，这在英语定语从句中不符合句法，也不符合语义；（2）“beat up”后面的停顿过长；（3）“welshed on you”被切分成两个调群，这与句法不相符，因为“welshed on”是固定短语，动词和介词搭配一起使用。学习者可能是因为对整体语义的把握和主从句之间句法关系不清楚，才会造成这种停顿时间过长，停顿次数过多的情况。

另外，从图 5 我们可以看出，英语母语者虽然把停顿作为切分调群的主要指征，但并不只是依赖这一种方法，而是和其他边界指征并用。非重读音节音高重设就是英语母语者常用的方法，合理应用音高重设切分语流的优势之一就是使朗读抑扬顿挫，更具韵律感。哈尔滨 EFL 学习者则过多依赖于使用停顿作为切分调群的方法，没有掌握其他几种调群切分方法。

2.4 关系代词时长及所属调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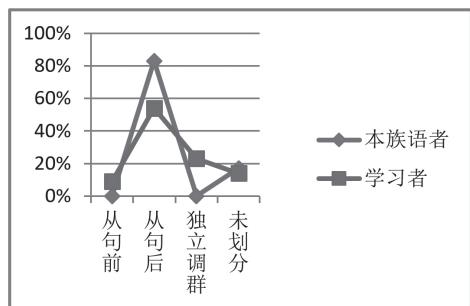


图 8 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关系代词所属调群

从图 8 可以看出,无论是英语母语者还是哈尔滨 EFL 学习者,大部分发音人都将关系代词切分到从句调群中。这种切分方式与定语从句的句法关系相吻合。定语从句是一个主从复合句的形式,从句是一个小句,包含主谓宾等句子成分。尽管从句成分完整,但它只是起到修饰前面先行词的作用,在整个句子中作定语。关系代词就是连接主句和从句的纽带,并且可以在从句中充当主语或者宾语,所以关系代词在句法结构上和从句是一体的,与从句是同一个调群,这符合句法关系。

英语母语者与哈尔滨 EFL 学习者把关系代词划分到从句调群中的人所占比例存在很大差异的(英语母语者中占 82%,哈尔滨 EFL 学习者中占 54%)。另外,9% 的哈尔滨 EFL 学习者将关系代词处理成独立调群,而英语母语者不会这样做。英语母语者没有将关系代词切分到主句中的情况,而哈尔滨 EFL 学习者中有此种做法的人则占 13%。从句法角度来看,把关系代词处理成单独调群或者切分到主句中都不与句法相符合。从语义角度来看,为了使前后信息紧密相连,语义衔接,关系代词不能作为独立的调群出现。学习者由于对定语从句关系代词应该切分的位置不明确,对于信息在调群上的体现没有清晰的概念,导致了调群切分时句子信息焦点模糊。

表 5 英语母语者和哈尔滨 EFL 学习者关系代词时长统计

	关系代词总时长	关系代词平均时长
母语者	4724 毫秒	157.5 毫秒
学习者	9800 毫秒	326.7 毫秒

另外,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哈尔滨 EFL 学习者除了对关系代词的调群位置不明确之外,他们在关系代词的时长也存在问题。他们读关系代词的时长(326.7 毫秒)远大于英语母语者(157.5 毫秒)。关系代词在从句中只是起衔接主从句的作用,并不是信息的焦点,所以不需要过长时间。这说明哈尔滨 EFL 学习者不能正确分析信息焦点。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中国哈尔滨 EFL 学习者朗读英语定语从句调群切分的偏误情况,并探讨了产生偏误的原因。研究发现:(1)与英语母语者相比,中国哈尔滨 EFL 学习者调群切分位置随意性较大,无规律可循,朗读相同句子调群边界位置几乎各不相同,而且与英语母语者切分位置也不同,调群个数也远超英语母语者。(2)中国哈尔滨 EFL 学习者在调群边界指征方面与英语母语者差异很大。学习者过多依赖停顿来实现调群切分,停顿次数和时长都远大于英语母语者,而且学

习者很少使用非重读音节的音高重设等其他边界指征来切分调群。（3）EFL 学习者不能正确认识关系代词的句法功能和信息传递功能，不知道关系代词应该归属从句调群，往往错误地将关系代词独立成一个调群，或者将其归属主句调群，而且关系代词的朗读时长过长。这些偏误导致句子朗读缺少韵律感，语义表达不连贯。

造成中国哈尔滨 EFL 学习者定语从句调群切分偏误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英语定语从句的结构比较复杂，与汉语的句法结构差异较大，这给学习者理解句子结构和信息焦点造成困难，因而不能正确切分调群。二是英汉两种语言的韵律差异较大，中国 EFL 学习者可能会把汉语的韵律特征迁移到英语朗读中。所以，在外语学习中学习者应该多听英语母语者朗读，体会其调群切分的特征，不断模仿练习，提高自己的朗读水平和口语表达能力。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A.K. *Intonation and Grammar in British English* [M]. Berlin: Mouton. 1976.
- [2] O'Connor, J. D & Arnold, G. F. *Intonation of Colloquial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3, (2).
- [3] Cruttenden, A. *Intonation* [M]. London: CUP. 1997,(2)
- [4] Cruttenden, A. *Intonation* [M].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陈桦 . 中国学生英语朗读中的调群切分模式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06(9): 272-277.
- [6] 陈桦 . 英语语调模式及其声学实现 [J]. 外语研究 , 2006(5): 9-18.

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附加疑问句语调特征研究

周晓凤 杨 迪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光华学院 英语系,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本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视角出发,对比考察中国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和美国本族语者附加疑问句的语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很少能灵活地调整语调模式,不仅不能在附加疑问句陈述部分将语调模式调整完毕,而且在附加疑问部分存在使用单调型模式问题。此外,中国学习者在陈述部分与附加疑问部分之间的停顿较大。由此提出英语口语教学既要提高学生对语调的认识,又要重视对学生的语调培养,才能不断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关键词:实验语音学;语调特征;附加疑问句

Intonation Patterns of Tag Questions of Chinese Northeastern EFL Learners

ZHOU Xiaofeng YANG Di

Abstract: A detailed contrastive study about the intonation patterns of tag questions of Chinese Northeastern EFL learners and American speakers was made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Chinese Northeastern EFL learners could change the intonation patterns flexibly, and they could not finish changing the intonation patterns in the statement part of tag questions thus using single intonation pattern in the following part. It is also found that Chinese Northeastern EFL learners make longer pause in the tag question than American speakers. This study makes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 words: Experimental Phonetics; intonation patterns; tag ques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方言区英语学习智能语音习得机制的跨学科研究”(编号:15ZDB103)和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中国东北英语学习者语音偏误类型和训练策略研究”(编号:JJKH20190219SK)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晓凤,女,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实践语音学、英汉翻译和英语教学等研究。

杨迪,女,长春光华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语调在口语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调不仅影响说话人的情感表达，还直接影响信息的传递。与本族语使用者相比，英语学习者在领悟英语语调特点并且在跨文化交际中正确运用语调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尤其在正确运用附加疑问句的语调方面。附加疑问句常用来征求意见、请求确认或证实、提出建议等，正确运用附加疑问句的语调不仅是英语学习者英语精通度的体现，更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前提。

1. 研究背景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Searle, 1975），陈述句常用来表示陈述的言语行为，疑问句用来表示探询的言语行为。附加疑问句的陈述句部分是一个断言命题，表明说话者的观点，而其疑问句部分表示的内容更为丰富。说话者根据自己的意图对疑问句部分使用不同的声调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如升调通常表示对命题的迟疑或不确定，降调通常表达对命题的确定。夸克等人认为，附加疑问部分读升调时，全句表示请求听者对断言命题的真实性给予证实；附加疑问部分读降调时，全句表示请求听者对断言加以证实（Quirk, 1985: 811）。

近年来，随着英语教学研究的深入推进，学者们开始关注学习者语音语调的研究。特别是实践语音学的兴起，为研究语音、语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展丰富的研究。相较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研究数量还很有限，研究范围和深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牛保义（2005）从动态语法的角度探究了附加疑问句结构形式和语义功能的产生与发展，认为附加疑问句是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叠加，附加疑问句的语义功能是把探询言语行为“嫁接”到陈述言语行为之上。陈桦（2006）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探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在附加疑问句语调分节、调核位置、声调方面的差异，发现中国学习者采用无标记调核的比例低于本族语者，在使用有标记调核时，实义词项比例大大低于本族语者。邵鹏飞（2013）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考察了山东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和美国本族语者附加疑问句和一般疑问句语调特征的差异，结果显示大多数山东方言区英语学习者习惯使用升调，且音高域值比美国本族语者大；而在一般疑问句语调特征方面的差异则没有附加疑问句的明显。

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英语学习者的语音语调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既可以为英语口语教学提供理论上的补充，又可为口语教学实践提供具体借鉴的方法。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不同的方言在语音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操方言者在学习英语口语时，势必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些特点迁移到英语语音的学习中，造成一些“方言腔”英语的出现。通过研究不同方言腔的特征，可以清楚地了解操方言者在语音方面的偏误，进而找到提高英语口语的有效方法。通过上述文献可知，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探究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附加疑问句语调特征的相关研究

尚未展开。因此，本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视角探究东北方言区(以长春、大连为例)英语学习者附加疑问句语调的特征，将其与美国母语发音者的语调模式做对比，详细呈现东北方言区学习者附加疑问句语调方面的偏误，并尝试分析产生偏误的原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共8人，其中4名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自长春和大连(每个城市各1男1女)，4名母语发音者来自美国(2男2女)。长春是吉林省省会，作为东北三省重要城市之一，其方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连是辽宁省重要的城市，且大连话的语调特征与其他城市有着显著差异。所以这两个城市的方言可以作为东北方言区的代表。

2.2 语料收集

附加疑问句疑问部分的语义依附于前面的陈述句，常用来征求意见、请求确认、提出建议等。根据不同语义，调查中选取了如下6个句子：

Sen1 It's wonderful weather, isn't it?

Sen2 Come over here a minute, will you?

Sen3 Give me some cigarettes, can you?

Sen4 She seldom goes to the cinema, does she?

Sen5 I haven't seen you before, have I?

Sen6 We couldn't do it, could we?

以上语料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承建的AESOP-CASS语料库中东北方言区的部分语料。录音在安静环境下进行，录音设备为笔记本电脑和森海塞尔PC166USB耳机。

2.3 数据处理

首先，用自动切分程序对录音音频中的音节和元、辅音进行切分。其次，手动对边界和离散基频点进行细致的调整，接着通过Praat采用IviE和ToBI标注系统对语调模式进行标注，标注层级包括：(1)正则层：录音人句子中的词语，包括单词层(WORD)和音素层(PHONE)；(2)间断指数层(BT)：分为1、3和4共3个等级，1代表词边界，3代表中间短语边界，4代表语调短语边界；(3)突显层(PT)：用P(prominent)来标注突显音节；(4)语音层：用H/L/M描述突显音节的特征，h/l/m来描写非突显音节的特征，该层和间断指数层中间短语边界对应；(5)音系层：对发音人的语调形式进行描述，音高重音用L*、H*、L+H*、L*+H以及H+!H*符号表示，带*的音高特征跟突显音节对应，在突显音节和边界音节之间由短语重音相连，短语重音用L-、H-表示，边界用

H%、L% 表示。最后，对 F_0 曲线进行人工调整，保留元音，删除辅音。

用 Praat 打开提取英文数据的脚本，提取基频曲线的数据，每个元音提取 10 个点的基频值并且生成在 excel 表格中，随后对表格中生成的数值进行整理和对数转换，以便在接下来的消音公式中使用。为了消除不同发音人的个体差异，本研究使用朱晓农（2004）的 z-score (LZ) 转化法： $Z_i^t = \frac{y_i - m_y}{s_y}$ ，其 $y = \log_{10} x^i$ ， m_y 和 s_y 分别是 y_i ($i=1, 2, \dots, n$) 的算数平均值和标准差。接着进行以下步骤（以 Sen1 为例）：用上述公式求出 8 个录音人共 8 个 LZ 值；将所有 LZ 值复制到一个表格中；观察 8 个句子的 F_0 曲线变化情况，将 F_0 曲线变化一致的分为一组；求出每组 LZ 值平均值；分别全选每组 LZ 值且插入带平划线和数据标记的散点图；得出每组发音人针对同一句话的不同音高对比图。Sen2 至 Sen6 重复上述步骤。

3. 结果与讨论

下列散点图中标题为录音人的录音内容，分别与 Sen1-Sen6 对应。从词内的每个元音中提取 10 个点为一组，元音之间留有空隙以示区分。纵坐标为相同调型发音人 LZ 值的平均值，横坐标为标准化时间。散点图右侧的“CNLs-RF”“CNLs-FR”“CNLs-R”分别代表中国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在附加疑问句的附加疑问部分使用升降调、降升调和升调；“NSs-R”“NSs-F”“NSs-FR”分别代表美国本族语使用者在附加疑问句的附加疑问部分使用升调、降调和降升调，以上所有调型使用不同颜色以示差异。

3.1 附加疑问句（陈述部分为肯定句）语调模式特征

我们知道，说话人通过附加疑问句的陈述句部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在附加疑问部分使用降调 (F)，代表其对自己陈述句部分观点的确定性，言外之意是希望得到他人对自己观点的认可；反之，如果说话人在附加疑问部分使用升调 (R)，代表对自己陈述句部分观点的不确定性，言外之意为向他人征求意见。从图 1—图 4 可知，当附加疑问句陈述部分为肯定句时，所有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在附加疑问句的朗读中，附加疑问部分全部使用升调 (R)，而所有美国本族语使用者在附加疑问句的附加疑问部分使用单一的升调 (R) 或降调 (F)。换言之，美国本族语使用者在陈述句的最后已经将声调调整完毕，所以附加疑问句部分的语调都是单一的，要么升调，要么降调。

如图 1 所示，与美国本族语使用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语调变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当附加疑问句的陈述部分为肯定句时，部分中国英语学习者希望通过变换附加疑问部分的语调来得到听话者的肯定或否定回答。当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附加疑问部分使用双调型，升降调 (RF) 或降升调 (FR)，美国本族语者只使用单一的升调 (R) 或降调 (F) 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音高总是高于美国本族语者。

但在陈述句部分的句末，他们的音高几乎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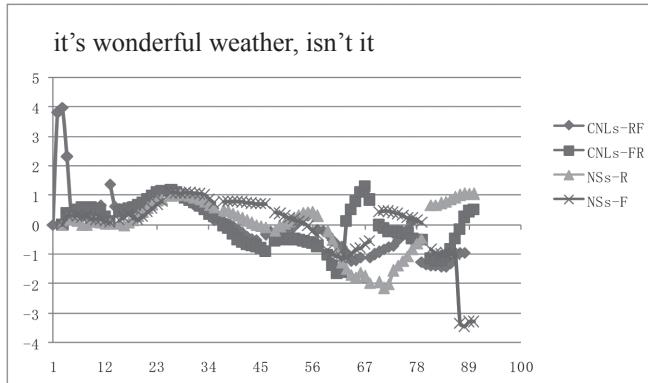


图1 Sen1朗读语调对比

从图2所示的附加疑问句内容可以看出，说话人欲征求建议。在陈述句部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a”处与美国本族语者相比有明显的音高提升，说明未能很好地注意连读性。在附加疑问部分，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了降升调(FR)，而美国本族语者使用了升调(R)，即在附加疑问部分调型使用上，前半段有差异而后半段一致。观察发现其差异在于美国本族语者在陈述句部分的末尾已经将调型调整完毕，降调全部结束，因而在附加疑问部分可以实现使用单一的升调。与使用双调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相比，美国本族语者可以使听话人更加清晰地领会其说话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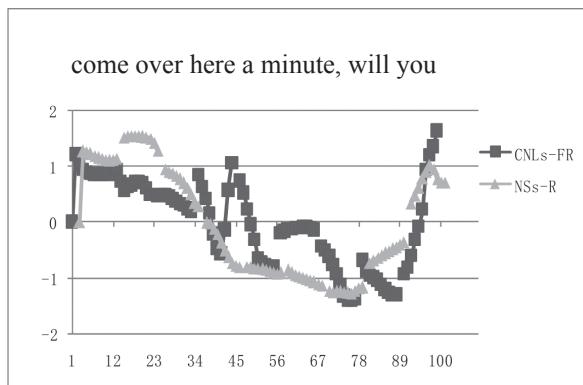


图2 Sen2朗读语调对比

图3中，与美国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附加疑问部分使用的语调非常单一；美国本族语者却能灵活调整语调，以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当陈述句部分是否定句时，情况如此；当陈述句部分是肯定句时，情况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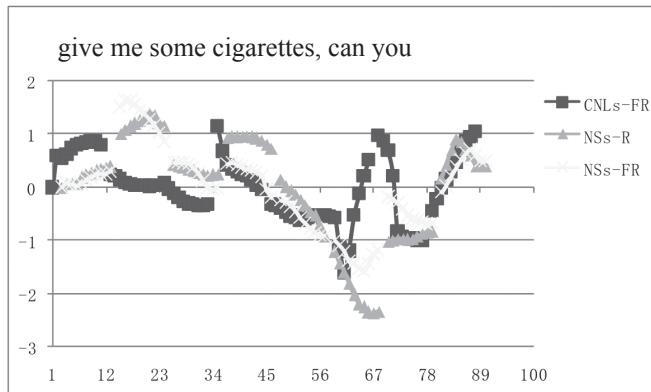


图3 Sen3 朗读语调对比

图4是6个散点图，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英语学习者和美国本族语者音高相似，但附加疑问部分，与美国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未能灵活变换语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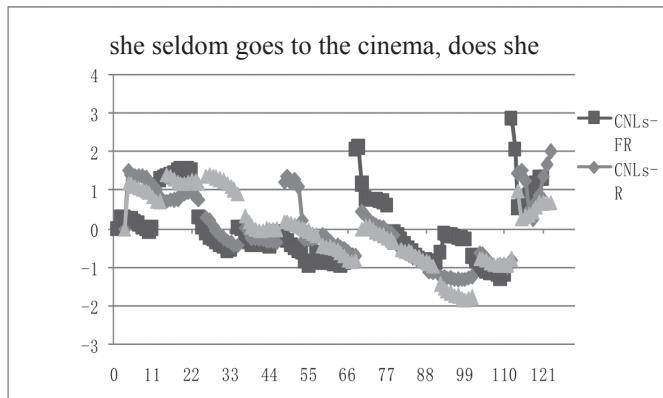


图4 Sen4 朗读语调对比

3.2 附加疑问句（陈述部分为否定句）语调模式特征

如图5和图6所示，当附加疑问句的陈述部分为否定句时，在否定词“haven't”和“couldn't”部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美国本族语者朗读的音高重合，说明中国学生能够很好地注意到句子的焦点。但如图5中菱形块连缀成的线所示，在朗读“before”一词时，中国学生明显提升了音高，说明他们认为句子中不只含有一个焦点。在附加疑问句部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美国本族语者都能灵活使用调型，且音高几乎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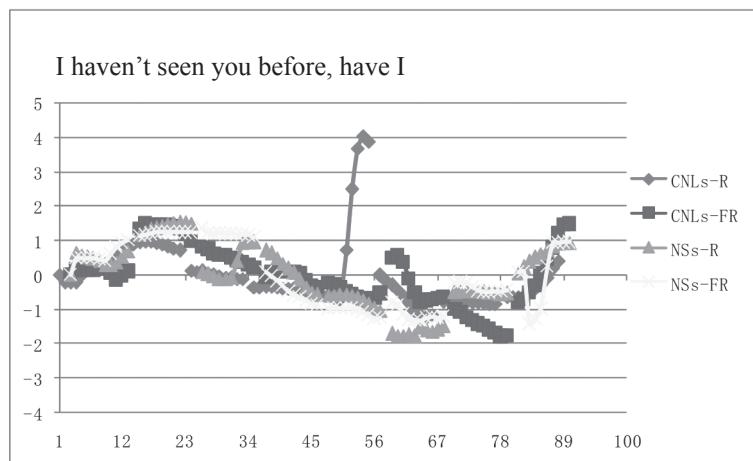


图 5 Sen5 朗读语调对比

从图 6 可知,与美国本族语者相比,在附加疑问句部分,中国学生只使用了单一的降升(FR)调。可以看出,当附加疑问句陈述部分为否定句时,中国学生通过在附加疑问部分使用降升(FR)调,来表达自己对陈述句部分的不确定,希望得到听话人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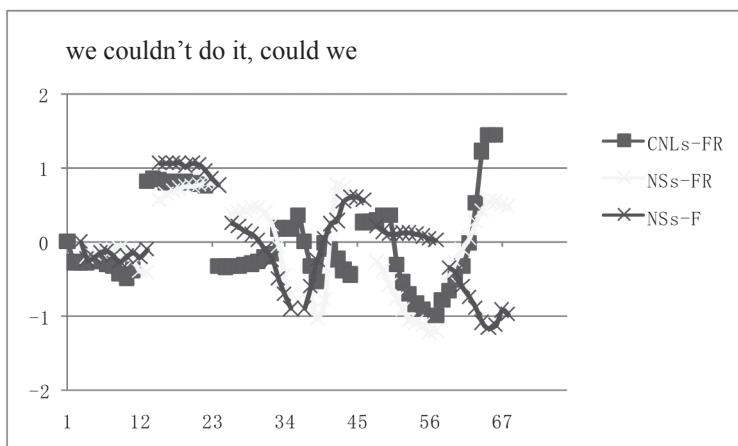


图 6 Sen6 朗读语调对比

3.3 附加疑问句句中停顿时长比较

图 7 中横坐标是本研究中使用的 6 个句子,纵坐标是附加疑问句中陈述句部分和附加疑问部分中间的停顿时长,单位为秒。横线条形的高度对应的是中国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停顿的平均时长,斜线为美国本族语者的平均时长。从图 7 中可以明显看出,与美国本族语者相比,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在读附加疑问句

的附加疑问部分之前有明显的停顿，平均时长为 0.21 秒；而且在大多数附加疑问句中，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有较明显的停顿。然而美国本族语者停顿不是很明显，平均时长为 0.17 秒。中国英语学习者停顿较长，虽然不排除对录音句子不熟练的因素，但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把附加疑问句理解为两个独立的小句子，即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的并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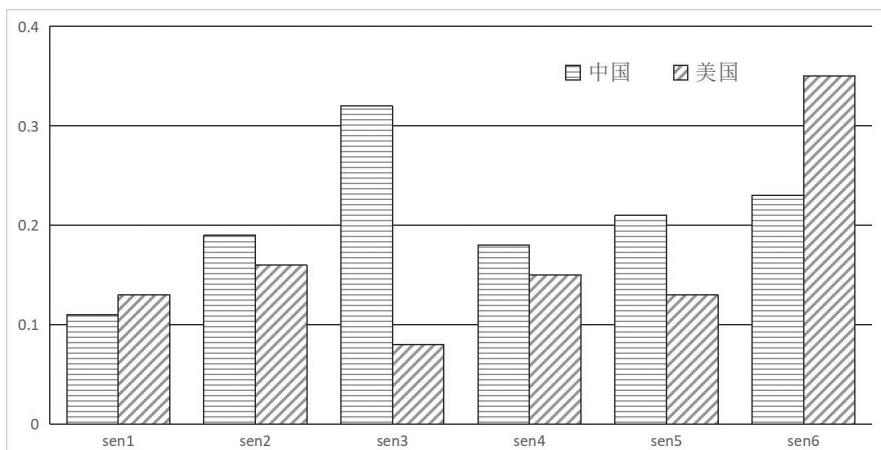


图 7 附加疑问句句中停顿时长对比

4. 结论

通过分析数据可知，首先，中国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可以较好地掌握附加疑问句的语调，通过变换语调模式来传递不同的语义，但大部分人在附加疑问句陈述部分不能将语调调整完毕，因而导致在附加疑问部分使用双调。其次，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在附加疑问句中没有注意到语句连读性问题，对句中焦点理解有偏差。虽然这两点对语调影响不明显，但却影响听话者对说话人说话内容的理解。最后，与美国本族语者相比，东北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在附加疑问句中停顿时间较长，原因是他们将附加疑问句的两部分看作是独立的两个小句子。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附加疑问句是英语中的常用句型之一，正确掌握语调与意义的关系，可以大大提升学生对该句型的理解，进而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不恰当的英语语调不仅妨碍学生口语习得，而且还会造成交流困难。因此，英语教师在口语教学中既要提高学生对语调的认识，又要重视对学生的语调培养。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发现学生口语问题，不断探索有效解决方法。

由于本文样本数量小，只涉及 8 个研究对象和 6 个朗读的句子，所以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性，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今后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一是长春方言和大连方言的语音特点对学习者语调习得的影响性研究；二是英语口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语调意识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85: 811.
- [2] Searle, John R. Speech Acts and Recent Linguistics [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75, 263(1): 27-38.
- [3] 陈桦. 英语学习者朗读口语中的调核位置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6): 32-38.
- [4] 牛保义. 英语附加疑问句的动态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3): 187-191+240.
- [5] 邵鹏飞, 贾媛, 李爱军. 山东方言区英语学习者附加疑问句的语调特征 [A]. 第十二届全国人机语音通讯学术会议论文集 [C]. 2013: 209-214.
- [6] 朱晓农. 基频归一化——如何处理声调的随即差异 [J]. 语言科学, 2004(2): 3-19.

越文化中的概念隐喻研究

——以《越绝书》为例

王 敏

(绍兴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地域文化隐喻的跨文化研究对推动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指导, 考察《越绝书》中越文化概念隐喻类型、意义、特点和功能。研究发现, 《越绝书》中的概念隐喻主要包括家庭隐喻、疾病隐喻、建筑隐喻、人体隐喻、植物隐喻、动物隐喻和容器隐喻 7 种类型。通过跨语言对比, 概念隐喻植根于民族认知与文化体验的普遍性和民族性是采取不同隐喻翻译策略的根本原因。由此提出隐喻翻译的有效策略是分析原文中的隐喻生成机制, 选择适当目的语隐喻源概念, 建构目标概念。

关键词: 越文化 ; 《越绝书》 ; 概念隐喻 ; 英译 ; 汉语隐喻

The Stud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Yue Culture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Glory of Yue*

WANG Min

Abstract: The stud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Chinese culture is of great concer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owever, there is relatively less stud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regional culture. Guided by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Glory of Yu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ypes, meanings,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of Yue Culture. By categorizing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on the basis of source domain, 7 type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found in *The Glory of Yue*, namely FAMILY METAPHOR, DISEASE METAPHOR, BUILDING METAPHOR, BODY METAPHOR, PLANT METAPHOR, ANIMAL METAPHOR and CONTAINER METAPHOR. With cross-language analysis, it's found that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adapting different metaphoric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lies in conceptual metaphors which are rooted from the universality

基金项目: 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研究“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地方特色课题“《越绝书》英译研究”(编号: 135D02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 敏, 女, 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

of national cognition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conceptual metaphor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en construct the target concept by the means of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Yue Culture; *The Glory of Yue*; conceptual metaphor; English translation; Chinese metaphors

0. 引言

隐喻所表现出的文化特殊性和普遍性备受学界关注。科维克瑟斯 (Kövecses) 指出，每个文化都会用不同文化方式来组织人生体验，这些体验主要以居于中心地位的隐喻 (central metaphors) 为特征 (Kövecses, 2005:184)。束定芳 (2017) 认为隐喻研究的重点是汉语隐喻系统性和中国文化中概念隐喻的特点。因此，已有中国文化中概念隐喻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隐喻，如贾冬梅和苏立昌 (2013) 对古代汉语中“天”的概念隐喻研究；二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隐喻，如於宁 (2011) 考察奥运会宣传片中的多模态隐喻，贾冬梅、苏立昌 (2014) 考察现代汉语中“天”的概念隐喻，卢卫中等 (2019) 考察政治话语中的概念隐喻；三是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视角进行隐喻研究，如蓝纯和贾冬梅 (2020) 关于“五行”背后的隐喻和转喻的研究。近年来，隐喻跨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关注重点，但总体来说，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仅有的研究为孙毅等 (2018) 分析了跨语言的建筑隐喻。鉴于鲜有学者对地域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进行跨语言研究的现状，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指导，以先秦古籍《越绝书》中英文版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越文化中概念隐喻的跨语言研究。通过将概念隐喻理论应用于古籍整体语境中，考察汉英同义隐喻表达，并透过隐喻语言揭示先秦越文化的概念系统。

1. 概念隐喻

隐喻是一种基于人类体验对范畴进行概念化的过程，表现为由始源认知域向目标认知域的映射，即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的过程 (卢卫中, 2019)。

温格瑞尔和施密特认为概念隐喻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解释性隐喻和结构性隐喻 (Ungerer & Schmid, 2006: 153)。莱考夫和特纳提出隐喻的结构性表现为始源域具有高度组织结构，而目标域相对缺乏内部结构 (Lakoff & Turner, 1989: 135)。

不同映射域 (mapping scopes) 决定概念隐喻实现的认知功能不同。映射域分为贫乏映射 (lean mapping) 和丰富映射 (rich mapping)。特定的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贫乏映射主要用于突显目标概念的个别特征，特定的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丰富映射主要用于为抽象目标概念提供一个具体的概念结构 (Ungerer & Schmid, 2006: 127)。

此外，研究者们还发现概念隐喻是个复杂的系统，有结构和层次之分 (束定

芳, 2017)。於宁认为概念隐喻包含了“复杂隐喻”(Complex Metaphor)“命题”(Proposition)和“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Yu, 2011)。因此, 映射方式贫乏还是丰富, 决定了概念隐喻的结构和层次。

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框架, 运用始源域和目标域、贫乏和丰富的隐喻映射等理论, 具体分析选定语料中的概念隐喻, 探索其复杂性、层次性和结构性。

2. 研究对象

越文化, 属吴越文化之细分, 是指江南地区的于越部落先民遗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越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宝贵的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张太原, 2019)。王永昌(2005: 1)认为越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其分布、传播范围远涉整个东亚乃至环太平洋地区。越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对于中华文化研究和当代国际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价值。

越文化区域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先秦, 就有《国语》中的《越语》发其先声。汉人所编写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最早的区域专史(李学勤, 2004: 1)。越文化研究专家陈桥驿认为, “在古籍中, 曾经记载于越历史的, 主要有《国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四种, 其中后两种是当地著述, 其内容远比前两种丰富。而《吴越春秋》又无法与《越绝书》相比”(张仲清, 2009: 340)。越地越人的先秦文献《越绝书》是于越留下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 是后人研究越文化的重要源泉(陈桥驿, 2005: 4)。

本文选取的中文语料为最新版《越绝书译注》(张仲清, 2009), 英文语料选取的是首部《越绝书》英译本——汉学家米尔本的译著《越国的光荣: 越绝书注释译本》(The Glory of Yu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Yuejue Shu)(Milburn, 2010)。通过文本细读和跨语言对比研究, 整理归纳《越绝书》中的概念隐喻类型, 尝试分析其隐喻特点和功能, 以期为《越绝书》的隐喻翻译策略提供参考。

3. 《越绝书》中的隐喻类型、特点和功能

科维克瑟斯(2010: 18-22)研究发现, 源域主要包括人体、健康与疾病、动物、植物、建筑、机械与工具、游戏与竞赛、货币与经济贸易、烹饪与饮食、冷热、光与暗、力、运动与方向等13种。本文以上述始源域为分类依据, 将《越绝书》中的概念隐喻总结归纳为家庭隐喻、建筑隐喻、疾病隐喻、人体隐喻、植物隐喻、动物隐喻和容器隐喻等7种类型。

3.1 家庭隐喻

《越绝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家庭隐喻为: 国家是家庭。始源域为家庭, 目标

域为国家。利用家庭的概念来建构国家概念，将家庭概念的结构性特征投射到国家概念上，发挥隐喻的结构性功能。

例 1

- a. 今夫万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越绝计倪内经第五》）¹
- b. 老百姓家里有聪明的父母，也同国家有贤明的君主一样。
- c. Now for ordinary people having wise parents is just like the country having an enlightened ruler. (Chapter five, *The Book of The Young Master of Accountancy*)

例 2

- a. 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徽成其事而已，则家富不衰矣。（《越绝计倪内经第五》）
- b. 父母懂得交易生财之道，指明交易的道理和方法，交给贤能的儿子去做，激励他把生意做好就可以了，那么家庭就会富裕兴旺了。
- c. If parents who take advantage of the ebb and flow are enlightened in their rules, and employ their wise children to undertake their business, then the family will be rich and will not decline. (Chapter 5, *The Book of The Young Master of Accountancy*)

例 3

- a. 夫父子之为亲也，非得不谏。谏而不听，家贫致乱，虽有圣子，亦不治也，务在于谀之而已。（《越绝计倪内经第五》）
- b. 父子的关系是至亲，所以做儿子的又不得不劝。劝而不听，导致家庭贫困失和，即使有贤明的儿子也不会去专心治家，而是尽力讨好父母罢了。
- c. For there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s and sons there must be criticism. If you are criticized and do not listen, then your family will be impoverished and troubled. Even if there is a wise son, [such a family] will still not experience good governance. They will just flatter him. (Chapter 5, *The Book of The Young Master of Accountancy*)

家庭隐喻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性，包含以下简单隐喻：治国是治家，国君是父母，臣子是子女（例 1）；治家的方法是让贤子管理，治国的方法是让贤臣管理（例 2）；家庭组织内部的关系映射到国家组织内部的关系，即君臣关系是亲子关系，处理君臣矛盾的正确方式是臣子劝谏国君，错误方式是臣子讨好国君（例 3）。忠臣对待国君如子女侍奉父母，强调奉献精神，如例 4 中吴国忠臣伍子胥对待国君如同尊重自己的父亲一样；佞臣期待从国君处得到好处，如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好处，本质为索取，如例 5 中吴国佞臣伯嚭认为亲子关系是以父亲给予子女益处为基础。忠臣和佞臣差别关键在于对待国家的态度，强调奉献还是索取，可以借助亲子关系的概念去理解。

例 4

- a. 子胥曰：“臣闻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行，报父之仇，不可。”（《越绝吴内传第四》）
- b. 伍子胥说：“我听说侍奉君主跟侍奉父亲一样，败坏君主的德行（声誉），去报杀父之仇，是不应该的。”
- c. I have heard it said that serving a lord is like obeying a father. 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me to damage [your interests] while taking revenge on my father's enemy. (Chapter Four, *The Men of Wu*)

例 5

- a. 太宰嚭对曰：“臣闻父子之亲，张户别居，赠臣妾、马牛，其志加亲；若不与一钱，其志斯疏。父子之亲犹然，而况士乎？”（《越绝请籴内传第六》）
- b. 太宰嚭回话说：“我听说，即便父子这样的亲情，儿子另立门户之后，你如果常送奴仆牛马之类的给他，那他心里就会感激，更加亲近你；如果一个儿子都不给他，那他心里就会不满，从此疏远你。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君臣之间呢？”
- c. Prime Minister Pi replied: “I have heard that when a father and son live in separate households, [the father] must give [the son] servants and concubines, horses and cows if he wishes to remain close. If he does not give him a penny, they will become estranged.” (Chapter Six, *Asking for Food Aid*)

计倪（例 1—例 3）、伍子胥（例 4）和伯嚭（例 5）都借用家庭隐喻向国君阐释君臣关系和治国方略。越王勾践接纳“奉献君臣观”，任用贤臣，虚心纳谏。越国君臣同心，其利断金，使得吴国在吴越争霸中获得最终胜利。吴王夫差则听信伯嚭“索取君臣观”，任用佞臣，直接导致吴国在吴越争霸中失败。

表 1 家庭隐喻中英文表达

例句	中文源概念	英文源概念	中文目标概念	英文目标概念
1	明父母 万民	wise parents ordinary people	明主 邦	an enlightened ruler the country
2	任贤子，则家富	If parents employ their wise children, then the family will be rich	任贤臣，则国富（原文省略，根据上下文分析）	任贤臣，则国富（原文省略，根据上下文分析）
3	谏而不听，家贫致乱	If you are criticized and do not listen, then your family will be impoverished and troubled.	国贫致乱（原文省略，根据上下文分析）	国贫致乱（原文省略，根据上下文分析）
4	事父	obey a father	事君	serve a lord
5	若不与一钱，其志斯疏	If he does not give him a penny, they will become estranged.	省略	

从表 1 可知，《越绝书》的家庭隐喻中，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映射是丰富映射，家庭隐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如亲子关系中父亲要听得进批评，君臣关系中君主要听得进臣子的谏言，都属于复杂隐喻，而“家庭是国家”是复杂系统中的基本隐喻。

3.2 疾病隐喻

《越绝书》的政治文论中，还有一类典型的概念隐喻：国家是病人。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存在丰富的映射域，产生多层次隐喻，如兵败的越国是病人，治国方略是良药（例 6）；将亡的国家是病人，谏言是良药（例 7）；敌国是疾病（例 8 和例 9）。

例 6

- a. 是时勾践失众，栖于会稽之山，更用种、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学乃时而行，此犹良药也。”（《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
- b. 越王勾践战败、丢掉了大片国土和民众，只带着几千残兵退守会稽山上，于是改用文种和范蠡的策略，社稷得以保存。正如舜所说能虚心学习、听取正确意见，而且能随时落实在行动上，这就好比一剂良药呀。
- c. At this time, Goujian has lost the support of his people, and was besieged on top of Kuaiji Mountain. He then began to use Zhong and Li's plans again, and he was able to survive [the crisis]. In the past, Shun once said: "Put what you have learned into practice at the right time, this is the best medicine." (Chapter Eight The Record of Fan Bo)

例 6 中所含的概念隐喻为：兵败的越国是病人。勾践采取了文种和范蠡的计策，计策是良药，治愈了越国的疾病，转败为胜。

例 7

- a. 《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身死不为医，邦亡不为谋。”（《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
- b. 正如《传》上所说，人到将死的时候，就讨厌闻到酒肉的气味；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也就讨厌听到忠诚的话语。所以人注定要死了，就不必再替他找良医，国家注定要灭亡了就不必再替它出谋划策。
- c. There is a saying that runs: “When a man is about to die, he is disgusted when he smells the fragrant odours of wine and meat; when a state is about to fall, no one wants to listen to the words of a loyal minister.” When a person is dying there is no point calling in a doctor; when a state is imploding it is not going to be saved by government initiatives. (Chapter Eight The Record of Fan Bo)

例 7 中的基本隐喻为：将亡的国家是病人，忠臣的谋略是良药。将亡的国家如果讨厌忠臣的话语，如病人拒绝良药，所以注定要灭亡。

例 8

- a. 越曰：“善哉！王兴师伐齐也。越在我犹疥癬，是无能为也。”（《越绝请余内传第六》）
- b. 伯嚭说：“大王兴师讨伐齐国，真是太好了！越国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比身上生了小疔疮，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 c. “Yue is like an itch, they cannot actually do anything.” (Chapter Six Asking for Food Aid)

例 9

- a. 申胥曰：“越在我犹心腹有积聚，不发则无伤，动作者有死亡。欲释齐，以越为忧。”（《越绝请余内传第六》）
- b. 伍子胥说：“越国对于我们来说，譬如心腹有疾患，不发作就不会伤害你，一旦发作就会要了你的命。希望大王放弃讨伐齐国的计划，而把越国当作后患来解决。”
- c. He replied: “Our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Yue is like that [of a patient with a disease] of the heart. If you do nothing, no harm will come. However an unconsidered action will result in death. Please let Qi go, you should be worrying about Yue instead.” (Chapter Six Asking for Food Aid)

例 8 中，伯嚭把越国对吴国的威胁隐喻为疥癩，认为其危害小。吴王夫差听信伯嚭判断，对越国放松了警惕，出兵攻打齐国。实际情况却如例 9 中伍子胥所说，越国对吴国的威胁是心腹之患。由于吴王夫差错误判断形势，导致吴国转胜为败，最终被越国所灭。

温格瑞尔和施密特指出，自从莎士比亚在《理查德二世》冈特的演讲里使用过以后，“国家是病人”就成了政治家惯用的隐喻 (Ungerer & Schmid, 2006: 150-151)。从认知术语来说，政治受众和民众通常易于屈从疾病这类隐喻，并将其作为概念框架中的结构组成部分。《越绝书》中的疾病隐喻也证明了政治隐喻的结构功能和情感功能（见表 2）。

表 2 疾病隐喻中英文表达

例句	中文源概念	英文源概念	中文目标概念	英文目标概念
6	良药	the best medicine	种、蠭之策	Zhong and Li's plans
7	将亡之邦	a state about to fall	将死之人	a man about to die
	为谋	government initiatives	为医	call in a doctor
8	疥癩	an itch	越	Yue
9	心腹有积聚	[of a patient with a disease] of the heart	越	Yue

3.3 建筑隐喻

《越绝书》中的政治隐喻中还包括建筑隐喻，具体表现为：国家是建筑物。丰富的隐喻映射包括：治国策略是门，国家根本是人民。孙毅（2018）总结的英语和汉语中关于“建筑”概念隐喻表述，其中“最根本的是地基”和“途径是门”在《越绝书》中均有体现。如例 10 中体现了概念隐喻：国家是建筑物，仁义是治国策略（门路），人民是国家根本；为了打开门路，巩固基础，君主需要提高修养。

例 10

- a. 计倪对曰：“夫仁义者，治之门；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阖门固根，莫如正身。”（《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
- b. 计倪对越王勾践说：“仁义是治国的门路，人民则是君王立国的根本。要使门路畅通，根基牢固，莫过于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 c. Jini replied: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are the gates to good government; knights and the common people are fundamental for the ruler. When opening that gate and laying those foundations, you must rectify yourself.” (Chapter Eleven, *The Outer Tradition of the Young Master of Accountancy*)

表 3 建筑隐喻中英文表达

例句	中文源概念	英文源概念	中文目标概念	英文目标概念
10	治之门	the gates to good government	仁义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君之根本	fundamental for the ruler	士民	knights and the common people
	阖门固根	open that gate and lay those foundations	正身	rectify yourself

3.4 人体隐喻

在古代汉语中，天和地是抽象的概念。《越绝书》的《吴内传第四》章节中，范蠡为了向越王勾践说明天道、地道和人道，使用了“天是人，地是人”的概念隐喻。天道如同人道一样，盛而不骄，养育万物（例 11）。地道如人道一样，持养万物，施予且不夸耀自己的功德（例 12）。

例 11

- a.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言天生万物，以养天下。（《越绝吴内传第四》）
- b. 天的规律是充满而不外溢，与盛德而不居功自傲，是说天生育万物，来养育天下。
- c. Thus when Way of Heaven is full but does not overflow, when it flourishes

without becoming complacent, it means that Heaven gives birth to myriad things, and nourishes the world. (Chapter Four, *The Men of Wu*)

例 12

- a. 地道施而不德，劳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长五谷，持养万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劳而不矜其功者矣。（《越绝吴内传第四》）
- b. 地的规律是施予，但不以为是自己的恩德，辛劳但不夸耀自己的功绩，是说大地生长五谷，蓄养万物，功德圆满而且广大，这就是所谓施予，但不以为是自己的恩德，辛劳但不夸耀自己的功绩。
- c. It is the Way of Earth to bestow its blessings without considering virtue, and to labour without becoming arrogant about its success. This means that the Earth gives birth to the five grains, and nourishes myriad things, full of merit and ample of virtue. (Chapter Four, *The Men of Wu*)

表 4 人体隐喻中英文表达

例句	中文源概念	英文源概念	中文目标概念	英文目标概念
11	盛而不骄	flourish without becoming complacent	天道	the Way of Heaven
	生育万物	give birth to myriad things	天的功绩	the Heaven
12	施而不德	bestow its blessings without considering virtue	地道	the Way of Earth
	劳而不矜其功	labour without becoming arrogant about its success	地道	the Way of Earth
	生长五谷	give birth to the five grains	地的功绩	the success of the Earth

3.5 植物隐喻

在《越绝书》第五章《计倪内经》中，计倪向越王勾践讲述用人策略，由于人生来天资各有不同，国君用人以贤能为要，不以长幼为序。将人才隐喻为植物，种子决定树木的种类，来自父母的基因也决定人的素质。植物概念隐喻表现为人是植物，天资是种子。

例 13

- a. 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越绝计倪内经第五》）
- b. 计倪回答说：“人与人本来就不一样。聪明的父母生出圣明的儿子，痴呆的父母生出愚狂的儿子；桂树的种子长成桂树，桐树的种子长成桐树；年纪大的人对于世事未必能够全知，年纪轻的人对于世事未必都不清楚。”
- c. Men are certainly not equal. Clever people have wise children, and stupid people

give birth to idiots. Cassia seeds create more cassias, and paulownia seeds create more paulownias. Those who were born earlier are not necessarily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and those who were born later are not necessarily incapable of enlightenment. (Chapter Five, *The Book of the Young Master of Accountancy*)

种子决定树木的种类，来自父母的基因也决定人的素质。所以桂树种子长成桂树，聪明的父母生出圣明的儿子。

表 5 植物隐喻中英文表达

例句	中文源概念	英文源概念	中文目标概念	英文目标概念
13	桂实生桂 桐实生桐	cassia seeds create more cassias paulownia seeds create more paulownias	惠种生圣 痴种生狂	clever people have wise children stupid people give birth to idiots

3.6 动物隐喻

动物是常见的始源域之一。《越绝书》宣扬任贤选能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文中多使用动物隐喻来说明贤臣和小人的区别，告诫君主亲贤臣，远小人。贤臣良士是骐骥（例 14），小人佞臣是狼（例 15）或豕（例 16）。

例 14

- a. 夫何氏之璧，求者不争贾；骐骥之才，不难险阻之路。（《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
- b. 譬如何氏之璧，想得到它的人就不会理会价钱的高低，千里良马，寻找它的人就不会去畏惧艰难险阻的道路。
- c. Someone who wants to own the jade bi of the He family cannot haggle over price. [Someone who wants to buy] a horse like Qiji is not put off by a dangerous journey. (Chapter Eight, *The Record of Fan Bo*)

例 15

- a. 尧舜虽圣，不能任狼致治。（《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
- b. 尧和舜虽然非常圣明，但也不能任命残暴凶狠的人来治理国家。
- c. Even though Yao and Shun were sages, they could not have governed well if they had employed a pack of wolves. (Chapter Eighteen, *The Narratives of Virtue*)

例 16

- a. 王不亲辅弼之臣而亲众豕之言，是吾命短矣！（《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
- b. 君王不把忠臣当作亲信，却听从你们这些猪猡们的话，看来吴国命运不会

长久了。

- c. His majesty does not care for supportive and helpful ministers, but he does trust the words of those pigs! (Chapter Eighteen, *The Narratives of Virtue*)

表 6 动物隐喻中英文表达

例句	中文源概念	英文源概念	中文目标概念	英文目标概念
14	骐骥	a horse like Qiji	人才	省略
15	狼	a pack of wolves	佞臣	employ
16	众豕	those pigs	佞臣	ministers

3.7 容器隐喻

袁毓林（2004）认为在容器图式认知模式指导下，凡是有边界或能构想出边界的物理空间都是容器。进一步将这一容器概念映射（mapping）到更为抽象的领域，也就形成了各种容器隐喻。《越绝书》中“魂”被概念化为容器，而“魄”是盛在这个容器中的内容或容物（例 17）。

例 17

- a. 魂者，橐也；魄者，生气之源也。（《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
 b. 魂好比鼓风器，魄好比气产生的源头。
 c. The hun soul is the container, while the po soul is the source that gives rise to life-force. (Chapter Sixteen, *The Pillow Book*)

表 7 容器隐喻中英文表达

例句	中文源概念	英文源概念	中文目标概念	英文目标概念
17	橐 生气之源	the container the source that gives rise to life-force.	魂 魄	the hun Soul the po Soul

综上所述，在《越绝书》隐喻类型中，家庭隐喻、疾病隐喻、建筑隐喻和人体隐喻使用了丰富映射，体现了概念隐喻系统性、复杂性和层次性的特点，彰显了概念隐喻兼有解释性和结构性的功能，而植物隐喻、动物隐喻、容器隐喻则使用了贫乏映射，体现了概念隐喻的解释性功能。

4. 《越绝书》的概念隐喻翻译

沙夫纳认为认知语言学理论指导的隐喻翻译，不仅是寻找不同语言间的对等关系，而且还是探索两种概念系统间的对等关系（Schaffner, 2004）。概念系统的对等是隐喻翻译的目标。译者需要分析原文中隐喻的生成机制，选择适合的目的语隐喻源概念，建构目标概念。始源域与目标域的结合是由人的身体经验、社

会经验以及文化经验促成的（贾冬梅、苏立昌，2013）。概念隐喻在建构概念系统中发挥着认知工具的作用，所以具有一定的跨语言普遍性，表现为相同的始源域。只有少数概念隐喻植根于特殊文化和思维方式，具有语言特殊性，表现为始源域的不同语言形式。因此，译者需要根据始源域的具体表现形式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保留或替换原文中的始源域。

如上文表 1—7 所示，概念隐喻的中英文语言形式存在对等与不对等两种情况，体现了译者采取的两种翻译策略。第一，保留原文始源域的表现形式，实现语言形式的对等，如例 14、15 和 16。第二，替换原文始源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例 8、9 和 17。例 8 中，概念隐喻的始源域为疾病域，中文形式是“疥癣”，英文语言形式为“itch（疥疮）”。译文词语内涵意义大体相同，中英文表达的目标概念都是小毛病。例 9 中，中文形式是“积聚”，中医指腹内结块的病症。西医与中医存在较大文化差异，译者仅译出“disease”（疾病），这一上位范畴概念。例 17 中，原文“橐”为鼓风机，而英文用“container（容器）”来翻译，用上位范畴来代替具体下位词。译文词汇外延意义扩大，但译文达到了概念对等的效果和目的。

从《越绝书》的概念隐喻实例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概念隐喻时，对目标域的处理上更多采用了趋向原文的方式。译者采取音译和意译结合的方法，保留隐喻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目标概念，如明主、贤臣、谏、谀、仁义、天道、地道、魂、魄等概念。克勒普弗曾指出：“越大胆，越具有创新性的隐喻，更容易在另一个语言中重复使用”（Snell-Hornby, 1995: 5）。“魂”和“魄”分别翻译为“the hun soul”和“the po soul”，音译和意译结合，保留了目标概念的原文化术语，达到翻译文本的概念对等。

5. 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以始源域为分类依据，《越绝书》中的概念隐喻主要包括家庭隐喻、疾病隐喻、建筑隐喻、人体隐喻、植物隐喻、动物隐喻和容器隐喻 7 种类型。概念系统的对等是隐喻翻译的目标，隐喻翻译的有效策略是分析原文中的隐喻生成机制，选择适当目的语隐喻源概念，建构目标概念。通过对比《越绝书》中英文版本的概念隐喻，了解了人类概念化的特征。始源域表现出跨文化普遍性，而目标域则彰显不同民族的认知和文化特色。植根于民族认知与文化的概念隐喻是采取不同策略进行隐喻翻译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中，采用的翻译策略应尽量保留目标概念，对始源域概念的具体形式作出适合目标语言和文化的处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与翻译理论结合，为隐喻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角度，有利于推动跨文化交流。

注释：

1 《越绝书》全书十九章，体裁分为内经和外传。便于读者了解例句语篇语境，整体把握概念隐喻在语篇宏观结构和意义建构中发挥的功能，文中例句中的文言文原文（a）和现代译文（b）来源于《越绝书译注》（张仲清，2009），中文章节题目采用标题+体裁+序号的命名方式。例句的英文译文（c）来源于《越国的光荣：越绝书注释译本》（Milburn, 2010）。例句后出处仅标明其所在文本章节标题，不再详细标注页码。

参考文献：

- [1] Lan, C & D. Jia. Conceptual Metonymies and Metaphors Behind SHUI (WATER) and HUO (FIRE) i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J].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2020(2): 281-310.
- [2] Kövecses, Z. *Metaphor in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 Kövecses, Z.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5] Milburn, O. *The Glory of Yu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Yuejue Shu* [M]. Leiden: Brill, 2010.
- [6] Schaffner, C.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J]. *Target*, 2004(1): 93-106.
- [7]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8] Ungerer, F. & H.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Pearson Longman, 2006.
- [9] Yu, N. Beijing Olympics and Beijing Opera: A Multimodal Metaphor in a CCTV Olympics Commercial [J]. *Cognitive Linguisticism*, 2011(22-23): 595-628.
- [10] 陈桥驿. 简述越文化研究历史 [A]. 费君清，王建华编. 海峡两岸越文化研究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2.
- [11] 贾冬梅，苏立昌.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读古代汉语中“天”的概念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3): 10-16.
- [12] 贾冬梅，苏立昌.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读现代汉语中的“天”概念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5): 8-15.
- [13] 李学勤. 序. 费君清编. 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 [14] 卢卫中，李一，徐云秋，管琳. 中国政治话语隐喻及其翻译研究——以十九大报告为例 [J]. 翻译论坛，2019(1): 12-18.
- [15] 束定芳. 隐喻研究的若干新进展 [J]. 英语研究，2017(2): 71-79.
- [16] 孙毅，王黎. 跨语言建筑隐喻异同的体验哲学及文化理据疏议 [J]. 外国语言文学，2018(4): 339-355.
- [17] 王永昌. 序. 费君清，王建华编. 海峡两岸越文化研究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
- [18] 袁毓林. 容器隐喻、套件隐喻及相关的语法现象——词语同现限制的认知解释和计算分析 [J]. 中国语文，2004(03): 195-208+286.
- [19] 张太原. 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 [N]. 中华读书报，2011: 11-23(015).
- [20] 张仲清. 越绝书译注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文本的自我指涉与审美潜势

——威廉·加斯的文学语言观

孙明明

(大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威廉·加斯在考问文学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观。即通过强调文学语言的内在自足性与审美性，消解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单一对应关系，突出文学语言的建构意义，从而鼓励文学创作者通过想象，不断发挥文学语言的内在潜能，丰富文学世界。

关键词：威廉·加斯；文学语言观；语言哲学

The Self-referentiality and Aesthetic Potentiality of Text: William Gass's View on Literary Language

SUN Mingming

Abstract: William Gass has formed his unique view of literary language when he constant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language and the real world. By emphasizing the internal self-sufficiency and aesthetic nature of literary language, he tries to eliminate the singl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real world, and highlight th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language to encourage writers to exert the internal potentiality of literary language and enrich the literary world through imagination.

Key words: William Gass; view of literary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0. 引言

威廉·加斯（William H. Gass, 1924-2017）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极大丰富了美国文学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9 年度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华裔美国文学叙事话语研究”（项目编号：WY2019001-A）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明明，女，大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文体学研究。

由于从事多维度写作，他集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文体学家、文学理论家、语言哲学家等众多头衔于一身，但他本人却拒绝被贴上任何一种标签。加斯曾有言：“我只是写作，并对怎样写感兴趣”。所以加斯穷尽一生去思考文学理论，致力于文学写作创新实践，对文学语言“圣徒”般的迷恋与执着贯穿其文学生涯始末。

1924年，加斯出生于美国北达科塔州东南部城市法戈（Fargo）。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为美国家庭带来种种震荡，这也使得他的童年生活并非无忧无虑。从那时起，阅读成为帮助他摆脱忧伤、愤怒和挫败的唯一乐园。二战兵役结束后，加斯重返大学校园，就读于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哲学专业。但他依旧痴迷于文学，对乔伊斯、福克纳、詹姆逊等现代派创新型作家产生浓厚兴趣，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文学作品尤其不断激起他对文学语言的哲学及美学思考。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加斯在康奈尔大学师从分析哲学学派的主要人物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并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结下不解之缘。在二人启迪下，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隐喻的哲学研究》（*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Metaphor*），开启了文学语言探究的终生之旅。在创作中，加斯不断尝试延伸文学语言边界，甚至打破小说的传统边界。他对小说语言细致、缜密的实验，创作技艺的极致追求，以及小说语言的审美鉴赏性等方面的强调，是其他作家难以匹及的。

加斯在文学界德高望重，然而其作品却从未登上美国热销排行榜。即便不受大众读者追捧，他也终生笔耕不辍。他所呈现的文学景观独特，时常令人困惑，却为文学世界提供了不断创新和丰盈的文学体验。加斯的小说创作虽表现出深厚的哲学底蕴和学术背景，但却流露出些许无礼、粗鄙，甚至被认为略显“下流”。正因为他从不为取悦读者而创作，其在文学界获得极高赞誉，也获奖无数。他毕生完成3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1部中篇小说集和7部文集。196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奥门塞特的幸运》（*Omenetter's Luck*）出版后，好评不断，被评论为“美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小说”。随后小说《隧道》（*The Tunnel*）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语词的栖身之地》（*Habitations of the Word*）、《发现一种形式》（*Finding a Form*）和《时间的检验》（*Tests of Time*）3部文集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国内外学者对加斯的研究一直兴趣未减，且研究成果丰富，形成各种富有特色的研究见地。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解读其文学理论，批判其文学作品等方面，对支撑及指引他文学生涯的文学语言观缺乏系统认知和深入剖析。他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追求使他的小说创作成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谱系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加斯的文学语言观是其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亦是其创作实践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文学语言的自我指涉性、自我意识以及建构意义，同时也对文

学语言的形式审美性与韵律性情有独钟。

1. 文学语言：自成一体的自我指涉世界建构

加斯将语言哲学引入对文学语言的思考，这与他接受的系统哲学训练密不可分。以语言哲学思想为根本出发点，其文学语言观突出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和建构意义，强调发挥语言的自觉能动性。加斯认为小说是作家运用语言建构而成的一个自我指涉世界，语言具有明显的自我意识和建构意义。

1.1 文学语言的自我意识

哲学概念是用来描述错综复杂事物的内在体系。在加斯看来，哲学概念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文学世界，并能解决文学世界的本质问题。若文学要彻底摆脱现实的羁绊，哲学的自觉运用是较为有效的手段。由此，在元理论、元语言和元哲学等哲学术语的启发下，加斯开创性地提出“元小说”这一概念（Gass, 1970: 25），这也成为其对文学批评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此外，加斯认为哲学家一直关注的“自我意识”是影响小说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即小说创作需要不断提升自我意识（Gass, 1980: 1）。

在加斯的文学概念中，文学语言的自我意识是指文学被构建成如同哲学体系一样的世界，它具有内在逻辑性与内部统一性，不附庸于现实世界而存在。文学语言通过其自觉性，不断投射自我，反思自我和修正自我。帕特丽夏·沃（Patricia Waugh）认为，“元小说”通过对自身形式的探索，借助当代哲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把世界的传统隐喻拉进小说内部，并重塑新的世界（Waugh, 1984: 3）。因此，元小说可以说是文学语言自我意识表现的最突出形式。

加斯的元小说创作通过小说形式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思考和反省，这使小说获得不断反思、调整的机会，小说就产生了一种能动的自我意识，由此他与罗伯特·库弗、唐纳德·巴塞尔姆一同被赋予“元小说缪斯”之称（McCaffery, 1982: 1）。加斯也被帕特丽夏·沃称作自我意识小说家（Waugh, 1984: 2）。文学史上探寻自我意识的作家、作品不少，但加斯所提倡的“自我意识”强调对语言再现的世界的问题反思，是对小说文本虚构性的揭示，也是对语言、文学形式、写作行为的自我意识，更是对现实与虚构之间不确定性关系的自我意识。文学语言的自我意识自觉指涉写作过程，通常会弱化情节的重要性。因此，加斯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应该将重心从现实世界转向文学内部，突出文学文本的自我意识。虽然加斯本人并没有直接在元小说理论上大做文章，但后续研究者一致认为，加斯不仅是元小说类的赋名者，同时也是大胆的践行者。

1.2 文学语言的建构意义

加斯的文学语言观以语言哲学为理论肌理，特别关注文学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其核心观点提出，语言结构与其指称对象之间并非唯一对应关系，

小说语言并不是物质存在的简单映像，而是作为独立个体，与真实世界并行（Holloway, 1990:9）。文学现实的本质特征取决于文学的内在一致性，而非对现实世界准则的参照与反映。这一观点，是加斯从文学创作层面对语言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哲学讨论所作的一种回应。

哲学界对于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由来已久。维特根斯坦在早期研究中曾提出著名的“图像论”，即“语言”与“世界”之间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的同构关系。虽然维特根斯坦理论后期也将这一论断完全颠覆，但作为学生和追随者，加斯从小说语言的角度，对“图像论”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语言图像论无法解释小说中事物的存在方式，原因是小说世界中所宣称的事实并不与真实存在完全相对应。小说所述事实的命题结构也仅是事实可能存在的结构，以至于当小说家描述事实时，无意间必然会提出关于世界的结构（Gass, 1980: 3）。那么，对现实世界的简单复写或生动描摹已不能用来概括加斯眼中的文学属性。他认为，艺术作品作为与世界同在的、独立的、鲜活的形式，是现实的一部分，不需要通过外部世界来验证。就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而言，语言并非局限于媒介的作用，它已具备物性特征。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的语言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载体，而是作为一种经验，以高度凝练的形式承载，体现人类意识（Madera, 2013: 49）。因此，加斯始终坚信，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是语言建构的世界。

加斯认为文学语言具有能动的建构性，具有现实世界的再创造意义。认同语言用于描绘现实这一单一功效，无疑是承认文学与现实世界的附属性等级关系，但加斯强调，小说家伟大之处本应该体现在对于现实世界的再创造。他认为，小说应赋有第二生命，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比生命本身更重要（Gass, 1980:3），这里的“生命”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因此，在加斯来看，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不在于内容或形式上的相似或同构，而在于语言结构对世界的构成与组合，也就是以文学语言来建构世界与经验。

文学艺术的艰难转变绝非仅仅打破读者对小说的惯性反应，加斯认为文学艺术作家应该同时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他必须展现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为展现世界，他必须切实地“做事情”，而非单纯的描述（Gass, 1970: 8）。加斯说的“做事情”意指文学艺术作家充分利用语言的建构性特性，不断丰富多样化的世界。美国文学评论家拉里·麦卡弗利（Larry McCaffery）（1982: 20）曾写道：“诸如威廉·加斯这样的一类作家，执着于语言构筑的世界之中，以其自身相互耦合的方式，意在调整、重塑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文学艺术作家应竭力开创的是一个通过语言建构的世界，那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学世界，不该是一个局限于描写现实的世界。文学艺术作家的价值不在于仅仅以现实世界为参照，而是成为文学的缔造者和世界的建构者。

麦卡弗利将加斯创作的《威利·马斯特斯的孤独妻子》（*Willie Masters'*

Lonesome Wife）被视为美国元小说的典范。这部中篇小说的封面和封底分别是一个裸体女人的正面照片和背面照片，加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邀请读者进入由语言和文字构成的女人身体。在这部作品中，写作是主题，肉体的爱欲只是创作行为的隐喻。小说用4种不同颜色的纸和多种不同的字体印刷，大部分文字被巧妙地排列在书页上。通过强调文字的物质性以及感官特征，即文字的样式以及读者阅读文字的方式等，加斯试图呈现的是小说作者建构的不同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或事物的叙述，它只是证明自己作为文学作品的独立存在性（McCaffery, 1995: 182）。一个典型加斯式的故事很难找到它的现实参照，由于缺乏叙事情节，读者很难总结或概括加斯小说中的故事。然而，小说留给读者的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受，好似经历一个更为丰富的想象世界。

2. 文字“游戏”：文学语言的审美潜势

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研究后期曾提出“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系统中的字、词、句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普遍的意义，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着不同的释读空间；语词、句法规则、具体语境中的语用活动——这些语言系统中的基本要素彼此关联，形成一个无法进行严格“逻辑切割”的有机整体（孙志农、沈楠，2017: 62）。语言游戏的规则是任意的，语言的意义因不同语境或说话人想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而不同。这一观点对加斯影响至深，他通过审视语言的形式美和韵律美，在文学语言视野和文学创作实践中，将这一“游戏”概念发挥至最高境界。

2.1 文字的形式审美

加斯认为，文字才是作家在一部被称为艺术的作品中必须找到的形式，它是真实的，拥有自己的现实，不需要反映任何社会或道德现实。在2017年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访谈中，他曾坦言：“一件艺术品只对自己的完美负责”。较之文学传统的构成要素，如情节、人物等，加斯更强调文学语言的形式，尤其专注于句子架构与布局的创新。加斯对格特鲁德·斯坦崇拜至深，受其影响，也沉浸于句子的写作实验。加斯笔下的句子常是细致揣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美国《新闻周刊》评论其小说《奥门塞特的幸运》“晦涩难懂，但却发人深省、令人有所获，可称得上非常优美的一等小说。即便默读于心，也如同舌尖滚动的优美词句”。加斯强调语词、句子的形式审美效果，也对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加斯认为不仅语言的运用以及语境赋予语言更多动态意义，文字的形态、布局、呈现方式等视觉因素同样也为语言意义建构发挥重要作用。小说《威利·马斯特斯的孤独妻子》由罗马体、斜体或粗体等不同字体印刷，并呈现于不同薄厚的四种颜色纸张之上。小说中的文字排列不再中规中矩，甚至被用来构成图案。这部小说彻底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和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他希望读者

同样重视字体、字号、图形、标点、颜色，甚至是空白页面，这些可谓是写作的“原材料”要素。他将文字的形式要素无限放大，这一夸张的表现形式提醒创作者，当谈及主题、叙述声音、意象等问题时不要忘记，读者翻开书页之时最直接的感受并不是角色、故事或者主题等，而是文字表达本身。

加斯是小说语言形式美学的捍卫者，深信语言的形式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美学意义。任何读过《蓝·色癫狂的艺术》（*On Being Blue*）的读者，都不免对其开篇段落中的蓝色鼻子、蓝色法律、蓝色长筒袜、蓝色铅笔等一系列“蓝色种种”产生深刻的印象。这里“蓝色”一词的多次重复运用，不仅凸显了重复这一手法创设的形式美学效果，也创造出一种强烈的视觉感，仿佛将读者置身于一个蓝色空间，从而唤起读者对各种可能或不可能的蓝色意蕴产生无限遐想。对于文字的精致“把玩”在加斯的创作中显得异常光彩夺目，也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加斯小说作品的最大魅力在于，他竭力逃脱叙事中故事叙述功能局限，尽力发掘语言的多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加斯并不满足于通过小说传递某种耳熟能详的信息，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忠实拥护者。尽管缺乏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往往有似诗人一样对词汇精雕细琢的钟爱，但他并没有将读者置于文学真空体中，或是一个缺乏结构和骨架的抽象世界之中。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为读者展现的是一个更为丰富、细致、多样的文学世界。

2.2 词句的韵律审美

除重视形式特征外，加斯还看重文学语言的声音性或韵律性。加斯认为，文字如同处于链条式结构中，能产生节奏效果，作者则以控制声音节奏的特殊方式来控制词汇所表达的含义（Gass, 1979: 304）。加斯曾提到，要讲述一个故事，创造一些角色并设计一个情节，是电影制作人应该完成的事。小说家不要沉浸于讲述故事，因为当小说完成时，讲述故事是顺其自然的事。小说家的职责是创造一种音乐，因为声音是概念的载体，同时也在创造一种概念音乐（Gass, 2007: 172）。加斯所倡导的文学语言是具备声音审美性，或是不乏节奏感的文学语言。在小说《奥门塞特的幸运》中，加斯通过文字创设声音和节奏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包括打油诗、儿歌、民歌、流行赞美诗以及传统抒情语言等。这些极富韵律的语言形式一方面唤起读者对民间故事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铸就了小说的美学凝聚力。

无论是小说创作实践，还是文学理论研究，加斯都特别关注句子。他将句子比喻成思想的文学线，具有活力、驱动力、方向和目标。那些沉闷毫无生机的句子无疑让文学作品走向死胡同，而真正精雕细琢的句子能将读者从有形的词汇带入无形的联想或是梦境（Gass, 1982: 85）。同时，他以全新的姿态审视和强调词句的韵律美。加斯认为，句子的虚构性与其逻辑形式关系不大，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顺序问题；句子就像手上打结的绳一样，通过振动来决定听者大脑中图

像的触发顺序。即使是单个词也有自己的节拍和“叮当声”，单词和所有的话语一样，都是语言爱好者发元音时鼓起的脸颊、轻快舞动的舌头和可以陶醉的场域(Gass, 1979: 331)。文学创作中，加斯特别擅长从句子内部入手，通过改变句子的形态来加强实现语言的声音美学效果和语义表达。在短篇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中，加斯这样描写一位老人的谈话以及她和她周边人的离世：

She talks about her grandson, her daughter who lives in Delphi, her sister or her husband—both gone—obscure friends—dead—obscurer aunts and uncles—lost—ancient neighbors, members of her church or of her clubs—passed or passing on; and in this way she brings the ends of her life together with a terrifying rush: she is a girl, a wife, a mother, widow, all at once. All at once—appalling—but I believe it; I wince in expectation of the clap. Her talk's a fence—a shade drawn, window fastened, door that's locked—for no one dies taking tea in a kitchen... (Gass, 1969: 184)

在这一示例中，作者多次频繁使用的破折号以及部分语法成分的缺失打破了英语书面语体的句子结构，从而生成了语句节奏上的停顿效果。句子节奏上的顿挫强化了语言的能指作用，让读者仿佛真的听见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妇人喋喋不休之声。此外，从形态上看，长句子被破折号分割成一个个短片段。这些语词片段将老妇人口中的人——sister、husband、friends、aunts、uncles、ancient neighbours——以及他们的纷纷离世前景化，从而使每一次失去亲人或朋友的痛能够触动读者的感知。被分割后的句子在形态上以及韵律节奏上所呈现出的“短”与下文中所感叹的生命短暂恰恰构成一种语义上的呼应。这样巧妙构思而成的句子，在加斯的作品中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对句子倾注的心血和努力，以及他赋予句子韵律的能力也足以让文学创作者心慕笔追。但是，他并不希望作者将句子的雕琢只是视为尽一己之责，而是要深信句子能够产生一种魔力。正如他说，如果只是将辞藻堆砌，而并非发掘语言的潜势，那么写作也有如患上“黄疸症”或“贫血症”(Riley, 2017: 14)。

加斯曾写到：“足够精彩的句子是具有灵魂的，如果让那些本可以生动的句子都黯然失色，那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对世界犯下的深重罪孽”(Gass, 1982: 85)。加斯被学界视为实验性写作的典范，因为他从不满足于某些定型的文学样式，也不认为文学只存在于某种重要的语言方式。有评论者将加斯描述成文学界的一股清流，当某些作家或阅读者只关注小说的故事、角色、情节等要素时，他则强调精心构造的句子能表现的艺术特色和美学效果。当人们沉湎于文学成功要素的传统认知时，加斯提出的文学语言规则与这一认知模式相较量，并欲将其颠覆。

3. 结语

加斯文学语言观的形成既与其教育背景、文学研究偏好等个人因素有关，也存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化发生巨大改变，战争、政治丑闻、社会动荡、信息爆炸等都对语言意义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曲解语言意义。现实世界让人类偏离传统理性目标，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不再像从前一样充满自信。断裂、陌生、无以言喻的混乱逐渐加剧人类的理解危机，世界慢慢变得无法诠释。美国实验性写作便在人们表达不满、反抗社会的现实中应运而生。作家试图开创一种全新的写作范式，用全新态度看待文学语言。在这一大背景下，加斯所倡导的实验性写作手法与现实主义传统创作观大相径庭，是小说创作的内转向，它不以世界为依赖，不以描摹现实为手段，而是强调文学语言的自足性和创作文本的美学需求。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加斯的雄心和抱负在于通过文学语言实验不断开拓想象力，从而探索文学创造的可能性。

加斯一方面被视为文学艺术形式变革的冒险家，另一方面也因沉浸于抽象文本之中而备受抨击。但无论是被痛斥为脱离现实也好，还是被批评为自我陶醉也罢，与加斯并驾齐驱的一批后现代主义作家，在身陷“小说已死”“作者已死”“文学枯竭”的失望与窘境之时，开始走向文学内省。在文学内部世界中，他们不单纯依赖于语言的描述性和小说的模仿性，而是努力探寻和发挥语言这一文学内部机制的最大潜能。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然而，在快餐文化充斥人们生活的当下，大众文学因其通俗易懂成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文学批评界唯社会范畴马首是瞻，伦理、生态、空间、认知等术语悄然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流行字眼。虽然文学研究视野的确由此得到不断开阔，但阅读兴趣的偏离和研究热潮的转向，也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停止对文学基本问题的追求与探索。加斯对于文学语言的思考、追问与求新提示我们要铭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

- [1] Jan Garden Castro & William Gass. William Gass [J]. *New Art Publications*, 1995(51): 58-61.
- [2] John Madera. Sentenced to Depth—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H. Gass [J]. *Rain Taxi Review of Books*, 2013(04): 1-72.
- [3] Larry McCaffery. *The Metafictional Muse: The Works of Robert Coover, Donald Barthelme, and William Gass*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2.
- [4] Larry McCaffery. The Art of Metafiction [A] in Mark Currie, ed. *Metafiction* [C]. London: Longman, 1995.
- [5] 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M]. New York: Methuen, 1984.
- [6] Seth L. Riley. The Sentences of William H. Gass [J]. *Image*, 2017(06): 1-28.
- [7] Watson. L. Holloway. *William Gass*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0.
- [8] William Gass. *In the Heart of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M]. London. Johnathan Cape, 1969.

- [9] William Gass. *Fiction and the Figures of Life*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 [10] William Gass. *The World within the Word*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 [11] William Gass. Philosophy and the Future of Fiction [J]. *Syracuse Scholar* (1979-1991), 1980(01): 1-13.
- [12] William Gass. The Soul Inside the Sentence [J]. *Salmagundi*, 1982(13): 65-86.
- [13] William Gass. *Finding a Form* [M]. New York: Knopf, 1996.
- [14] William Gass. *A Temple of Texts* [M]. Champaign: Dalkey Archive Press, 2007.
- [15] 孙志农, 沈楠. 语言·本质·世界——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再思考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60-68.

爱伦·坡《一桶白葡萄酒》对话中的 话轮控制策略

曹峻烽 陈明芳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话轮分析框架有助于分析小说《一桶白葡萄酒》中两大主人公的对话，探究话轮转换与话语角色权势关系、性格刻画及情节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话题控制权流动体现出双方的权势关系，两位主人公性格特点在控制和争夺话题中显现出来。前置语列、副语言等话轮控制策略不仅能控制话题走向，而且还能加强对话的紧张度，制造悬念，推动情节的发展。

关键词：话轮分析框架；一桶白葡萄酒；话轮控制策略；权势关系

The Use of Turn-Control Strategies in the Dialogues from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CAO Junfeng CHEN Mingfang

Abstract: Dialogues between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in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will be analyzed based on a framework of quantitative turn-taking analysis that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power relation among the characters,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 development, which shows that the power relation is revealed by those who control the topics, so are their characteristics. Besides, the use of turn-control strategies such as pre-sequences and paralinguistic features help to lead up to the main topic, strengthen the tension of the dialogues, and also keep readers in suspense. The study broaden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framework, and contributes to more objective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framework for turn-taking analysis;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turn-control strategies; power rel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语言学学科英语建设与研究”（编号：2019HB0050B）及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CX20203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曹峻烽，男，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研究。

陈明芳，女，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研究。

0. 引言

爱伦·坡的经典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是以蒙特里梭（Montresor）（以下简称蒙）为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主要讲述没落贵族蒙特里梭如何报复曾迫害和羞辱过他的新兴贵族福吐纳托（Fortunato）（以下简称福）。在狂欢节之夜，蒙以鉴别一桶白葡萄酒真伪为由，将醉酒的福诱骗进自家地窖，将其封死在壁龛内。该故事令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笔下渲染的阴森恐怖的氛围。这主要得益于爱伦·坡小说创作的自成体系，他曾表示“创作初始就喜欢考虑一种效果”，由此提出了效果统一论（Gerald, 2006: 543）。既有研究也多从这一视角探讨这部小说中恐怖氛围描写以及情节构建（史忆，2008；唐荷月、袁方，2013；付帆，2016；邵斐祥，2017）；也有研究从修辞学角度论述小说中的修辞手法及不可靠叙述（詹姆斯·费伦、唐伟胜，2008；王艳芳，2009；刘俊梅，2019）。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多采用定性方法，主要聚焦于小说整体语言特点分析，缺少对小说中某一特殊语言现象进行系统分析。

笔者发现，在此部小说中，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两大主角的对话，对话情节由多个“话轮”组成。“话轮”一词多用于语用分析，与功能语言学的“语/话步”相对应，为便于叙述，本文采用前者。由于“话轮”是话语分析的重要范畴，常被用来解释人物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人物性格。李华东和俞东明（2001）曾基于戏剧文体学提出话轮分析框架，并成功用于量化分析戏剧作品中的人物权势关系，使戏剧作品中的文学批评趋于客观化和系统化。《一桶白葡萄酒》虽是一部短篇小说，但其内容包含大量的对话，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并且从这部作品的人物设定上可以看出没落贵族蒙特里梭和新兴贵族福吐纳托的地位之差。本文尝试运用话轮分析框架，基于作品中出现的话轮数量，解读两大主人公的权势关系以及性格特征，进而探究其对小说情节发展的作用。

1. 话轮理论与策略

“话轮”一词虽由萨克斯（Sacks）等学者提出，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导致后续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研究内容对话轮概念作出相应的界定，包括是否将沉默以及体态语纳入到话轮的概念中。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给予一个说话人的说话权力与义务，以及他或她实际所说的话语（王得杏，1998: 149）。为了便于定量分析，本文主要参考李华东和俞东明的研究，将《一桶白葡萄酒》中的任何一个交际话语都算作一个话轮。

用于戏剧文体学的话轮分析框架包含5个方面：话题提出与控制情况、话轮长度、话轮类型、话轮打断和独白现象、话轮控制策略（李华东、俞东明，2001），其中话题指交谈的实质内容，一个完整的话题包含话题的提出、发展、转换和结束，其中还可能存在多个子话题的转换（孙毅兵、师庆刚，2004）。按

其重要性以及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一级子话题、二级子话题，以此类推。话题的发展需要交际者共同维持，如果双方观点不一致或者不互相补充，那么很可能出现话题转换和对话题控制权的争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应双方的权势关系。而话轮长度应用于文学作品中则采用按字数计算的方法（李华东、俞东明，2001）。关于话轮类型，李华东和俞东明（2001）在发话和反应的基础上提出3种类型，分别是反应后发话、打断和独白，其中，反应后发话指当前说话者回应上一说话者之后又进行了发话；打断指在当前说话者话轮结束前另一说话者就开始讲话；独白指当前说话者不顾上一说话者讲述的内容，只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说下去。

基于萨克斯等提出的话轮转换规则，为保持话语连贯性，话轮转换一般出现在话轮关键位置，而在非关键位置上的话轮更替属于话轮打断，话轮打断反应出对话各方争夺话语权的冲突现象。李悦娥和申智奇（2003）指出，权势关系中的强势角色在话轮中有较高的打断说话者说话的频率与自由度，因此打断现象能传递人物的权势关系。独白从定义上看也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将其与打断现象列为一类，归属于话轮控制策略。

话轮控制策略主要指交际者抢夺话题控制权并延续自己话轮的策略。除了打断与独白，话轮控制策略还包括利用前置语列、限制话轮长度与利用副语言特征的策略（李华东、俞东明，2001）。前置语列指人们在谈话中通过预示即将发生的行动请求对方在行动中“协同配合”（Levinson, 1983: 346），其作用是为说话者引入正题作铺垫，如：“A: What do you plan to do? B: Nothing. A: So, do you wanna watch movie with me?”。限制话轮长度则可以限制说话人的话轮长度，避免讲话被打断，如“There are 3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ne is...”，这样使听话人需要听完这3点内容才能说话。此语言策略还可用来打断对方的话轮，如不等对方说完就插话：“I could understand that, but...” “I appreciate that, but...”等。副语言特征包含表情、动作、姿势、沉默、生理反应以及语言中的重音等，可以起到控制话轮的作用，如在日常交际中，人们常用挥手或是假装咳嗽以打断交谈。

基于话轮转换框架，李华东和俞东明（2001）以《推销员之死》为例，通过分析其中片段证明这个分析框架的解释具有可靠性，为戏剧文体学提供了定量分析模式。易秀清和王小量（2010）在此框架基础上，以研究小说《印度之行》的冲突性对话为例，新增了“次选回应”，丰富了话轮分析框架。钟小佩（2011）则以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对话为例，分析对话中反映出的女主角形象的转变。综上，话轮分析框架虽是基于戏剧文体学提出的，但其应用范围并没有受限。由此，本文试图以话轮分析框架为研究手段，通过量性方法分析《一桶白葡萄酒》中的话轮转换情况。

2. 《一桶白葡萄酒》的话轮分析

文本《一桶白葡萄酒》选自《埃德加·爱伦·坡小说与诗》(Edgar Allan Poe: *Complete Tales and Poems*)，文中的对话全部来自于两位故事主角蒙特里梭与福吐纳托(2006: 208-215)。笔者将故事分为三大片段，分别为“片段1：街上相遇”“片段2：前往地窖深处”以及“片段3：封死在壁龛内”，继而统计三大片段中的话轮数量，再基于话轮分析框架探究话轮转换与主角人物权势关系、性格刻画以及情节发展的关系。

根据统计与分析，蒙特里梭和福吐纳托的话轮转换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文本三大片段的话轮转换分析结果

片段	片段1		片段2				片段3		合计		
一级子话题	话题1：鉴别白葡萄酒		话题2：地窖		话题3：共济会		话题4：福的求救				
人物	蒙	福	蒙	福	蒙	福	蒙	福	蒙	福	
话轮数(次)	9	9	10	10	6	6	8	5	33	30	
①话题提出与控制话题情况	主导 话题	试图 控制 话题	逐渐失 去话题 控制权	逐渐 控制 话题	无话 题控 制权	主导 话题	试图 控制 话题	主导 话题	话题控制 权由蒙向 福过渡		
②话轮平均长度(词)	18.56	6.45	18.7	6.2	2.5	5.34	9	17.6	13.36	8	
③话轮类型	发话(次)	2	1	3	6	0	2	4	1	9	12
	反应(次)	4	1	4	2	6	2	3	1	17	6
	反应后发话(次)	0	2	3	0	0	2	0	1	3	5
	打断(次)	0	2	0	2	0	0	0	1	0	5
	独白(次)	3	3	0	0	0	0	1	1	4	4
④话轮打断和独白次数	3	5	0	2	0	0	1	2	4	9	
⑤话轮控制策略	前置语列(次)	3	0	0	0	0	0	0	3	0	
	限制话轮长度的语用策略(次)	4	2	2	1	0	1	1	2	7	6
	副语言特征(次)	0	0	0	2	0	2	2	3	2	7

从整体上看，三大片段共包含63个话轮，其中蒙占33个，福占30个。在谈话过程中出现4个一级子话题，话题的控制权处于“流动状态”，具体表现为由蒙逐渐向福过渡。蒙与福的话轮数量接近，在前3个话题中两者话轮数是相等的。在话轮平均长度上，二者有明显差别，蒙的话轮平均长度总和约为福的1.6倍，而当话题控制权从蒙逐渐过渡到福时，福的话轮平均长度也逐渐高于蒙。下面将对这4个一级子话题中的话轮转化情况进行分析与讨论。

2.1 街上相遇

片段1是故事的开头，讲述蒙在大街上故意撞见醉酒的福，向其透露自己准备找人帮忙鉴别一桶白葡萄酒的真伪，以诱骗福与自己前往自家地窖。其中

的 18 个话轮主要围绕“鉴别白葡萄酒”展开，蒙既是话题 1 的发起者，也主导着整个话题，其话轮平均长度约是福的 3 倍。从话轮控制策略的使用来看，二人都采用了限制自身话轮长度的语用策略，如“...But I have received a pipe...” “It is not the engagement, but the severe cold...” 等，目的是防止话轮被打断。从话轮类型来看，蒙的两次发话都控制着话题走向。在第一次发话中，蒙先透露自己刚买了一大桶白葡萄酒并表现出自己的担心，以引起福的兴趣，即“...But I have received a pipe of what passes for Amontillado, and I have my doubts”。之后，蒙并没有直接进入正题，而是用 3 次前置语列反复强调自己的不放心，如“*I have my doubts, and...*” “*I have my doubts*” “*And I must satisfy them*”。这 3 次前置语列都属于独白话轮，因而在第一次发话之后，醉酒的福完全被白葡萄酒所吸引。面对蒙的述说，福用 3 次重复的独白“*Amontillado!*”，显得旁若无人，表现出其对酒的痴迷与在蒙面前毫不掩饰的失态，所以蒙才会反复强调 3 次，一方面为集中听话人的注意力，控制话题走向，另一方面为进入正题做铺垫。经历 8 个话轮后，蒙才再次发话表明要找卢切西（Luchesi）去地窖品酒，即“*As you are engaged, I am on my way to Luchesi. If anyone has a critical turn, it is he. He will tell me...*”，即让福相信他们的相遇是“偶然的”，从而降低福的防备心，也使得交谈步入蒙预设的正题。此外，蒙在反应话轮中多次赞美福并贬低自己，如“*I will not impose upon your good nature*” “*and I was silly enough to pay the full Amontillado price without consulting you in the matter*” 等，不仅体现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物，也暗示二人的地位之差，即没落贵族对新兴贵族的阿谀奉承。这两次发话体现出蒙在执行复仇计划时，头脑清晰，善于隐忍，面对仇人既冷静又谨慎。面对白葡萄酒的诱惑，福则显得并不冷静，除了在蒙面前失态，他还两次打断蒙让卢切西去品酒的提议，并贬低卢切西，如“*Luchesi cannot tell Amontillado from Sherry*”。福还试图控制话题，主动发话表明要与蒙一同前往地窖，且多次使用带有催促和强制意味的话语，如“*Come let us go*” “*I have no engagement; come*” “*Let us go, nevertheless*”，这些都体现出福傲慢强势的性格特点。

2.2 前往地窖深处

片段 2 中的对话发生在蒙与福前往地窖深处的过程中，其大部分话轮都围绕“地窖”展开。在话题 3 中，蒙的话轮平均长度约为福的 3 倍，但大部分话题都由福发起并控制；福的 6 次发话，包括询问白葡萄酒的位置、辨别地窖中的硝、饮酒、询问蒙家族的家训与家徽，可视作二级子话题。福提出这些子话题是为了控制主话题，通过主动了解更多信息以确保达成自己的目的。从话轮控制策略来看，除了双方话轮中出现少量的控制自身话轮长度的策略，福的话轮中还包含两个副语言特征，一个是因地窖中的硝产生生理不适，即“*Ugh! ugh! ugh! ...ugh! ugh! ugh! ...*”，另一个是蒙给他递酒时的反应，即“*He paused and nodded to me*

familiarly”，后者可以反映出在蒙的诱导下，福逐渐放下戒心。反观蒙，他并没有试图控制话题，却引导着话题走向，如当福因为硝而咳嗽时，蒙第一次发话再次赞美对方并贬低自己，即“we will go back; your health is precious. You are rich, respected, admired, beloved; you are happy as once I was...”，其实际目的是引起福的反感。果然，福为了顾及自己面子，打断了话轮并要求继续前进。为了避免福半途退出，蒙还准备了一瓶酒并发话邀请他同饮，用这瓶酒刺激福继续前进。此外，蒙从容地回应福的每次提问，如当福问他家的家训时，他没有编造，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Nemo me impune lacessit”，也就是“凡伤我者，必受惩罚”，反映出蒙面对福时的冷静，也为后续福的悲剧结尾埋下伏笔。

话题4是福询问蒙是不是共济会成员，整个话题还是由福主导，两者话轮数仍保持一致，但此时福的话轮平均长度超越了蒙。福采用副语言“He repeated the movement — a grotesque one”并发话“You do not comprehend?”开始话轮，蒙全程回应，无话题控制权。在蒙说自己是“mason”时，福的反应带着明显的质疑和轻蔑，即“You? Impossible! A mason?”。当蒙表明自己是“泥瓦工”并拿出披风下的泥刀时，福回应“You jest”并用限制自身话轮长度的语用策略“But let us proceed to the Amontillado”结束了这个话题。福虽然对蒙表示出轻蔑，但面对蒙披风下的泥刀，他还是下意识地“recoiling a few paces”；不过福并没有过多怀疑蒙，表明蒙虽没有掌控话题，但面对福突如其来的问题和质疑并没有乱了阵脚，在回应时头脑清醒且沉着冷静。蒙在话题3中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家训，以及在话题4中对福露出自己的泥刀，都体现出蒙不畏惧福，并对复仇计划的实施充满信心。除此之外，片段2并没有提到蒙如何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而是通过这些反应话轮与副语言暗示读者，制造悬念，加强了对话的紧张度，由此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2.3 封死在壁龛内

片段3主要讲述二人进入地窖深处后，蒙用铁链将福囚禁在壁龛中并砌墙将壁龛封死。此处话轮主要围绕“福的请求与求救”展开，双方的话轮数不再相同。话轮的主导者是福，虽然其话轮数低于蒙，但其话轮平均长度约为蒙的2倍。蒙一共发话4次，第一次发话告知福前方就是白葡萄酒，此时蒙又一次提到了卢切西试图刺激福，即“Proceed, herein is the Amontillado. As for Luchesi ...”，结果被福打断，即“He is an ignoramus”。蒙第二次发话是在将福锁在壁龛后，即“...you cannot help feeling the nitre. Indeed it is VERY damp. Once more let me IMPLORE you to return. No? Then I must positively leave you...”，其中的重音“VERY”和“IMPLORE”带有明显的恐吓意味；面对蒙的恐吓，福并没有顺着他的话进行回应，而是独白“The Amontillado!”表达他的震惊。蒙的最后两次发话发生在福对其发出求救后，试图从语言上折磨福以体会复仇的快感，因此他

呼喊了两遍“Fortunato”，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这4次发话中，蒙阴险狡诈的特点完全暴露出来，虽然他试图控制话题，但话题的主导权仍在福手里，使他复仇的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观福，他唯一一次发话是向砌墙的蒙求救，其发话和反应话轮中包含大量副语言特征，如表示生理反应的“Ha! ha! ha! ...he! he! ...”和重音“FOR THE LOVE OF GOD, MONTRESOR!”，都反映出福的震惊与恐惧。而当福明白求救无果时，就没有继续回应蒙，而是以沉默的方式保留自己的尊严。因此，在话题4中，蒙阴险狡诈的性格特点得到展现，福虽一直对蒙表现出傲慢与蔑视，但最后他并没有试图赞美蒙或向他求饶，而是保有其代表了新兴贵族阶级的不屈的尊严，这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虽然蒙复仇成功，但双方的权势关系仍没有改变，蒙并没有让福屈服，也并没有体会到复仇后的快感，这样的结局是出乎意料且发人深省的。

3. 《一桶白葡萄酒》中主角的权势关系与性格特征

从整体上看，《一桶白葡萄酒》中的话轮结构主要是两位主角的轮流对话，话轮分布呈平衡状态。在片段1中，双方的话轮分布是相同的，并且为了控制话题走向，蒙的话轮平均长度远高于福。从会话内容上看，虽然蒙的发话次数和采取的话轮控制策略次数都高于福，但福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顺着蒙或采取被动回应的方式，而是通过打断对话、独白等策略试图掌控话题主导权，反映出其在话轮中的强势地位。片段2中的两个话题主要由福主导，他多次发话询问有关地窖、蒙的家族及个人情况。蒙也配合回应，没有抢夺话题控制权，双方的话轮打断和独白次数明显下降。然而，在片段3中，当蒙成功将福锁在壁龛中时，其话语中失去了礼貌和恭敬的态度，转变为饱含着复仇的快感和对福的挑衅。虽然蒙在此片段中多次发话，但话题控制权仍由福掌控，因为在面对死亡威胁时，福最终选择以沉默回应，使对话无法进行。

易秀清和王小亮（2010）在分析小说《印度之行》中指出，主人公对会话常规的打破会导致双方权势关系的动态发展，即高低权势会随话语交替转换。一般来说，人们希望在话语中能够体现对话双方的角色关系，且能符合各自的话语身份；否则，如果权势低的一方采用打断权势高的一方的发话方式，就必然引起矛盾和冲突（王丹、曾庆花，2005）。在《一桶白葡萄酒》中，并不存在主人公权势关系的动态发展，因为从人物设定上即可看出双方地位之差，并且自对话伊始，福就通过各种控制策略体现其是会话中的高权势者，包括不顾蒙发话的独白，多次打断蒙的提议并抢夺话题控制权，这可视为高权势者的“特权”；而蒙在整个对话中都将自己置于弱势一方，其话轮主要是顺从福作被动回应，从不打断他的发话。在结尾处，蒙控制话题的意图被福以沉默终结，福仍是权势高的一方。因此，虽然故事结尾蒙复仇成功，会话却以福的沉默而结束，福以副语言维护了自

己作为高权势者的地位。

虽然二人的权势关系没有转换，但是各自的性格特点却在会话过程中一点点显露并展现出意料之外的一面。正如艾斯利·罗宾逊（Ashley Robinson）（2019）所述，在故事开头，蒙似乎是一位为报仇而遭受过极大委屈的正面人物，但在故事结束时，我们尚不清楚他是不是恶棍。在会话的前半部分，即使数次被福打断，蒙仍然保持着礼貌和恭敬的态度。此外，在反应话轮中多次赞美福并贬低自己，让其卸下心防，也反应出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反观福，他无视并多次打断蒙的发话，体现其傲慢强势的性格特点；当蒙提议让卢切西去品酒时，福的回应“Luchesi cannot tell Amontillado from Sherry”也反映他的自大与无知。波顿（Burton Pollin）（1970: 24-38）指出，“...amontillado, everywhere defined as pale dry sherry”，是作者别有用心地设计这句台词，以暗示福不配他在葡萄酒鉴赏家中的声誉。在地窖中，面对福多次关于葡萄酒的位置、家族情况等的发问，蒙对答如流，在回应时头脑清醒且沉着冷静，这与米哈伊尔（Mikhal, 1996: 84-259）的分析不谋而合，蒙是一位极其冷静且理智的人物。当福被囚禁在壁龛中时，蒙阴险狡诈的特点才完全暴露出来，这体现在其会话中的重音以及不断重复福的话语，带有明显的恐吓与嘲讽意味。佩斯曼（Peithman, 1981: 168-174）认为，蒙在此时的举动是“变态行径而不是复仇”，因为如果真的在意复仇，他最后的台词应该是控诉福这些年对他的羞辱，而不是重复福说的话。因此，面对这样一个“疯子”或“变态”，福最后没有试图求饶，而是以沉默保有一份代表新兴贵族的不屈的尊严。

最后，福和蒙的权势关系和性格特征在会话过程中一一展现的同时，话轮控制策略也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如，会话伊始，蒙以前置语列引出话题，并在反应话轮中利用福的虚荣心反复夸赞他，以推进情节；途中福生理上的不适以及面对蒙的戒心也通过“咳嗽”“退后几步”等副语言特征制造悬念，增强了对话的紧张感。最后通过双方的反应、会话中的重音以及福的沉默给读者了一个意料之中却发人深省的结局。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4个主要话题话轮的研究，发现话题控制权的流动体现出双方的权势关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也在控制和争夺话题的过程中显现出来。蒙特里梭从开始主导话题时展现出头脑精明、工于心计的人物形象，到后来从容面对福吐纳托的提问体现出沉着冷静的性格特点，这与福吐纳托无论在发话还是回应时体现出的傲慢强势形成鲜明对比。最后的情节中，蒙特里梭在成功实施复仇计划时对福吐纳托进行嘲讽与恐吓，其阴险狡诈的性格通过话轮逐渐地表现出来；反观福吐纳托，他并没有向蒙特里梭求饶，而是以沉默回应，为自己保留了一份贵

族阶级的尊严。此外，在这部以对话为主的短篇小说中，话轮的转换对故事情节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话题1中蒙特里梭用前置语列控制话题走向，话题2与话题3中双方的反应话轮与副语言则制造了悬念，加强了对话的紧张度，而话题4中福吐纳托的反应与沉默又带来发人深省的结局。话语分析方法为解读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提供了全新视角。正如李华东和俞东明（2001）所述，该分析框架既能够描写充分性也可以解释充分性。

参考文献：

- [1] Ashley, R.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Z]. Prepscholar, 2 May. 2019, <https://blog.prepscholar.com/the-cask-of-the-amontillado-summary-themes>. Accessed 2 Feb 2021.
- [2] Burton, P. *Notre-Dame de Paris in Two of the Tales*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0.
- [3] Gerald, K. *The Portable Edgar Allan Poe*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 [4] Levinson, S.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Mikhail, B. *Forms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M].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 [6] Peithman, S. *The Annotated Tales of Edgar Allan Poe* [M]. NY: Doubleday, 1981.
- [7] 付帆. 爱伦·坡哥特小说对恐怖氛围的书写——以《一桶白葡萄酒》为例 [J]. 名作欣赏 , 2016(18): 62-64.
- [8] 李华东, 俞东明. 从话轮转换看权势关系、性格刻画和情节发展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 2001(02): 26-30.
- [9] 刘俊梅. 反讽的统一性——论爱伦·坡《一桶白葡萄酒》的叙事艺术 [J].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 , 2019(02): 89-93.
- [10] 李悦娥, 申智奇. 自然会话中的打断现象分析 [J]. 当代语言学 , 2003(01): 25-32+94.
- [11] 邵斐祥. 爱伦·坡小说《一桶白葡萄酒》的效果美学论略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 2017 , 33(08): 43-44+46.
- [12] 史忆. 爱伦·坡的“效果统一论”在《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应用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8(03): 45-46.
- [13] 孙毅兵, 师庆刚. 会话分析中的“话题”面面观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04(09): 13-16.
- [14] 唐荷月, 袁方. 爱伦·坡的“效果统一论”在《一桶白葡萄酒》中的体现 [J]. 语文学刊 , 2013(20): 74-75+83.
- [15] 王得杏. 英语话语分析与跨文化交际 [M]. 北京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1998.
- [16] 王丹, 曾庆花. 会话者的权势与等同关系及其话语结构的微观构建 [J]. 外语学刊 , 2005(02): 54-57.
- [17] 王艳芳. 论《一桶白葡萄酒》中的不可靠叙事 [J]. 电影文学 . 2009(09):109-110.
- [18] 易秀清, 王小亮. 话轮转换视角下的动态权势关系和人物性格——以《印度之行》某一冲突性话语片段为例 [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0 , 11(04): 36-41.
- [19] 詹姆斯·费伦, 唐伟胜. 叙事修辞阐释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 [J]. 江西社会科学 , 2008(01): 39-44.
- [20] 钟小佩. 从女强人到强女人——从话轮解读《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杨尔的形象嬗变 [J]. 名作欣赏 , 2011(09): 164-166.

《别名格蕾丝》中女性身体叙事与身份焦虑

王艳蓉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蕾丝》依据历史真实事件向读者再现了加拿大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性别、阶级和种族三座大山压迫下的生存状态。纵然在当时父权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难以摆脱被书写的命运,作者依然希望通过赋予故事主人公观察和言说的权利,依靠身体叙事的能力谱写女性新历史。然而,小说最终的开放性结局让读者不得不再次陷入对女性身份的焦虑中,女性只能在困境与希望交织的过程中不断追寻自我身份的确定性。

关键词: 维多利亚时代; 女性身体; 身体叙事; 自我身份

Female Body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xiety in *Alias Grace*

WANG Yanrong

Abstract: Margaret Atwood's *Alias Grace* is a fiction based on a real historical event and reappears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women who were oppressed by issues of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in Victorian era.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for women to get rid of the fate of being narrated by othe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author hopes to rewrite female history by endowing the protagonist with the power of observation and expression, relying on body narrative. However, females are brought again into the anxiety of female-identity in the open ending of this novel. Females had to constantly seek the stability of their identity among plight and expectation.

Key words: Victorian era; female body; body narrative; self-identity

0. 引言

20世纪以来,当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主张的精神和肉体二元对立论被颠覆后,有关身体的研究逐渐回归到了主体地位;福柯(Michel Foucault)时代,身体正式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尤其在他的《规训与惩罚》等一系列著作中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解读《别名格蕾丝》”(编号: Hys2020-2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艳蓉,女,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将身体及其被权力作用的方式作为历史关注的核心”（黄华，2005: 245），即“身体作为书写历史的载体”（黄华，2005: 232）。当然书写社会历史的身体也会出现在文学文本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叙述文学中有关身体与叙事之间关系的探讨引起了广泛关注。潘戴（Daniel Punday）在其著作《叙事：走向一种身体叙述学》中，“通过描述叙事文本中的虚构世界，讨论身体对叙事的作用”（Punday, 2003: 11），进而建构身体叙事学。然而，潘戴所探讨的身体叙事过于强调叙事内容中身体对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发展、叙事空间和背景以及叙述权威的影响，而忽视了身体背后所体现的身份意识以及“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许德金，2008: 28-34）。美国作家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其著作《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中谈论到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与现代叙述的关系时，将身体视为“叙述中的关键记号，叙述内涵的一个核心连接点”（Brooks, 2005: 32）。布鲁克斯认为当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被欲望主体或叙述主体标上记号时，“身体成了一个能指”和“一种符号”（Brooks, 2005: 27, 47），这样“它（身体）进入了写作，成了文学性的身体”，于是“物质的身体变成指意的身体”（Brooks, 2005: 1, 3）。因此，“身体既是产生意义的地方也是意义的创造者”（Brooks, 2005: 47）。正如有学者在运用这一身体理论进行文本分析时提到，“身体既是文学书写的对象或客体，又是叙事的媒介或主体”（马粉英，2014: 33）。本文正是依据布鲁克斯有关身体这一能指符号的叙事理念，通过分析《别名格蕾丝》所涉及的女性身体的书写与反书写，揭示小说对维多利亚时代权力支配下的女性身份低下的指涉，阐释阿特伍德对后现代女性在困境与希望交织的处境下身份不确定性的担忧。

1. 维多利亚时代被书写的女性身体

“现代文学文本中的‘身体’不再仅仅是作者通过自身体验和想象建构的主人公的‘肉体’或‘躯体’，而是一个文本意义的能指符号，能指着社会形态、人物身份阶层等”（姚娜，2014: 121-122）。小说《别名格蕾丝》以19世纪中期一起加拿大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谋杀案为背景，围绕女主人公格蕾丝的案件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受阶级和性别压迫的各种身份女性的悲惨命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是女仆、女囚犯、女疯子以及妓女。而这些被贴上特殊身份标签，打上历史烙印的身体书写正是权力与文化对身体统治的写照。小说中女仆的形象在不同阶级和性别的视角下呈现出不同的印象。当第三人称视角里的乔丹医生（Dr. Jordan）总是沉浸在童年时与女仆一起嬉戏玩耍的快乐回忆或梦境时，格蕾丝（Grace）的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却总是诉说着自己所忍受的艰辛与劳苦，甚至还要时刻小心男雇主的性骚扰。反观格蕾丝的梦境，曾出现不同的男人令人窒息般地亲吻她的脖子，“我感到一阵温暖和倦怠偷偷向我袭来，要我服从、投降，

因为服从比反抗容易得多”(阿特伍德, 2016: 276)。然而,乔丹医生眼里所描绘的女仆形象是基于父权社会对底层女性的压迫,而这两种不同话语对比更加突出权力机制对女性身体的操控。

福柯将施加在肉体的惩戒制度与权力机制相联系,提出了“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福柯, 2003: 73),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当残酷的刑罚被一系列温和的规训技术所取代时,现代权力依然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对身体的控制”(黄华, 2005: 251)。在《别名格蕾丝》中,阿特伍德也多次指涉维多利亚时代被权力和规训技术所驯服的身体,如被关在不见天日的监狱中的犯人时常要忍受饥饿、洗冷水澡、穿束身衣的惩罚;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病人在吃早饭前挨鞭抽;男医生更是以检查身体的名义侵犯被关禁闭的女病人。这一系列权力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将统治阶级想要征服身体的欲望暴露无遗。正如布鲁克斯在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阐释欲望在给身体打上标记书写身份时所说,“歇斯底里的征兆是对身体的书写”(布鲁克斯, 2005: 28)。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描绘了被标记歇斯底里精神病各式各样的“女疯子”。有的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但不至于无家可归而装疯;有的因为在逃难中亲眼目睹家人罹难而真疯;还有的受宗教统治思想过度影响而发疯。然而,不管这些女性出于什么原因变疯,当她们的身体在被男性统治阶级的欲望所征服时,就已经失去了自己对身体的拥有权。而这一点在身份卑微的妓女身上体现的更是如此,不同等级的妓女除了服务对象和酬劳有所区别外,“她们整天做的只是穿了衣服再脱下,仰面躺着,这比在煤矿或纺织厂做工要容易得多”(阿特伍德, 2016: 52)。由此可见,阿特伍德通过书写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身体的特殊身份符号,揭示当时权利与欲望对底层女性的控制。

1.1 格蕾丝的身体叙事

阿特伍德在书写被权力和文化统治的女性身体的同时,也赋予叙述主体观察和言说的反书写身体叙事能力。因为观察和言说都属于身体器官的行为,而这样的身体行为正是阿特伍德强烈的女性思想意识在叙述者身上留下的标记。正如布鲁克斯在阐释欲望主体通过“给身体打上标记而把身体改造成一个叙述的能指”(布鲁克斯, 2005: 28)时,引用了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即当皮格马利翁在自己的雕像作品上留下手指按压的印象时,他的象牙少女瞬间化成肉身,继而变成他的妻子伽拉忒亚,“连接起了《变形记》所叙述的世界”(布鲁克斯, 2005: 30)。“而她之所以变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带着人的烙印的身体,正是因为她那造型完美的身体已经成了强烈欲望的对象:作为爱与美之女神的维纳斯决定给予了她的生命”(布鲁克斯, 2005: 30)。在《别名格蕾丝》中,阿特伍德主要通过叙述者格蕾丝的眼光和声音中的身体叙事来表达自己的反书写意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格蕾丝与乔丹医生的对话以及她的整个叙述中。格蕾丝一边巧妙地讲

述自己的故事，一边观察乔丹医生的心理，同时漫不经心地做着自己手里的针线活。当她发现乔丹医生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探寻案件发生的真相时，格蕾丝正是利用他的欲望这一弱点不断赢得对方的信任，从而逐渐争取主动话语权。她的故事里虚实相映，令乔丹医生感到困惑，“即便只有短暂的一刻，他也可以从她眼角里那种有意识的，甚至是狡猾的目光中看出，她内心某个地方知道自己对他隐瞒什么”（阿特伍德，2016: 355）。格蕾丝就像给苏丹讲故事的“谢赫拉莎德”一样，“一直在使用自己以守为攻的顽固劲来对付他”（阿特伍德，2016: 355）。而当读者暂时替代乔丹医生倾听格蕾丝叙述时会更加证实她故事讲述者这一形象，“他回来时我告诉他什么呢？……但我可以自己挑选这样或那样告诉他，……”（阿特伍德，2016: 346），甚至就像她提到律师麦肯齐先生（Mr. MacKenzie）教给自己的那样，“要把故事说圆，要能让别人相信”（阿特伍德，2016: 351）。因此，通过扮演故事讲述者的角色，格蕾丝在与乔丹医生的不断互动中实现了自己的身体叙事。

此外，乔丹医生作为聆听者和记录者在推动格蕾丝的身体叙述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乔丹医生的不断质问和记录，格蕾丝感到他“在我的皮肤上画”（阿特伍德，2016: 71）。“她想象着他在她身上写作，生动地展现着他在故事中的合作者身份，尽管只是简单记录”（Stephanie, 1999: 36-63）。事实上，乔丹医生看似书写格蕾丝命运的笔实则掌握在她的手里，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格蕾丝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首先，格蕾丝在这种作画的行为下“感到睁大眼睛清醒着，非常警觉。就像是半夜里突然被惊醒，有只手在摸你的脸”（阿特伍德，2016: 71），那是因为格蕾丝所感受到的正是“长期以来，女人的身体”作为“记载、传播男性思想的艺术载体或媒介的”（阿特伍德，2016: 351）被压迫的局面。但是，与此同时，格蕾丝还有另一种感觉，“一种被人撕开的感觉。不是肉体被撕开的感觉，因为并不疼。而是桃子被撕开的感觉。根本不是被撕开的，而是桃子太熟了，自己裂开了。桃子里面有个桃核”（阿特伍德，2016: 71）。对比前后两种感觉会发现，后一种感觉正是格蕾丝用身体反抗男性权威的反书写意识。正如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通过身体写作来反抗被书写的地位一样，这里，阿特伍德也赋予了格蕾丝桃核一般坚硬的身体，以此来发出颠覆传统书写的话语，而乔丹医生在推进格蕾丝身体叙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2 在困境与希望中探寻自我身份

经历了对女性身体的书写与反书写，小说的结局中格蕾丝身份的转变——由曾经的女杀人犯成为人妻——似乎预示格蕾丝推翻了自己身上的阶级、性别和种族压迫，然而，她依然对自己不稳定的身产生焦虑。经历过长达 30 年的囚禁生活，格蕾丝在迎来赦免令时依然对自己的自由身份感到怀疑。当格蕾丝在教养所得知自己被释放的那一刻，她不仅没有为此感到喜悦，反而感到沮丧和担

忧。因为在格蕾丝看来，“尽管教养所不能算个家，可将近 30 年，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虽然这是个令人生畏的地方，是让人受苦受惩罚的地方，至少我了解这个地方。从一个熟悉的地方（不管这里多不好）到不认识的地方总是让人感到忧虑重重”（阿特伍德，2016: 444）。长期生活在被蹂躏的痛苦之下，格蕾丝已经忘记了如何去适应新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的脸仿佛“变成别人的脸”（阿特伍德，2016: 438）。因为那个曾经展现在众人面前的一副可怕、狡猾的杀人犯的脸现在变成了一张无辜的脸。她觉得现在的她让人感到可怜，而不再让人感到恐惧了，而现在她必须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局面，“过了好几天我才习惯这种变化；说实在我还是不完全习惯。这需要脸上做出完全不同的表情，但我想时间长了就好了”（阿特伍德，2016: 439）。但是格蕾丝一想到自己未来毫无希望的生活，甚至想象到将来依靠卖身过活直到最后病死，“想到这些，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这样看来，赦免令不是我的自由通行证，倒像是死刑”（阿特伍德，2016: 439）。足见社会权力的枷锁永远束缚在格蕾丝身上。

格蕾丝看似回归家庭的幸福结局实则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尽管狱长一家暗中为格蕾丝安排了归宿——嫁给一个绅士，一位她的老朋友。可是，当那个人前来向她求婚时，格蕾丝一点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只觉得面熟，直到后来那个人说出自己的名字——吉米·沃尔什（Jamie Walsh）。而面对求婚，格蕾丝似乎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为了戴戒指，我不得不把手套取下”（阿特伍德，2016: 448）。手套在当时象征着女性的身份地位，虽然格蕾丝在释放后至少获得一定自由，而且很少再受到他人不怀好意的目光凝视，但是格蕾丝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吉米，因此，格蕾丝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吉米总是喜欢在睡觉前听格蕾丝讲述自己曾经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尤其是最喜欢听她讲自己差点被詹姆斯·麦克德莫特（James McDermott）强暴那部分，然后吉米又会请求格蕾丝原谅他曾经在法庭上对她指证的行为。虽然格蕾丝答应原谅他，但她从心底里却知道自己在说谎，因为她即使远离了曾经的苦难生活，回忆里的梦境依然萦绕在她的现实生活之中，使她难以走出痛苦的过去。而面对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格蕾丝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怀孕，“尽管我感到身体有些重，早晨并不感到想呕吐。知道自己肚子里有东西，但不知是生命还是死亡，这很奇怪的。虽然只要去看看医生就一切明白了，可我非常不愿意走这一步，所以我让时间来说话”（阿特伍德，2016: 455）。格蕾丝所表现的种种不安都是阿特伍德对当时女性身份地位不确定性的真实反映。阿特伍德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正值 20 世纪末，尽管在经历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后，女性在争取平等权益和独立意识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结合当时的女权运动在加拿大的发展，“妓女问题、婚姻中男女双方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平等权利问题、家庭遗产的平均分割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堕胎问题等等”（赵慧珍，2009: 59-64），在当时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

面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后现代女性只能在充满困境与希望的未来不断坚持探寻新的出路。

2. 结语

阿特伍德在 20 世纪末重现了 19 世纪中期女性在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被书写的命运，女性的身体在父权制社会的统治下被权力与欲望直接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虽然，阿特伍德通过赋予叙述主体身体叙事的能力勾勒出的格蕾丝形象颠覆了传统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形象，表明女性在追求自由平等地位的过程中逐渐恢复自我主体意识，但是女性在反抗传统权威的同时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经济与法律等方面的不平等。因此，要想彻底实现女性平等自由的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 Lovelady, S. I Am Telling This to No One But You: Private Voice, Passing, and the Private Sphere in Margaret Atwood's *Alias Grace* [J]. *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1999(2): 36-63.
- [2] Punday, D. *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3] 彼得·布鲁克斯. 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 [M]. 朱生坚译. 上海：三辉图书，2005.
- [4] 黄华. 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 马粉英. 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 [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33.
- [6]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别名格蕾丝 [M]. 梅江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7] 米歇尔·福柯. 惩罚与规训 [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8] 许德金. 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 [J]. 江西社会科学，2008(4): 28-34.
- [9] 姚娜. 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究 [J]. 学理论，2014(30): 121-122.
- [10] 赵慧珍. 加拿大、美国女权运动历史发展比较研究 [J]. 历史教学，2009(2): 59-64.

关于翻译专业本科“通用型”与“专业型”人才培养的思考

王 贊^{a&b} 张 政^b

(a. 太原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32;
b.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本文基于文献数据回溯了国内“翻译专业本科”教育研究焦点，对教育部颁布的翻译专业本科指导性文件《全国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本科翻译专业教学指南》中的人才培养定位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以“通用型”为主、“专业型”为辅的分层互动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并从教学理念、课程设计、师资团队、翻译技术、职业伦理 5 个方面设计实现路径，以期为构建动态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建言献策。

关键词：翻译专业本科（BTI）；通用型人才；专业型人才；人才培养

On the “Universal” and “Voc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Bachel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ANG Yun ZHANG Z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Bachel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TI), compares three guiding documents promulgated by the nation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cluding “National Teaching Requirements for BTI” “Nat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 Qual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Teaching Guidance for BTI”, and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北京市文物景点语料多语种翻译云平台的建制与应用研究”（编号：19YYA003）、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转型跨越期山西省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020YJ218）及太原学院教改课题“熟手型外语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学能力的理论框架研究”（编号：2020jg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 贽，女，太原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典籍翻译、语料库翻译学、翻译教学研究。

张 政（通讯作者），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机器翻译、语料库翻译学、翻译教学研究。

puts forward hierarchical interactive BTI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under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talent cultivation as primary, and vocational as auxiliary”.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e methods to supplement the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concepts, curriculum, teachers,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ethics with the anticipation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ynamic,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training model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Key words: Bachel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TI); universal talent; vocational talent; talent cultivation

0. 引言

“翻译专业”为我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外国语言文学”的下设专业，2006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结果的通知》（教育部，2006-03-10），标志着翻译专业本科（Bachel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以下简称BTI）的设立。根据《2019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调查结果，截止到2019年11月，已有281所院校获准成为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机构（中国翻译协会，2019），相关研究也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但现行BTI课程设置仍存在一定问题。部分培养单位课程脱胎于外国语言文学本科课程，提高了翻译专业课程比例；还有部分课程设置沿用翻译专业硕士（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以下简称MTI）课程设置思路，是MTI课程体系的低配版。这些倾向影响了BTI培养目标的实现，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于人才培养定位不明，这也是各BTI培养单位从专业设立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回溯，并对指导性文件进行分析，有助于充分了解“翻译专业本科”教育的现状，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1. 文献综述

笔者在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篇名方式检索“翻译专业本科”“本科翻译专业”“BTI”等关键词，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相关论文160篇，最早一篇为2006年发表于《中国翻译》的“翻译专业本科教学大纲设计探索”（穆雷，郑敏慧，2006: 3）。2006—2014年期间年发文量快速上升，于2015年达到最高值22篇，2016—2020年略有回落，但年发文量稳定在15篇左右。该领域年发文量呈曲折上升趋势（如图1），可见，自2006年翻译专业本科设立以来，其已逐步成为翻译教育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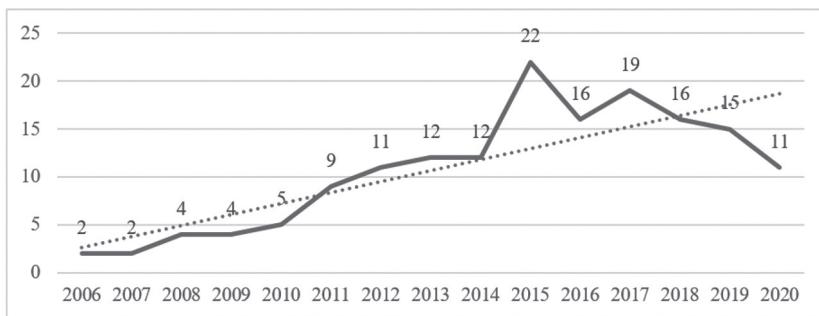


图1 CNKI 翻译专业本科研究论文发文趋势

本文使用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 (5.7. R3 版本) 对相关论文关键词词频和中介中心度进行了分析 (如表 1)，可见，两组数据都聚焦于翻译专业本科定位相关要素，对于“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核心问题关注度最高。关键词可聚类为三个主题：培养目标（关键词如翻译专业、翻译能力、培养模式等），教学内容（如课程设置、口译教学、计算机辅助翻译等）和产业需求（如口译、问题、市场需求等）。主要研究内容为依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分析现有问题并进行教学改革，结合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翻译能力，其中计算机辅助翻译和口译研究成为近年来最新突现的研究焦点。

表1 翻译专业本科相关研究热点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首次出现年份	序号	关键词	中介中心度	首次出现年份
1	翻译专业	38	2006	1	翻译专业	0.48	2006
2	课程设置	19	2007	2	翻译教学	0.13	2006
3	翻译教学	12	2006	3	课程设置	0.11	2007
4	翻译能力	10	2010	4	教学改革	0.1	2016
5	口译教学	10	2010	5	翻译能力	0.08	2010
6	问题	5	2011	6	培养模式	0.06	2010
7	口译	5	2014	7	计算机辅助翻译	0.06	2014
8	培养模式	5	2010	8	市场需求	0.06	2008
9	人才培养	5	2014	9	口译教学	0.05	2010
10	实践教学	4	2010	10	课程设计	0.05	2012

该领域研究多以翻译专业本科教育为整体进行规划和设计，仅少数学者从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内部层级研究，如将翻译训练分为 3 个阶段，“初为本科阶段基础型，中为翻译本科专业型，高为翻译硕士专业型”（刘和平，2008: 38）。作为翻译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专业本科教学应以翻译能力入门和职业化培养为基本特点，配合大量的翻译实践，培养出初级、中级通用翻译人才，

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高级翻译人才培养主要应在翻译专业硕士阶段来完成。但这并不是说在翻译专业本科教学中可以忽视专业化翻译教学，很多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机构结合地方特色、院校特色、优势学科、办学指导思想等，在专业化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对翻译专业本科“通用型”和“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合理定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 翻译专业本科教育指导性文件分析

为了强化高等学校翻译本科专业教学的宏观指导和规范管理，教育部先后发布了宏观性指导文件，包括《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2011）、《外国语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以及《本科翻译专业教学指南》（2020），以上文件精神互相衔接呼应，对提高翻译专业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于2011年发布了《全国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提出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宽阔国际视野的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2012: 1）。关于工作难度的要求为：毕业生能够胜任一般难度的口笔译工作（王伟，2014: 173）。可见，翻译专业本科教学的定位为“通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不仅有语言能力、思维能力、知识面、跨文化交际素质和职业道德的要求，还要具备翻译理论和技能，并对翻译工具、流程和其他能力提出了要求。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 91-95）于2018年颁布了《外国语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出要培养“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课程体系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外语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培养方向课程、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5个部分（同上，2018: 92-94）。可见翻译专业本科应建立动态课程调整机制，突出能力培养和专业知识建构，并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黄春芳、张法连，2019: 14）。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20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杨晓红、李升炜，2020: 110），《本科翻译专业教学指南》收录于《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分册》（2020: 25-46），对翻译专业本科教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更加清晰，即能胜任各行业口笔译等语言服务及国际交流工作的复合型人才（赵朝永、冯庆华，2020: 14）。通过明确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要求、教师队伍、教学条件及质量管理的科学设计与规定，以确保在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中有效落实《教学指南》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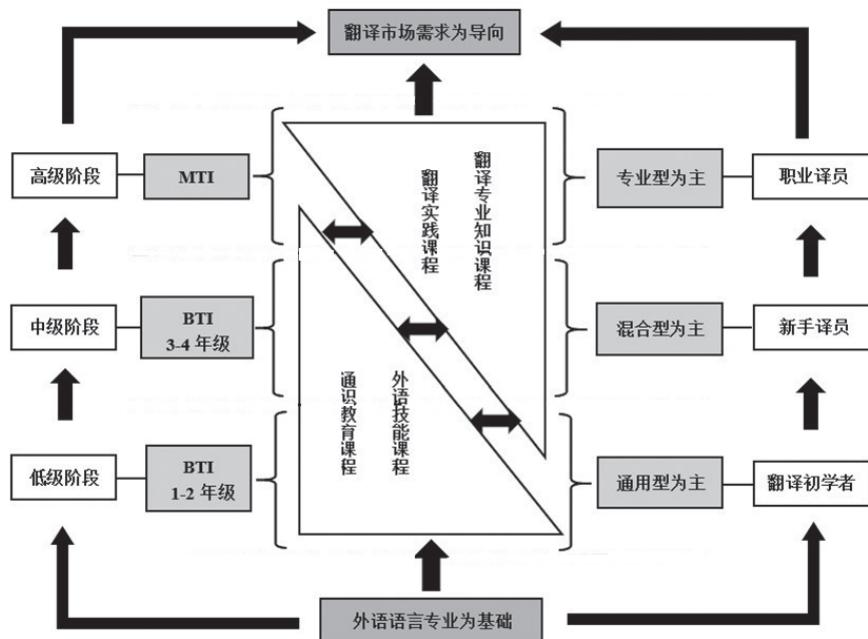
《国家标准》要求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教学指南》中表述为“复合

型人才”，与《教学要求》中关于“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的设定相呼应，可见，“复合型”或“通用型”是目前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定位，但是“复合型”是否可以解读为“通用型”+“特定专业”或“特定语言”，本科阶段究竟是侧重于“通用型”“复合型”还是“专业型”，这些关键点仍未得到明确界定。以上指导性文件仅提出纲领性要求，供各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单位酌情自行调整，虽然预留了充分的自主空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单位对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的困惑。

3. 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3.1 模式设计

本文针对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界定的模糊性，提出了以“通用型”为主、“专业型”为辅的分层互动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如图2）。本模式以外语语言专业为基础，以翻译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3个阶段划分和衔接教学，即初级阶段形成对翻译的基本了解，中级阶段进行基础训练，高级阶段进行程序化训练，形成系统化教学（刘和平，2008: 38）。此教学体系包含通用型课程和专业型课程两大版块，前者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和外语技能课程，集中于翻译专业本科一到二年级，后者包括翻译专业知识课程和翻译实践课程，集中于翻译专业本科三到四年级。两大版块组成部分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学生从翻译初学者到新手译员的成长过程，并为下一步从事相关职业或进入MTI奠定基础。



需注意的是，人才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需对翻译专业本科所能培养的译员能力有较为客观的认识，正如《全国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中强调：毕业生“能够胜任一般难度的笔译、口译或其他跨文化交流工作”。“一般难度”也就意味着翻译专业本科学生毕业时离能够独挡一面的职业译员水准仍有一定差距，其翻译职业能力需要在工作岗位或MTI学习中完善和强化。因此，翻译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仍然应以“通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为目标，让学生掌握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加上一定的翻译职业训练，才能为其长远职业发展打好基础。如果在本科阶段加入过多翻译专业课程，挤占外语基本技能和通识教育课程的时间，很有可能会拔苗助长，适得其反。翻译专业本科教育应回归翻译专业基础阶段的本质，根据翻译市场需求加强学生翻译技术等方面综合能力，增加其就业竞争力，同时以良好的外语技能和翻译专业知识为基础，才能与MTI阶段高度专业性的翻译专业课程更好地衔接。

3.2 实施路径

翻译绝非只是文字间概念的转换，而是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交互活动（何刚强，2013: 42-45）。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系（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教授让·德利尔（Jean Delisle）（1988: 96）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需要进行专门训练（1988: 96）。本研究提出以“通用型”为主、“专业型”为辅的分层互动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需从教学理念、课程设计、师资团队、翻译技术、职业伦理等方面入手，实现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3.2.1 教学理念国际化

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应服务于国内翻译市场的需要，也应关注国际翻译教育组织及国外翻译专业院校的教育理念，进一步开阔思路。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ermanente D'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ètes，简称CIUTI）是国际权威翻译教育认证组织，在国际翻译界乃至各国际组织语言服务方面均享有崇高的声誉。其正式成员需经过严格的质量评审，均为国际上培养翻译专业人才有所建树并得到国际认定的世界一流翻译院校，目前国内已经有5所大学成为其会员，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该组织致力于保障高质量的职业口笔译工作，帮助优秀口笔译员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口笔译理论研究，并对口笔译人员进行培训（程维，2015: 74）。其人才培养理念可概括为理论与实践并重、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质量评估为保证和以行业变化为调节（苗菊、杨清珍，2014: 52-55）。可见，翻译专业本科培养“通用型”或是“专业型”人才是一个动态决策的过程，培养单位需保持国际化视野，并在与市场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做出调整，也需根据生源质

量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差异化处理。

3.2.2 课程设计模块化

2005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开始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模块化课程体系改革，以解决长期以来高等院校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自成体系且各自为政的问题（肖丽艳，2016: 46），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本研究将翻译专业本科课程整合为通识教育、外语技能、翻译专业知识和翻译实践4个主要模块。各课程模块是开放性的，均可不断吸收新课程，充实完善其自身结构体系；各课程模块的设置也是动态的，根据时代需求和各届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以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黄春芳、张法连，2019: 14）。为加强翻译专业本科学生知识的基础性和整体性，应重视通识教育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化、以及中西方文化、哲学方面的课程，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经典作品研读、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级汉语写作、中西文化比较、中西方哲学、中西方思想史和逻辑学等课程（穆雷、郑敏慧，2006: 6），作为提高学生汉语素养的有效方法。课程体系的设置也应充分重视外语技能模块，包括外国语言学基础知识及其他外语技能课程。翻译专业知识模块主要包括翻译学理论、基础口笔译、翻译技术等专业课程，培养专业技能全面的译员。另外翻译实践课程必不可少，应以项目化教学的方法，让学生以项目管理、翻译人员、技术人员等职业身份参加到真实的翻译项目中（张政、王贊，2020: 67），提高翻译实践和团队协作能力，并在翻译项目中积累真实的素材，用于撰写翻译实践报告和毕业论文。翻译专业本科课程的模块化设计，有助于构建通用型知识和专业型知识之间的互动和联通，关注翻译专业知识渗透和多学科知识渗透之间的关系，实现翻译专业本科学生通用型和专业型能力的动态提升。

3.2.3 师资团队复合化

教师作为翻译专业本科翻译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者，应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复合型表征、双语概念调节型表征和翻译实操能力等（刘绍龙、王柳琪，2015:169-173）。翻译专业本科教学团队除语言专业和翻译专业的教师，还应包括具有跨学科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由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复合化的师资团队。由外语专业背景的教师承担语言课程教学，也需要请非外语专业背景的教师协助如汉语言知识、中西方哲学、自然语言处理等非语言课程教学。师资团队的复合既包括同一位教师兼具多学科教学能力的单人复合，如同时具备双语翻译转换的认知操控过程及双语转换的认知操控能力，也包括将不同学科的教师优势互补，从而培养不同学科知识表征于单人或多人的师资团队，为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提供人员支持。

3.2.4 翻译技术平台化

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2018）、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

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2019）等文件中都提出了教育现代化与教育信息化的要求，因此，提升翻译专业本科学生利用翻译技术手段获取和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成为符合市场和时代需求的必备技能。现代翻译技术包括“翻译服务人员在翻译过程中综合应用的各种技术”（王华树，2017: 4），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简称 IOS）于 2015 年发布翻译服务标准 IOS17100，翻译技术类型包括：内容管理系统、桌面排版、文字处理软件、翻译管理系统、翻译记忆工具和计算机辅助翻译、质量保证工具、本地化工具、术语管理系统、机器翻译以及项目管理软件等（IOS, 2015: 17）。翻译技术课程内容丰富，且技术不断更新，仅通过单独课程很难达到教学效果，而应渗透于翻译专业相关的所有课程中，形成互相连通的教学平台，通过翻译作业和翻译项目模拟强化训练。学生使用翻译技术软件完成每门课程的作业，可在教学平台展示并获得虚拟币作为奖励。教师也在平台分享国内外翻译技术教学资源，如世界翻译教育联盟技术教育研究会发布的翻译技术系列课程，推动翻译教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邹兵、赵军峰，2017: 73）。实现翻译技术教学平台化有利于整合翻译技术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成就感，培养懂翻译、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3.2.5 职业伦理实例化

“伦理是一个捍卫秩序的意识形态范畴，秩序又是任何体系存在的基础”（李晓燕等，2018: 13）。切斯特曼将译者的责任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视作翻译伦理规范之一，认为译者应对原文作者、翻译的委托人和译者本身负责（Chesterman, 1997: 64-70）。翻译教学更要增强译者责任意识，让其将责任意识融入到翻译实践活动之中（罗迪江、廖倩，2018: 121）。翻译专业类课程安排在本科高年级，学生翻译能力处于逐渐成长为新手译员的中级培养阶段，教师应及时关注学生学习状态，以便创造恰当的时机进行翻译职业伦理教育。如学生利用语料库资源和机器翻译平台等技术手段辅助翻译时，教师应注意引导其合理使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仍然需要良好的译文审校能力，不能过度依赖翻译技术，以免独立思考能力弱化。对翻译技术的合理使用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基本伦理要求，不能过度依赖机器翻译自动生成的译文做机械性修改，否则翻译能力得不到充分训练（张政、王贊，2020: 150）。如何以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的方式，结合翻译技术合理使用等实例开展职业伦理教育，也是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中需持续关注的问题。

4. 结语

本文探讨了以“通用型”为主、“专业型”为辅的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理念及实现路径，并强调翻译专业本科翻译人才职业伦理培养的重要性。如《论语·述而》中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杨伯峻，

1980: 67), 中华传统文化中对教育的预期集中于“道”“德”“仁”“艺”4个方面, 培养术德兼修、德才兼备的翻译人才也是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责任所在。面对翻译市场变化和翻译技术发展的持续挑战, 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单位需从教学实践中归纳出富有成效的教学理论, 形成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方案, 在学科体系内部交流共享, 从而形成动态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 [1]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2] BSI Standards Publication. ISO 17100. *Translation Services—Requirements for Translation Services* [S]. 2015.
- [3] 程维, 魏子杭. 欧洲高校翻译人才多元化培养一窥——国际翻译院校联盟主席 Frank Peeters 教授访谈 [J]. 中国翻译, 2015(5): 74-77.
- [4] 何刚强. 彰显特色, 知行并举——本科翻译专业教材编撰应处理好五个关系 [J]. 上海翻译, 2013(2): 42-45.
- [5] 黄春芳, 张法连.“全人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法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J]. 外国语文, 2019(6): 11-15.
- [6] 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 [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 [7]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Z].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8]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 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 [Z].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 [9] 李晓燕, 郭满峰, 龚东风. 译者中心的理论缺陷——兼论“三边共生”的翻译伦理 [J]. 上海翻译, 2018(3): 12-18.
- [10] 刘和平. 再谈翻译教学体系的构建 [J]. 中国翻译, 2008(3): 35-39+96.
- [11] 刘绍龙, 王柳琪.“通用型”和“特色型”译才培养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以浙江工业大学翻译本科为例 [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169-173.
- [12] 罗迪江, 廖倩.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机制研究 [J]. 当代外语教育, 2018: 117-124.
- [13] 苗菊, 杨清珍. 崇尚质量, 追求卓越——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的翻译教育理念 [J]. 语言教育, 2014(3): 52-55+66.
- [14] 穆雷, 郑敏慧. 翻译专业本科教学大纲设计探索 [J]. 中国翻译, 2006(5): 3-7.
- [15] 让·德利尔.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 [M]. 孙惠双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16] 王华树. 翻译技术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7] 王伟. 本科翻译专业(BTI)建设: 现状、问题及对策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173-175.
- [18] 肖丽艳. 翻译专业基于核心能力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J]. 西部素质教育, 2016(8): 46+48.
- [19]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0] 杨晓红, 李升炜.“一带一路”背景下甘肃省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现状及翻译教师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 108-113.

- [21] 张政 , 王贊 .MTI 项目化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培养 : 理论与实践 [J]. 外语界 , 2020(2): 65-72.
- [22] 张政 , 王贊 . 哲学视域下的人与翻译技术关系之思考 [J]. 外国语文 , 2020 (3): 145-151.
- [23] 赵朝永 , 冯庆华 . 《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中的翻译能力 : 内涵、要素与培养建议 [J]. 外语界 , 2020(3): 12-19.
- [24] 中共中央国务院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N]. 人民日报 , 2019 年 2 月 24 日 (001).
- [25] 中国翻译协会 .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 [R]. 北京 : 中国翻译协会年会 , 2019.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05 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结果的通知 [EB/OL]. 2020. 05. 31.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705/201001/xxgk_79983.html.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2018.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通知 [EB/OL].2020.05.31.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705/201001/xxgk_79983.html.
- [28] 邹兵 , 赵军峰 . 创建全球政产学研协同平台 推动世界翻译教育事业发展 —— 世界翻译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暨翻译教育国际研讨会综述 [J]. 中国翻译 , 2017 (2): 72-75.

俄罗斯培养译员的专家模式及其启示

王晓阳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俄罗斯高等教育中的专家模式是一种五年制的完全高等教育形式, 具有悠久的历史、成熟的经验和丰硕的成果。《翻译国标》是俄罗斯高校培养翻译方向专家译员的主要标准, 是俄罗斯高等教育历史经验和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结晶。该国标以培养译员职业能力为中心, 系统性地提出了专业译员的职业方向及其所需具备的各种能力, 以及相应的课程标准、实习要求、毕业标准以及教学条件。《翻译国标》相对系统、成熟, 可为我国的外语教学, 尤其是翻译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俄罗斯; 专家模式; 《翻译国标》; 翻译学; 译员; 能力

The Specialty Model of Training Translators in Russia and Its Reference Value

WANG Xiaoyang

Abstract: The specialty model in Russian higher education is a five-year form of complete higher educa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mature experience and fruitful results.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 sets the main criteria for training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Russia.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ussia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With ability at its cores, it systematically proposes the professional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the various abilities required, the criteria and teaching conditions of related courses, internships and graduation tests.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 is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mature, which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ou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specially for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ors.

Key words: Russia; specialty model; *National Standard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r; ability

基金项目: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翻译能力的构成与培养——基于俄罗斯国家教学标准《翻译与翻译学》的研究”(编号: JJKH20201139SK) 和“吉林省珲春市俄语语言景观生态考察及汉俄翻译对比研究(编号: JJKH20190397SK)”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晓阳, 男,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俄语语义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研究。

0.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对于外语人才，尤其是对高素质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更为紧迫。合格的译员不仅要熟练掌握外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还要深入了解外语使用国的历史、国情和文化等，也就是要理解语言所反映的现实。此外，在使用外语与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恰当的交流技巧，稳定的心态和良好的应变能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员的职业活动，也是教学过程中需要重点培养的素质。译员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具备在母语和外语之间熟练转换的能力，其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语教育的水平。在这方面，经过多年的沉淀，俄罗斯培养译员的专家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外语人才方面较为成熟的机制，可为我国外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1. 俄罗斯高等教育的专家模式

苏联高校的旧学制包括3个层次，即“专家资格”“副博士”和“博士”。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大学没有学士学位，所有大学生都攻读专家学位，其目标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直到1996年，受欧美教育体系的影响，俄罗斯才正式引入了本科学位。2003年9月，俄罗斯正式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为了融入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博洛尼亚进程”，俄罗斯对本国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在高等教育方面，学位体系向欧洲靠拢，逐渐取消了专家学位，增设四年制的本科学位和两年制的硕士学位，同时将之前的副博士学位改称博士学位，计划形成“学士”“硕士”和“博士”3个层次（胡延新、曾梅、房庆平，2010）。目前俄罗斯高等教育中新旧两种学制并存，而随着新学制的普及，“专家”“科学副博士”等也将成为历史。

专家是俄罗斯高等教育中一个独具特色的传统学位，学习期限通常为5年。在学习的前几年，专家和本科生一样，学习本学科的基础知识，而在最后两年的学习中，专家在专业方向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性学习和职业技能培训。在撰写论文并通过国家认证委员会组织的答辩后，毕业生被授予专家学位，即我们熟知的“医生”“经济师”“律师”等。通俗地说，专家是掌握基本职业技能的高素质的毕业生，无需进行“岗前培训”即可直接与社会需求对接，从事本行业的工作。

专家资格教育不同于俄罗斯现行的硕士学历教育。硕士学历教育是在学士学历教育的基础上再接受专业培养（包括科研或教学实习），学制2年，经考核合格，学生可获得高等教育毕业证和相应专业的硕士学位。而专家资格教育的学制通常不超过5年（Минобрнауки, 2020）。大学生按规定修完专家资格教育全部课程，经考核合格，可获得高等教育毕业证和专家资格证书，并且可以直接考取博士（张庆晓、贺静霞、周石其，2019）。

简而言之，专家学历教育类似国内的“本科教育”+“资格证书考试”的模式，近似于国内的“专业硕士”学位（MTI）。学士和专家都是完全高等教育形式，但专家模式的针对性更强，是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并直接面向职场的教育形式。

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专家资格教育的主要优势之一。在俄罗斯，拥有专家文凭的毕业生声望很高，相对于学士而言，他们更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雇主对这类毕业生的评价远高于学士学位，因此提供的薪资更为丰厚（Матвеева, 2018）。

为了保证专家译员的培养水准，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2016年11月正式颁布了第四版《翻译及翻译学专业高等教育联邦国家标准》（«Феде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тандарт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 и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下文简称《翻译国标》），然后于2020年8月12日批准了第五版《翻译国标》，并自2020年9月7日起实施（Минобрнауки, 2020）。《翻译国标》清晰地阐述了翻译学科的特点、翻译学方向毕业生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及其培养模式、目标和途径等，并对人才培养规格提出了明确要求。鉴于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翻译和翻译学专业高等教育国家标准，上述国标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我国高校外语专业翻译硕士、本科翻译方向乃至整个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培养译员的途径——《翻译国标》

《翻译国标》明确规定了翻译和翻译学专业的特点、翻译专业毕业生从事职业活动时应具备的能力以及培养上述能力的途径。它主要包括7个部分：适用范围、缩略语、专业描述、职业方向、职业能力、教学大纲和教学条件。

《翻译国标》使翻译方向的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以及在从事未来职业过程中在不同场合下自身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从而更好地发展和完善自我；对教学工作而言，它规定了翻译专业教学的基本标准，可以规范教学单位的教学条件、教学内容和应达到的教学水平。

从教与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国标》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4个方面。

2.1 职业定位

《翻译国标》提出，获得专家学位毕业生的职业活动方向是国际关系、国防和安全以及法制法律领域的跨文化交际。其中国际关系涵盖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等领域，国防和安全则侧重于军事信息和情报的搜集、整理和编译等（Минобрнауки, 2020）。

根据毕业生将来从事的职业不同，专家译员培养方向有3个：专业翻译、

国际关系的语言保障和军事活动的语言保障。在培养过程中，他们工作的客体是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包括进行笔译、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对任何难度、任何题材的译文进行编辑和校对、整理加工，并通过摘译、编译等方法撰写综述、简报和调查报告等；系统掌握外国语言及文化、掌握所学语言及翻译理论；通晓国际关系领域中跨文化沟通知识以及保障国家国防安全和法制的手段和方法等。

2.2 职业能力

为了满足上述职业活动对专家的要求，《翻译国标》比较详尽地明确了大学生学习过程中应该培养的能力。根据这些能力和职业活动的关系，职业译员应当掌握如下4个层次的职业能力。

2.2.1 普通文化能力

普通文化能力是“个人的基本能力，可以保证个体进入世界文化空间并在其中确定自己的角色，在实践活动中使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掌握言语理解和语言文化的规范、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及分析理解社会的能力”（РГППУ, 2017）。普通文化能力类似于国内通识课程所培养的能力，目标在于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和有教养的人。普通文化能力是个人综合素质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中任何公民的基本素养，也是从事任何职业活动之前的奠基性能力。

具体而言，译员的普通文化能力可以分为如下方面：具备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素养，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重要现象；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并理解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运用基本法律理论；具有爱国情操、公民立场和职业道德规范；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良好的母语沟通表达能力；具备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健康意识和锻炼习惯等（Минобрнауки, 2020）。

2.2.2 普通职业能力

普通职业能力是“不同职业共同需要的共同能力”（Налимова, 2014）。就专家学历的大学生而言，他们需要掌握的普通职业能力包括：对书面文本、视频、录音、网络资源等各种形式的信息进行处理的能力，如搜索、保存和加工信息的能力；采用各种手段保证信息安全的能力；必要情况下在职业活动中使用两门外语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和掌握语言对象国知识，进而将其应用于个人职业活动的能力；紧急情况下的急救能力等。

2.2.3 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体现了特定职业活动（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的特殊性，可以被看作普遍文化能力、普遍职业能力在学习课程中和在具体职业活动中的体现形式”（Налимова, 2014）。译员的职业能力是指“保证译员能够专业地解决自己面临问题的所有知识、能力和技能的总和”（Бутусова, 2012）。根据职业活动领

域的不同，译员的职业能力又可分为组织—交际能力、信息分析能力和科研能力。

(1) 组织—交际能力。包括对各种形式外语的理解和分析，并正确地使用外语输出；掌握外语的功能语体特征；正确地识别通过称名手段、代词或语气词等所表达的社会关系；识别语言所体现的个性特征；翻译过程中对源语的预测和判断能力；利用网络等资源解决翻译难点的能力；等值翻译能力；校对译文能力；保留原文的修辞、语体特征进行交替传译和视译的能力；高质量口译能力；交替传译过程中的速记能力；稳定的心理素质等。

(2) 信息分析能力。译员工作的主要部分和核心部分是完成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还要对译文做出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这就需要译员能够批判性地处理信息，对信息进行概括、评价和解释，并根据源语言文本撰写报告和综述等。

(3) 科研能力。在职业活动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通过科研活动解决职业任务的能力；对文本进行语言翻译分析以及从语言国情学角度进行解释的能力；对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和翻译学领域的研究材料进行分析以解决职业任务的能力；对文本进行语言翻译学分析以及对文本进行语言翻译学和语言国情学解释的能力。

2.2.4 职业—专业能力

“职业—专业能力是指在掌握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在特定领域开展专业活动的能力和受教育情况”（Окуловский, 2013）。职业—专业能力是专业译员在真实的工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能力，需要直接面向实际工作，真正充当“人—语言—人”这一交际环节中的中介，工作环境也更为复杂，可能会遇到许多突发事件。因此，译员应当对工作环境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具备随机应变的处理能力。这需要译员掌握各种口译场合中的译员国际礼仪和行为准则，敏锐地发现具体工作中跨文化交际的失误，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以保障交际活动顺利进行，以及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处理突发情况等。

2.3 教学内容

课程、实习和测试是专家资格教学大纲的主干。课程包括全国统一的必修课和培养单位开设的选修课两部分，这既保证了全国实施专业教学大纲的统一性，也保证了各个培养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而开设具有自己特色的课程，从而实现“同中有异”“和而不同”的培养目标。课程是教学大纲的主要部分，总学分达到 270-276 学分，约相当于总学分的 90%。包括科研工作在内的业务实习为 18-20 学分，约占总学分的 7%。根据实习地点，实习可以分为本地实习和外地实习；实习方式则包括教学实习、翻译实践和科研活动等。国家综合测试部分为 6-9 学分，约占总学分的 3%。

2.4 教学保障

根据《翻译国标》的要求，培养机构应该具备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能够保

证所有类别的学科和跨学科的培训，保证学生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具体包括充足的图书资料（含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国家财政拨款保障以及教师具备较为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翻译从业经验等。《翻译国标》尤其注重现代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要求高校建设覆盖教学区域的无线网、向学生提供远程访问服务，包括进行网络教学、使用远程教学技术、访问现代专业数据库和信息系统，采用线上或者线下教学模式等。

《翻译国标》特别强调，要充分考虑到残障人士的特殊性，各种教学手段的选择和实施都应保证他们无障碍地接收和理解教学内容，同时残障人士的学习期限可以适当延长等。换言之，教学手段不能成为残障人士学习的障碍。

3. 《翻译国标》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翻译和翻译学”的国家教学标准，甚至尚未把翻译学列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目前国内的翻译系一般都设在外国语学院。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GB/T 13745-2009》中，翻译学仍处于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下。此状况既与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不匹配，在实践中也无法满足国内外对翻译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由于翻译和翻译学具有自身的规律，纯粹的外语学习无法满足翻译人才培养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翻译的本质，将翻译学尽快从外语学科中独立出来，确立其应有的学科地位。尽管如此，《翻译国标》中许多内容可为我国翻译专业、乃至整个外语专业的教学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3.1 重视爱国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培养

《翻译国标》的制定是为了统一俄罗斯境内的教学空间，规定翻译和翻译学所需要达到的基本标准，这有助于大学生增强国家一体化意识。该国标中的许多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点，如要求教学语言“除非机构的个别规范文件另行规定，与专业教学大纲有关的教学活动应以俄罗斯联邦官方语言进行”（Минобрнауки, 2020）。这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有助于增进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此外，《翻译国标》中多次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捍卫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意识以及在工作过程中的保密意识等，在知识结构方面要掌握俄罗斯历史发展主要阶段及规律性、理解俄罗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等，这些都表明了爱国主义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教育事业应为国家服务的思想。

3.2 面向职业活动需求培养相应的职业能力

翻译和外语教学应当根据毕业生将要从事工作的实际需要，面向职业活动的实际需求，培养相应的职业能力。对于译员而言，其核心的能力当然是在两种或者多种语言之间进行准确、快速转换的翻译能力。这不仅要求译员具有熟练的

语言技能，同时还要拥有丰富的杂学素养。此外，译员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其恰当的交际能力、迅捷的应变能力和良好的仪表举止等都必不可少。译员综合能力中，许多能力看起来似乎与翻译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法律应用能力、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认识能力等，但它们都是职业活动的重要辅助，而这些也是我国外语教育中所易于忽视的能力。

3.3 保证外语学习足够的课时量

由于译员需要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对这些素质的培养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翻译和翻译学”的学制为5年，共300学分，每学分的授课时长为36学时（每学时等于45分钟）。所以，平均每一学年应获得60学分，相应的学时量达到1080学时，如果按每学期18个教学周来计算的话，每周平均课时量达到60课时。反观国内，在减负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不少专家建议本科阶段学分不能超过180学分（谢元花、陈秋丽，2019），可见俄罗斯的课时量相当繁重。

众所周知，外语学习需要充足的时间来识记语言材料、重复训练和巩固，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综合性大学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教育课时有限，无法达到让学生掌握外语技能的最低标准，虽然起到了打开一扇窗的作用，但熟练掌握更多取决于个人语言天赋及学习时间的投入，大多数学生的外语水平离自如对外交流还有相当距离”（陈海燕，2018）。这里谈到的虽然是非外语专业，但国内高校外语专业的情形与此类似。可喜的是，为了克服课时不足的问题，国内不少高校采用翻转课堂和第二课堂等教学模式拓宽教学空间，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顾晓乐、赵毓琴，2019；周淑娟，2012）。

4. 结论

《翻译国标》是俄罗斯进入新世纪后在翻译教学方面制定的重要的标准性、规范性文件，它根植于俄罗斯的教育历史，同时又与时俱进，结合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并面向译员的职业活动，以培养译员的“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根据译员的职业方向，全面地规定了译员应当具备的各种层次的能力，说明了培养方法和教学保障条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该国标相对成熟，系统性较强，为我国制定类似的高等教育国家标准、改进外语教学和翻译教学，培养全面发展的、面向职业市场的实用型外语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Бутусова А. С.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Компетенции Ус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чика [J]. *Альман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2, 12 (67): 28.
- [2] Налимова И. В., Елифантьева С. С. Метод Проектов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Компетенций Будущих Учителей Начальных Классов [J].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4(1): 235- 237.

- [3] Матвеева Е.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чик: Модель Специалиста[J]. *Вестник Башки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1): 211.
- [4] Минобрнауки Росс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тандарт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45.05.01 Перевод и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уровень специалитета)* [C/OL]. <http://fgosvo.ru/news/3/2067>. (2020-9-25)
- [5] Минобрнауки России.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08.2020 г. № 989* [C/OL]. <https://rg.ru/2020/08/30/minnauki-prikaz989-site-dok.html>. (2020-9-6) .
- [6] Окуловский О. И.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Компетенций у Обучающихся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узов [J]. *Молодой Ученый*. 2013(2): 387.
- [7] РГППУ. *Педагогика* [M].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7: 16.
- [8] 陈海燕 . 国际化人才 , 会说外语还不够 [N]. 《光明日报》 , 2018 年 05 月 26 日 07 版 .
- [9] 顾晓乐 , 赵毓琴 . 研究生学术口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J]. 继续教育研究 , 2018(23): 116.
- [10] 胡延新 , 曾梅 , 房庆平 . 俄罗斯高校考试与评价制度 —— 积分制的改革试点及其启示 [J]. 中国成人教育 , 2010(05): 93-95.
- [11] 谢元花 , 陈秋丽 . 高校英语教师对任务型教学的理解与实施探究 [J]. 现代外语 , 2019(02): 268.
- [12] 张庆晓 , 贺静霞 , 周石其 . 俄罗斯实施博洛尼亚进程的背景 , 举措与启发 [J]. 高教探索 , 2019(8):102.
- [13] 周淑娟 . 浅谈俄语教学中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互补关系 [J]. 青年文学家 , 2012(24): 84-85.

柬埔寨民间文学中的华侨形象

陈俊源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东语系, 海南 文昌 571321; 广西民族大学 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柬埔寨民间文学中蕴含着柬埔寨文化最基本的特点, 反映了柬埔寨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本文通过分析柬埔寨民间文学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发现其中呈现的华侨形象是擅长经商、和谐相处和吃苦耐劳的。笔者认为, 探讨柬埔寨传统社会中的华侨形象, 有利于增进我们对柬埔寨人的了解, 并以平等友善的态度与他们交往。

关键词: 柬埔寨 ; 民间文学 ; 华侨 ; 形象

The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n Folk Literature

CHEN Junyuan

Abstract: Cambodian folk literature contains the most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ambodian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codes of conduct of Cambodian people. Through analyzing some plots of Cambodian folk literatur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presented the image of being good at doing business, living in harmony and bearing hardships and standing hard work.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exploring the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s traditional society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ambodian people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m in an equal and friendly manner.

Key words: Cambodia; folk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 image

0. 引言

自古以来, 华侨华人移居柬埔寨的现象较为常见, 有因使节往来而随之者, 有因商贸往来而居留者, 有因生活所迫而南下者, 也有因战乱纷争而避难者。这些现象在元朝周达观著的《真腊风土记》、中国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的《柬埔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2020 年规划课题“柬埔寨琼籍华人口述史研究”(课题编号: HNSK (QN) 20-6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俊源, 男,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讲师,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柬埔寨语言文学、东南亚文化与国情研究。

寨华侨志》、梁明编著的《高棉华侨概况》等著作中都有介绍和讨论。然而，这些著作缺少就柬埔寨当地史料、文献或文学作品的相关记载而开展的研究工作。基于此，本文以柬埔寨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阅读译著、文献和做田野调查，探讨柬埔寨人历史记忆中的华侨形象，以弥补现有研究资料的不足。

民间文学又称“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文学”“口碑文学”“口传文学”，它与作家书面文学相对应，因其作者系人民大众，表现手段主要为口语，所以习惯上被称为民间文学（杨亮才，1989:276）。20世纪80年代，钟敬文先生（1980:1）在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一书中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达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进入21世纪后，刘守华和陈建宪先生（2002:5）认为：“民间文学是一种民族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既是该民族人民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又是他们关于历史、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本文讨论的柬埔寨民间文学，是指柬埔寨人民群众通过口头语言的方式和口耳相传的手段，创造出的广泛流传于柬埔寨民间的文学作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柬埔寨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来自于中国公开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相关译著和田野作业，同时参考相应的柬埔寨语文献资料。

1. 擅长经商

《阿奇塞的故事》¹是一则广泛流传于柬埔寨民间的幻想故事，是柬埔寨劳动人民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幻想和虚构，以表现民众生活和理想愿望的故事。阿奇塞即是马粪小伙之意，原本是一位给当地财主放马的马夫，居住在靠近河边的一个马厩里。他十分勤劳朴实，每天都把马粪收集起来并装在草袋里。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商船队，于是请求船主帮忙把自己日常收集的马粪作为礼物运送给中国皇帝。商船回到中国后，这些马粪全部都变成了黄金。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中国皇帝让工匠制作了一只大鼓，并下令把公主和一条神奇手巾放在鼓里，派御史用船给阿奇塞送去。到了柬埔寨，公主使用父王赠给的神奇手巾，不仅改变了阿奇塞的贫困生活，还协助打败了当地国王派来的兵。最终阿奇塞成了柬埔寨的国王。故事说明一个人只有经过自助、自立、自强，才能获得幸福，表达了柬埔寨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从侧面反映中柬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和传统友谊（邓淑碧，2012:125）。在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地柬埔寨人对华侨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擅于从事经济贸易活动，频繁驾船来往于中国与柬埔寨两国之间，是早期中柬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推动者。具体的故事情节如下：

一天，来了一个庞大的商船队，大约五百艘船。阿奇塞大声招呼说：“喂，

到这儿来一下。”船靠岸后，他问船主：“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船主说：“来自中国。”阿奇塞又问：“你认识中国的皇帝吗？”船主答：“认识，我家就住在皇宫附近。”阿奇塞说：“中国皇帝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交情很深。等你们回国时，我想拜托你们捎点东西给我的朋友。”船主答应了。商船队又继续航行，前往其他地方做生意。不久，船主来找阿奇塞，“你有什么东西要托我带给中国的国王吗？”他问。“你拿来给我吧，我们今天就要开船了。”船主雇了搬运工，将四百袋马粪装上船，告别了阿奇塞，回到中国（邓淑碧译，2012: 123）。

此外，在另一则《蔑匠的故事》²中，也有类似谈及中国与柬埔寨的经济贸易活动的情节，具体叙述如下：

弟弟普安经常在码头上走来走去，希望遇见从中国回来的什么人，因为他很想得到哥哥的消息（陈彻译，1981: 2）。一天，有一艘中国商船经过这里，普安就问：“船主啊，你认识一个去中国谋生五年的高棉人吗？”船主回答说：“我曾看见过一个高棉人，他现在可是富得很，没人能比得上他。”普安又问：“船主哪天回中国？”船主回答说：“再过三天，我的船就开回去。”普安请求道：“请您可怜可怜我吧，让我搭您的船去找我的哥哥吧！”船主表示同意（邓淑碧译，2012: 57）。

从上述两个文本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早期华侨往返中国与柬埔寨的交通工具之一是商船。商船不仅可以运载柬埔寨当地货物到中国，而且也可以搭载押运货物的中国人。故事中的船主很可能是早期华商，他们熟悉航线，从事着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起到了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桥梁作用。他们还可能是最初的“水客”³，在行商的同时也把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介绍到东南亚国家垦殖与开发。

2. 和谐相处

上文中提到的《蔑匠的故事》也是柬埔寨民间的一则幻想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古时候，有两兄弟，哥哥名叫帮奇，弟弟名叫普安。在他们的父母离世后，兄弟二人一起出家并得到寺庙长老的良好教育。出家五年，寺庙长老允许他们还俗，并作了殷殷嘱托。兄弟二人与师父告别后，便按照师父的叮嘱各自谋生去了。哥哥帮奇来到中国做生意，不久成了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弟弟普安经历的人生则非常曲折，他首先投靠了亲戚，通过亲戚说媒完婚后，生活依然十分艰难，便打算乘船前往中国向哥哥求助。然而到了中国，他起初被哥哥的妻子误以为是骗子，后来从中国返回柬埔寨时，只得到了哥哥给的一块布，甚为难过。返乡途中，普安在海上意外得到妖怪赠予的三件宝物，一条魔绳、一根魔棍和一只魔锅。不幸的是，藏在家里梯子下面的三件宝物被偷走了。普安决定拖着梯子前往皇宫告状。真相大白后，普安将这三件宝物送给了国王，并请求国王给他制作一把特殊

的蔑刀，从此人称蔑刀匠。七年后，普安凭着勤劳肯干、忍辱负重、不贪权位、忠于职守的高尚品德，成为了两个国家的国王。

此则故事是柬埔寨人民口耳相传下来的，主要向听众传递了一个人要担当重任、有所作为，必须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道理（邓淑碧译，2012: 66）。故事还反映了华侨与柬埔寨人有着互帮互助的历史传统。具体情节如下：

普安的要求得到船主的应允，便高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中，普安把哥哥在中国发了财和自己要去找哥哥的想法通通告诉了妻子。妻子问：“你和谁一块儿去？”普安答：“我搭中国商船去，三天以后就出发。”妻子冷冷地说：“你要去就去吧！”过了三天，商船来到码头，普安上了船。一路上，普安细心照看商人的货物，就像照看自己的东西一样。商人见这男子勤劳肯干，心眼好，很喜欢他，每天免费让他和自己一起吃喝。普安搭船到了中国，他问船主：“何时再回柬埔寨？”船主说：“再过三天就去。”普安与船主约好后，就忙着去找哥哥（邓淑碧译，2012: 57-58）。

故事中的弟弟普安是一位柬埔寨人，在乘坐中国商船航行的日子里，因为热心地保管船上的货物得以与商人一同吃喝。这里不仅反映了柬埔寨民族性格中的包容与大度，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主动给予帮助，而且还反映了华侨与柬埔寨人之间关系的融洽。正如笔者在柬埔寨实地调研华侨华人与柬埔寨人的互动关系时，一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村长 BCH 告诉笔者：“许多年以来，华侨华人与柬埔寨人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互相帮助，唇齿相依，有着兄弟姐妹一样的情谊。”对此，这位村长还讲述了流传在当地的另一则奇闻：

很久以前，在柬埔寨人的村落里居住着几户华侨人家，他们计划在靠近湖边的位置建房屋，便拿起锄头和大刀开始砍树。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两棵大树终于被砍掉了，落在地上，他们心里非常开心，还将大树劈成一段一段，抬回家生火煮饭。此后，这些华侨每天晚上都听到有马在疾跑的声音，可点起油灯去寻找，却又找不到马群。他们感到很害怕，不敢在原来的地方居住了，便来到柬埔寨人家寻求帮助。当地柬埔寨人认为可能是砍了树木后有妖魔在作怪。于是村民把这些华侨召集过来，一起聆听高棉长老的解释和建议之后，决定把原来在大树下的黑石头搬到邻近的寺庙中供奉，以免其遭到破坏。从那天晚上开始就再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了。

据笔者的访谈推测，此则奇闻虽发生在近代，但生动地反映了华侨华人与柬埔寨人之间一直有着和谐的关系。这种密切互动关系在中国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柬埔寨华侨志》（1951: 31）中也有所回应：“和善而诚实，乃一般华侨之传统德性。彼等克勤克俭以经营其经济事业，与土人能和谐相处。”

3. 吃苦耐劳

直到现在，柬埔寨人村落中仍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早期来到柬埔寨的华侨除了在华侨老板或法国人的公司工作以外，还想办法从事一些肩挑小贩的生意，主要售卖椅子、茶叶、粿条、蔬菜、包子等，以补贴家用。生活在附近的柬埔寨人也经常去华侨家里买东西。久而久之，柬埔寨人创造了一个新词汇“ទេពិន (都真)”，“ទេព (都)”译为“去、往”，“ពិន (真)”指的是中国，意思是去中国人那里买东西（郑一省、陈俊源，2017: 141）。这个词汇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柬埔寨人到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华侨那里买东西；二是柬埔寨人前往中国购买东西。显然，早期华侨的商业活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当地柬埔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柬埔寨人的记忆中，最初来到柬埔寨的华侨绝大部分是身无分文，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理想追求。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从事诸如手工编织、饲养牲畜、小商小贩等工作。《棕榈树上的美梦》（李艾译，1982）故事译本中，主人公阿·沙克·西莫克在梦中的谋生想法是：“我在树上能毫不费力地编篮子，而且比往常能多编一倍。然后我拿这些篮子到集市上卖给中国人，就能多得一倍的钱……然后我拿这些钱去买一头猪，把猪养得肥肥的，再去卖，又能赚一大笔钱……我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个中国人一样过日子呢？他刚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不过是个穷人，可现在，他已经有一所大房子，还有许多听差……（李艾译，1982: 9-10）”。实际上，主人公想模仿华侨去经商，幻想着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从一个“穷小伙”华丽转身为一名富商，以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

4. 结语

中国与柬埔寨是友好邻邦，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本文对柬埔寨民间文学进行研究，通过观察柬埔寨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生活琐事和日常话语，发现华侨在柬埔寨传统社会中的形象，也从侧面反映出柬埔寨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通过上文的分析，柬埔寨民间文学中的华侨形象具体体现为擅长经商、相处和谐和吃苦耐劳，这些形象的呈现也是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中柬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民意基础之一。希望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多倾听柬埔寨民间故事，同时还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寻找两国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故事情节和讲述方式，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更好地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注释：

1. 《阿奇塞的故事》（柬埔寨语：អាជីវការរបស់ស៊ែស៊ែ），ប្រធូប្រើប្រាស់ខ្មែរភាពទី១《柬埔寨民间故事集（一）》，បច្ចុប្បន្នយោងដើម្បីក្រសាន់ពួកសាសនបណ្តុក្រួយ（佛学院出版）。该故事在1957年5月上海市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金满成、郑永慧选译）一书中被翻译为《马粪侠》。本文选取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邓淑碧教授主编的《柬埔寨民间故事》

- 中的译名《阿奇塞的故事》，由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12年12月出版。
2. 《蔑匠的故事》（柬埔寨语：ពីង់ចេកចំបិតបន្ទាន់），ប្រជុំពីង់ប្រជាជាតិចំពោះ《柬埔寨民间故事集（二）》，ចេញដោយអាសយដ្ឋានពួកសាសនបណ្តុះត្រូវ（佛学院出版）。该故事在1957年5月上海市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金满成、郑永慧选译）一书中被翻译为《大刀人》。此后，在1981年11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陈彻译）一书中翻译为《带刀的人》。本文选取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邓淑碧教授主编的《柬埔寨民间故事》中的译名《蔑匠的故事》，由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12年12月出版。
 3. “水客”历史上多指贩运货物的行商。

参考文献：

- [1] 杨亮才.中国民间文艺辞典 [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276.
- [2]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
- [3] 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 [4] 邓淑碧.柬埔寨民间故事 [M]. 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 [5] 陈彻.柬埔寨民间故事——带刀的人 [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
- [6]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柬埔寨华侨志 [M]. 中国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 31.
- [7] 李艾.柬埔寨民间故事——棕榈树上的美梦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9-10.
- [8] 郑一省，陈俊源.柬埔寨土生华人婚俗探析——以实居省狮子桥村为例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4): 141.

《金云翘传》主要中文译本的比较研究

——以节选“第655句—755句”为例

朱 斯

(海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文化研究院, 越南 河内 10071)

摘要: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作为越南四大名著之首的《金云翘传》已凭借翻译译本走向世界,其中不乏中文译本。目前,我国学者对越南《金云翘传》的翻译,主要有四个译本。本文运用文学翻译学、翻译批评及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以选入越南中学教科书的《金云翘传》的第655句—755句的译文与原文、译本与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及分析,从而体会译者在传达原作的语言特色,叙事长诗的形式等方面的不同,达到指导翻译实践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金云翘传;中文译本;翻译;比较研究

Comparison of the Ma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n the Vietnamese Classic *Kim Van Kieu Truyen* — Take the Excerpt from “Sentence 655-Sentence 755” as an Example

ZHU Si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bridge for cultural exchanges. As the first of the four famous Vietnamese works, *Kim Van Kieu Truyen*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At present,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inly translated *Kim Van Kieu Truyen* into four versions. This article adopts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compare the translated works with the original works of sentences 655-755 of *Kim Van Kieu Truyen* which are selected to be included in Vietnamese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Wit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we can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conveying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orm of long narrative poem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s and the translated texts. H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guiding translation practice will be achieved.

Key words: *Kim Van Kieu Truyen*; Chines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study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海南省应用外语研究基地2021年外语专项课题“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海南省东南亚归侨语言生活研究”(编号: HNWYJD2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朱斯,女,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越南语言、文化研究。

0. 引言

阮攸的《金云翘传》采取了民族的语言，民歌的形式，纯熟地运用中国文学的典故，熔铸呈整齐的六八诗句。越南流行这样一句话：“翘传在，越南在”，其在越南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可谓无与伦比的。要将这样一部被誉为“大越千秋绝妙词”的长达 3254 句的叙事诗译成中文，并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意境和神韵，绝非易事。然而，孜孜不倦的译者们依然努力地运用各种翻译策略来翻译这一经典著作，向国人展示越南的语言和文化。

越南喃传长诗《金云翘传》虽然取材于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同名章回白话小说，但其脱胎换骨被译介到中国却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截至目前，我国用中文翻译的《金云翘传》有四个版本，分别是：黄轶球教授（1959）翻译的《金云翘传》（以下简称“黄译本”）；罗长山教授（2006）翻译的《金云翘传》（以下简称“罗译本”）；祁广谋教授（2011）翻译的《金云翘传》（以下简称“祁译本”）；赵玉兰教授（2013）翻译的《金云翘传》（以下简称“赵译本”）。由于“罗译本”仅在越南刊发，国内知者甚少，因此笔者仅选用国内流传的三个中文译本（节选第 655 句—755 句为例）进行比较研究和对比分析。

1. 相关理论概述

1.1 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许钧、穆雷，2009: 249）。

1.2 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对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与翻译理论、翻译史并列组成翻译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就是理解翻译与评价翻译；从狭义上讲，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价，而不论是“具体评价”还是“总体评价”，都依赖并建立在阅读、理解和对话的基础上。翻译批评不是翻译的附属品，也不能被简单视为应用翻译学的一个分支，而应该被理解为——如纽马克所言——“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许钧、穆雷，2009:281）。

就普遍意义而言，翻译的标准也是翻译批评的典律，翻译标准不仅是翻译主体在翻译实践中遵循的原则和努力的方向，也是批评主体用以鉴赏、阐释和评论译作的尺度，其重要性对整个翻译活动，包括理论的建设和实践的开展，都不言而喻。我国传统评论中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标准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等。西方的杰出代表更多，有巴斯奈特的对等理

论、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观、卡特福德的翻译等值观、左哈尔的多元系统观等，其中英国的纽马克教授对翻译批评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他认为：作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重要中介，翻译批评应当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不仅要阐明对翻译进行批评的原则、具体的步骤和方法，在批评的内容方面还要涉及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翻译理论原则与运用的具体翻译方法及译文的社会价值（纽马克，2001: 15）。具体而言，全面的翻译批评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分析原文，分析译文，对比原文和译文，评价译文的质量，分析判断译本在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中的存在价值。本文按照以上内容对《金云翘传》的中越文译本进行比较的同时，在第三步原文和译文的对比中加入了译文与译文的比较，从而更好地分析和鉴赏原文与译文。

2. 《金云翘传》（节选第 655 句—755 句）原文与所选中文译文分析

2.1 《金云翘传》（节选第 655 句—755 句）原文分析

Thương tình con trẻ, cha già. Nhìn nàng, ông nhũng máu sa, ruột rầu.

Nuôi con nhũng ước về sau, Trao tơ phải lúa, gieo cùu đáng nơi.

Trời làm chi cực bấy trời, Này ai vu thác cho người hợp tan!

Búa rìu bao quản thân tàn, Nỡ đày đọa trẻ, càng oan khóc già.

Một lần sau trước cũng là, Thôi thì mặt khuất chẳng thà lòng đau!"

Theo lời càng chảy dòng châu, Liều mình ông rắp gieo đầu tường vôi.

Vội vàng kẽ giữ người coi, Nhỏ to nàng lại tìm lời khuyên can:

"Vè chi một mảnh hồng nhan, Tóc tơ chưa chút đèn ơn sinh thành.

Dâng thư đã hẹn nàng Oanh, Lại thua á Lý bán mình hay sao?

Cỗi xuân tuổi hạc càng cao, Một cây gánh xác biệt bao nhiêu cảnh.

Lòng tơ dù chẳng dứt tình, Gió mưa âu hấn tan tành nước non.

Thà rằng liều một thân con, Hoa dù rã cánh lá còn xanh cây.

Phận sao dành vậy cũng vậy, Cầm như chẳng đậu những ngày còn xanh.

Cũng đừng tính quản toan quanh, Tan nhà là một, thiệt mình là hai."

Phải lời ông cũng êm tai, Nhìn nhau giọt ngắn giọt dài ngón ngang.

Mái ngoài họ Mã vừa sang, Tờ hoa đã ký, cân vàng mới trao.

Trăng già độc địa làm sao? Cầm dây chẳng lựa buộc vào tự nhiên.

Trong tay đã săn đồng tiền, Dầu lòng đổi trăng thay đèn khó gì.

Họ Chung ra sức giúp vì, Lẽ tâm đã đặt, tụng kỳ cũng xong.

Việc nhà đã tạm thong dong, Tình kỳ giục giã đã mong độ vê.

Một mình nàng ngọn đèn khuya, Áo đậm giọt lệ, tóc xe môi sâu.

Phận dầu, dầu vậy cũng dầu, Xót lòng đeo đẳng bấy lâu một lời.

Công trình kẽ biết mấy mươi, Vì ta khăng khít cho người dở dang.
Thè hoa chưa ráo chén vàng, Lỗi thè thôi đã phủ phàng với hoa.
Trời Liêu non nước bao xa, Nghĩ đâu rẽ cửa chia nhà tự tôi!
Biết bao duyên nợ thè bồi, Kiếp này thôi thế thì thôi còn gì?
Tái sinh chưa dứt hương thè, Làm thân trâu ngựa đèn nghỉ trúc mai.
Nợ tình chưa trả cho ai, Khói tình mang xuống tuyỀn dài chưa tan!”
Nỗi riêng, riêng những bàn hoàn, Dầu chong tráng đĩa, lệ tràn thâm khăn.
Thúy Vân chợt tỉnh giấc xuân, Dưới đèn ghé đến ân cần hỏi han.
Cơ trời đâu bể đa đoan, Một nhà để chỉ riêng oan một mình.
Cớ chi ngồi nhẫn tàn canh, Nỗi riêng còn mắc mối tình chi đây?
Rằng: “Lòng đương thốn thúc đầy, Tơ duyên còn vướng mối này chưa xong.
Hờ môi ra cũng thận thùng, Đέ lòng thì phụ tấm lòng với ai!
Cậy em, em có chịu lời, Ngồi lên cho chị lạy rồi sẽ tha.
Giữa đường đứt gánh tương tư, Keo loan chấp mối tơ thura mặc em.
Kể từ khi gặp chàng Kim, Khi ngày quạt ướt, khi đêm chén thè.
Sự đâu sóng gió bất kỳ, Hiếu tình khôn lẽ hai bè vẹn hai.
Ngày xuân em hãy còn dài, Xót tình máu mủ, thay lời nước non.
Chị dù thịt nát xương mòn, Ngậm cười chín suối hãy còn thơm lây.
Chiếc thoa với bức tờ mây, Duyên này thì giữ, vật này của chung.
Dầu em nên vợ nên chồng, Xót người mệnh bạc át lòng chẳng quên.
Mất người còn chút của tin, Phùm đàn với mảnh hương nguyên ngày xưa.
Mai sau dù có bao giờ, Đốt lò hương ấy, so tơ phím này.
Trông ra ngọn cỏ lá cây, Thấy hiu hiu gió thì hay chị về.
Hồn còn mang nặng lời thè, Nát thân bồ liễu, đèn nghỉ trúc mai.
Dạ dài cách mặt khuất lời, Ráy xin chén nước cho người thác oan.
Bây giờ trâm gãy gương tan, Kể làm sao xiết muôn vàn ái ân.
Trăm nghìn gửi lạy tình quân, Tơ duyên ngắn ngủi có ngàn áy thôi.
Phận sao phận bạc như vôi, Đã dành nước chảy hoa trôi lỡ lang.
Ôi Kim lang! Hỡi Kim lang!

越南著名文人阮攸在描述该选段“家庭遭难，翠翹被迫卖身赎父，托妹代续与金重姻缘”的内容时，采用了既有利于叙事也有利于“言志缘情”的六八诗体，凝练简洁地叙述了身世浮沉的翠翹在家破人亡之际毅然挺身而出，卖身救父，拯救全家的思量，以及她有负金盟之誓后托妹妹代续情缘的行动，至情至孝的翠翹跃然纸上。同时，作者还纯熟地运用了“缇萦救父”“李寄卖身”等中国文学典

故，增添了文章的文化内涵。此外，其民歌的形式又使得其读来琅琅上口，给人以雅俗共赏的感受。因此，许多中国人关注该文，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翻译成不同的中文译本。

2.2《金云翘传》(节选第 655 句—755 句)译文分析

2.2.1 黄译版

伤心少女、老人，见面时，千行血泪情难忍。

养育女儿，总望她命途安稳。

“苍天残酷！谁诬陷，使我家散人分？

刀斧残害我身，忍再见，爱女堕落风尘。

自恃不如一死，尤胜冤屈难伸。”

言罢老泪纵横，冲向灰墙，意图速殒。

吓得大家往前施救，情难忍，翠翘劝慰殷勤：

“自恨女儿身，未曾点滴报答亲恩。

上书有愧缇萦，窃比李娘孝顺。

椿萱鹤寿年高，支撑万叶千枝，还靠树身独在。

我如不忍离去，难免风雨摧残，同归于尽。

唯有自我牺牲，花谢了，留得枝叶长存。

我将顺从命运，比作昙花一瞬。

请您别费心机，全局定，千言万语成空论。”

王翁欲与无言，相看惟有泪涟涟。

门外站着马监生，礼帖写就，聘金亦已付清。

恨月老无情，错把鸳鸯点。

万贯腰缠，能把是非黑白随时变。

钟公也预早安排，钱到手，便了结官府诉件。

家事暂时安顿，离家日期不远。

孤灯下，她含愁独坐，愁催鬓短，泪满襟前。

她默想：“时乖命蹇，最伤心，盟誓负当年。

使他受尽千般苦，只为当时情意缠绵。

共饮的金杯仍在，只是，今日事逐情迁。

为问辽阳多少路？怎知家庭离散，把我牵缠？

缘债未尝，劫数尽，好梦难圆。

他生未卜，结草含环了愿，

情债难填，九泉下，永劫含冤。”

万种愁思缭绕，油尽灯昏，泪滴鲛绡。

惊醒翠云春梦，残灯下，轻声问道：

“世事沧桑，家庭灾难，凭你一肩挑。
底事残更独守？想来你别有隐痛心焦？”
翠翘答道：“忍住辛酸泪，百结情丝缠绕。
羞难启齿，待无言，又深负个郎盟好。
请稍待，再有片言相告。
相思情不尽，望吾妹，代续鸾胶。
自从我会见金郎，真实题诗消永日，把酒度良宵。
不了风波磨折，今日须兼顾：尽情尽孝。
你幸福的时光正远，骨肉情亲，敢望你为我效劳。
我粉骨碎身，九泉下犹当含笑。
一股金钗，一幅云笺誓约，望你珍藏永葆。
他日李代桃僵，结成夫妇，念及我生前薄命。
人已渺，心长在，虚琴挂，还有炉香，只是灰灭烟消。
有一日，你也许——香炉坐对，琴谱重调。
往门外，芳林绿草间，风动处，将是我的鬼魂归来。
终身盟誓永难忘，憔悴尽，情债也当还掉。
夜台阻隔见无音，望你清水一杯凭吊。
今日镜破钗分，万种恩情，好凭谁告。
请你，代我跪向情郎，恕往日离多乐少。
怎知命薄如斯？只赢得，花落水流空懊恼。
金郎，金郎！”

黄轶球教授学贯中西，博览古今，是我国著名的越南文学研究专家。从选段中的翻译内容来看，先生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很深，把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典故翻译得非常到位，而且诗句字里行间透着一定的格律，采用了与原作很相近的唱咏形式，以描述翠翘与王翁和翠云的对话内容来表达翠翘在选择卖身救父时的心情，及其负盟后托妹续缘的无奈心理。但是，由于先生并不通晓越南语，因而在翻译时参照的是非越文版（“字喃本”），在字词翻译的准确性上稍有欠缺。

2.2.2 祁译版

老父娇儿见面伤心，王员外禁不住纵横血泪：养育儿女望将来，儿女成家结对。

“老天为何如此残酷无情？是谁诬陷我骨肉分离？刀斧加身又何惧，折磨儿女更是讨伐老人苦命！

反正早晚都走的黄泉路，不如先去，免得钢锥刺心！”一番话痛得满屋泪下，王翁一头撞向了墙壁。

众人七手八脚拦挡住，翠翘上前委婉安慰：“自恨生就女儿身，幼稚未能报答养育深恩。

愧不及缇萦上书救父母之功，亦不输李寄卖身供父母之举。父母要是鹤寿年高，一棵大树能支撑多少枝叶。

虽然父母舍命是爱惜儿女，风雨之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倒不如牺牲了女儿一个，花虽萎地能换得叶绿枝青。

命运如此只好听由天定，豆蔻未成就算一朝夭折。盼父亲万不可枉费心机，家破人亡终究无补于事。”

王翁听罢无言以对，父母相对泪流满面。门外站着马监生，等候王翁画押才肯交割银子。

恨月老太过无情，赤绳不缚有情人，随意误认终生。只要手中把握有金钱，颠倒黑白是那样的容易。

终公出面帮助斡旋，礼金送上，诉期勾销。家事暂时安顿妥当，婚期订下催促早日启程。

陪伴孤灯翠翘一人独坐，衣襟染泪，云鬓挽愁：“薄命，任命，命该如此，最伤心辜负了百年盟誓。

时乖命蹇艰难知有多少，如漆似胶偏叫劳燕分飞。花前盟约香烟袅袅眼前，负盟失约对花残酷无情。

辽阳道路迢迢山水阻隔，不曾想从此后我抛弃家园。多少情缘宿债，今生就此了结。

来生若能有缘，做牛做马也当报答。情债未及偿还，九泉之下永劫含冤。”

情仇离恨缠绵悱恻，油尽灯昏泪湿鲛绡。翠云春梦惊醒，残灯下细声询问姐姐：

“天机难测桑田变幻，一家重担压在姐姐的肩膀。为什么还枯残更？万千心事能否让妹妹分担？”

“心中百愁郁结，情缘未了抽出思量。儿女情长羞于启齿，欲待不言又辜负深情一片。

不得已托付贤妹听姐一言，妹且坐下接受姐姐一拜。半途卸下相思的担子，鸾胶再续唯有指望贤妹。

自从踏青邂逅了金重，白日里馈赠订约，月光下举杯盟誓。不曾想风雨飘摇遭变故，孝与情进退维谷难两全。

贤妹青春来日方长，念血肉挚情，代姐履百年盟约。姐纵然骨化形销，含笑九泉依然感恩念情。

一股金钗，一幅锦笺，见证了我和金生的一段情缘。他日你们夫荣妻贵，顾怜薄命人不会轻易忘记。

人纵去亦有些须信物，一把胡琴，一点炉香。日后倘若接到凶信，焚点炉香，抚我胡琴。

那时草动叶摇，风起处是你姐姐显灵。香魂负累万千誓言，蒲柳枝灰飞烟灭亦珍重梅竹深情。

夜台阻隔无法见面言语，望贤妹能够多祭祀水酒一杯。今日已经钗段镜破，万千恩爱如何尽诉衷肠！

把一切尽付托贤妹，情缘短长不过如此。翠翘啊为何命薄如白纸，从此后落花飘萍随波逐流。

金郎！金郎！”

祁广谋教授很早就开始诵读并研究《金云翘传》这部作品，从选段的翻译内容可以看出，祁译版的内容更为详实，翠翘、王父等人的音容笑貌，在作者有意识的增补之下，显得更加有血有肉，其负盟后的认命和无奈也更真切，但在保持原文的叙事诗风格上却略有逊色，其采用的新诗形式虽然读起来琅琅上口，然而韵味有失。

2.2.3 赵译版

可怜，父已年迈女尚小，望翘儿，老父心如刀绞。“身为父母，谁不冀望儿女前途，婚嫁之事，唯愿姻缘美满幸福。

苍天啊，你为何如此狠心？一桩冤案，拆我骨肉分离？斧钺无情，哪管风烛残年，女儿受苦，为父心痛万般。

迟早都是一死，死亦各有其数，与其痛苦折磨，不如黄泉早赴！”老翁边说边涕泪纵横，一头朝墙撞去，欲了残生。

众人又拉又拽忙阻拦，翠翘在耳边轻声劝慰：“自恨生就女儿身，幼稚未能报答养育深恩。

缇萦上书，儿已自愧不如，怎可再逊李寄舍身救父？父鹤寿年高，似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全凭主干撑护。

父若不忍割舍骨肉之情，一旦风暴袭，家破业亦倾。索性，舍弃女儿一身，花儿虽凋谢，枝叶尚可存！

是福是祸，只能认命，权当是儿子折不幸。事到如今莫迟疑，谨防家破伤身体。”

听女儿一席话，说得至情至理，王翁泪流满面，妇女相视无语。此时，门外边马监生已到，签字画押毕，方把银钱交。

月老为何如此无情？不看不选乱牵红绳！只要谁的手中有钱，颠倒黑白又有何难！

全靠钟公倾力相救，心诚礼到诉事方休。这里，家变甫告平息，那边，

频频催促迎娶。

少女夜无眠，唯与灯相伴，泪湿鲛绡透，愁拨云发乱。“命运该如此，不得不认从，唯念盟誓未履，叫我心痛。

他费尽苦心，对我一片真情，是我多顾忌，害他追求成空！盟誓金杯，酒尚未干，誓言已负，情何以堪！

望辽阳，山高水深遥相隔，想不到，鸳鸯散尽因我！三生缘债，金石誓言，已无望偿还和履行！

冀来生，情缘香火若未冷，甘愿为牛马，定报梅竹情。若未偿此情缘债，愿携君情赴泉台！”

愁思缠绵，欲理还乱，泪湿绞绡，油尽灯干。梦中，翠云突然惊醒，灯下，殷勤询问究竟：

“世事难料，沧桑多变，家遭难，竟让姐姐一人蒙冤！时已夜深更惨，缘何在此独坐？姐姐有何心事，可对妹妹诉说？”

翠翘道：“心中忧虑难安，皆因情丝牵缠。说出口，实在是羞愧万般，藏于心，又恐负真情一片。

今有一事相托，万望妹妹勿辞，先受姐姐一拜，再将实情告知。相思之线中途折断，拜托妹妹代续情缘。

自从与金郎相遇相知，曾扇面题诗，月下盟誓。谁料想，风云突变，情与孝，实难两全。

妹之青春岁月尚长，望念手足情，代姐履盟章。纵然是，身已成土骨成泥，姐亦九泉含笑，欣得慰藉！

金钏和誓笺为定情之物，这份姻缘，拜托妹妹守护。何时你我共良辰，勿忘黄泉薄命人！

人虽已去，信物尚存，残香片片，琴弦根根。将来不管在哪里，何时间，每当你们再焚香，重调弦，

请留心，观察树叶或草尖，见有微风习习，便知姐姐还。此魂尚负月下金石重盟，纵碎蒲柳身定报梅竹情。

无奈冥阳两隔不相闻，请洒清水一杯祭冤魂。如今，虽已破镜钗两分，然爱恩之情怎能诉尽！

千百次，深情满怀寄金郎，叹你我情缘仅此短暂一场！无奈这如纸的薄命，落花只能随水飘零。

金郎啊，我的知音。”

赵教授从事越南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多年，从选段可看出，她以古体诗为主，兼以带有一定“古味”的自由体诗的形式来翻译原文，恰到好处地兼顾了

原文诗性的典雅和对话的直白。此外，作者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还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笔调含蓄而贴切地传达诗句的情感与温度，如“少女夜无眠，唯与灯相伴，泪湿鲛绡透，愁拨云发乱。”等诗句不仅翻译传神，而且将翠翘在此处那种孝、情两难全的无奈烘托得更加淋漓尽致。

2.3 原文和译文的比较及译文与译文的比较

2.3.1 原文和译文的比较

首先，从创作的形式及思想内容来看，原文采用擅长于叙事和抒情的带有越南民族特色的六八体诗，用简洁凝练的文字表达了翠翘在情与孝之间不得不选择孝的无奈，以及负盟后托媒代续情缘的苦闷。译文版都很好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内容，但创作形式并不一致。黄译版采取的是尽量保持原文风格的近体格律诗，原文的唱咏风格及创作形式得到了很好的保留。祁译版采用的是新诗，虽然不再有六八体诗的韵律美，但格式也还算整齐。赵译版则是以古体诗为主，兼以带有一定“古味”的自由体诗的形式，原文简洁明快的民族风韵虽不再，但别有一番古为今用的风味。

其次，从语言风格来看，以六八体写作的原文既有借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故也有简单直白的对话描述，还有近似呼喊的感叹，可谓是雅俗共赏之作。黄译在用词方面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基本上以直译的手段将原作呈现。祁译版和赵译版虽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原文的民族语言风格，但用词更现代化，更有助于当代读者的接受和理解。

2.3.2 译文与译文的比较

一般来说，译本的比较有平行比较和复译比较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出现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而后者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时期出现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文也将其分为两个层次进行比较。

其一，平行比较，即祁译本与赵译本的比较。暂且以选段中第 657—658 句为例，

祁译本是：“养育儿女望将来，儿女成家结对。”

赵译本是：“身为父母，谁不冀望儿女前途，婚嫁之事，唯愿婚姻美满幸福。”

从语言表达上看，祁译本更加简洁明了，但赵译本却更具体，更易于理解。从翻译策略来看，祁译本采用的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赵译本以意译为主。从思想主题的表达来看，两个译本都忠实于原文，未有偏离。

其二，复译比较，即黄译本与祁译本和赵译本的比较。试举第 673—674 句为例，

黄译本是：“椿萱鹤寿年高，支撑万叶千枝，还靠树身独在。”

祁译本是：“父母要是鹤寿年高，一棵大树能支撑多少枝叶。”

赵译本是：“父鹤寿年高，似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全凭主干撑护。”

从语言表达上看，黄译本最为简洁并富有古风意味，风格与原文更趋一致；而祁译本有点受越语原文束缚，虽表达了意思，却没有体现原文的韵味；赵译本则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用了巧妙的比喻，增添了译文的色彩，但对原作风格的把握稍逊。从翻译策略来看，黄译本与赵译本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而祁译本是直译的。从思想主题的表达来看，三者的表达内容都一致，只是黄译本和赵译本更直观，而祁译本相对委婉。

2.4 评价译文的质量

评价译文的质量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译者的角度出发；二是从批评者的角度出发。首先应当运用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标准衡量译文的相关准确性和实际准确性，前者是指译文对原文而言，后者是指译文对其读者而言。

首先，笔者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价。以选段中第 723—724 句为例，

黄译本是：“请稍待，再有片言相告。”

祁译本是：“不得已托付贤妹听姐一言，妹且坐下接受姐姐一拜。”

赵译本是：“今有一事相托，万望妹妹勿辞，先受姐姐一拜，再将实情相告。”

从例句中可以看出祁译本和赵译本中都有“一拜”的译文，而黄译本却没有，这就不得不对译者进行考究。为何黄译本会出现这一漏译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黄铁球教授并不通晓越南语，而且其翻译依照的版本是非越文版（“字喃版”），因此对原文的把握稍有偏颇，出现漏译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祁广谋教授和赵玉兰教授通晓中、越两种语言，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会更准确些。

其次，从批评者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评价。笔者探索性地从文章翻译的相关准确性和实际准确性以及读者的接受度来进行判断。试以选段第 749—750 句为例，

黄译本是：“今日破镜钗分，万种恩情，好凭谁告。”

祁译本是：“今日已经钗断镜破，万千恩爱如何能尽诉衷肠！”

赵译本是：“如今，虽已镜破钗两分，然爱恩之情怎能诉尽！”

从准确度来看，三个版本的译文都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和思想；从读者接受度来看，黄译本古韵犹存，既符合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当时读者群的审美情趣。祁译本和赵译本相对繁复一些，但内容详尽，便于 21 世纪的读者理解，尤其是赵译本根据译文及读者解读的需要，在翻译时还加入了转折连词“然”，使得原文思想感情的抒发更加自然、合理。此外，由于越南的《金云翘传》是取材于同名的中国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因此可以说中越版《金云翘传》所传达的文化也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

2.5 分析判断译本在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中的存在价值

在谈到译本在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中存在的价值，笔者不得不谈及原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译本在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存在价值以及读者对译作

的接受，正如安德列·勒菲弗尔所认为的一样，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译文读者看得懂。

众所周知，越文版《金云翘传》是越南黎朝末年阮朝初期的著名诗人阮攸采用青心才人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进行重新构建和艺术再加工，把它改写成喃文六八体叙事长诗的。其所描述的社会背景以及表达的思想价值观念都有中国文化的烙印，这就为中国读者对译作的接受提供了便利，就像林明华教授所说“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活动中，‘接受屏幕’具体表现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它有着求同排异的定向作用。如作品提供的信息与欣赏主体的期待视野认同会通则为主体接受，反之则被拒绝”（林明华，2002: 219）。至于三个译本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存在价值，我认为其最大的价值是达到了中越两国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目的。其中，黄译本作为国内第一个译本，在当时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不仅为中国文艺界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而且为促进中越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大贡献。其后的复译本对中越文艺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读者群相对狭小一些，主要为研究中越文学或学习两国语言文字的人。

3. 结语

通过研究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通过对《金云翘传》（节选）的译文与原文、译本与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及分析可知，不同时代的译者，由于各自的文化素养、知识水平结构、翻译经验等的差异会对同一篇文章有不同的理解，从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来翻译原文，产生了不同的译本。黄译本不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保持得很到位，而且对富有文化内涵的典故添加了注释，只是由于参照版本的不同和对越南语的不通晓，才导致了某些错译或漏译；祁译本相对于黄译本而言，采用了直译与意译结合的策略，提高了译文的准确度，并在思想内容上与原文神似，但没有将原作的韵律美和诗意表达出来；赵译版相对于前两个版本而言，是目前相对理想的译本，其采用以古体诗为主，兼以带有一定“古味”的自由体诗的形式进行的翻译，不仅使文章整体上句式工整，语言流畅，尽量做到了与原文一致的形式美，而且准确度近一步接近原文，还移情入译文，主观能动地加入了少许连接词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只是在保持原文越南民族语言文化的韵律美和节奏感上还略逊色。

第二，翻译作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语言的发展、各国文化交流的增多，翻译作品将会越来越多，经典名著的复译也就显得更加必然且重要，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即使已有好的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鲁迅，1935）。我们从三个中文译本的比较上也可以看出，最新的复译本更符合现代读者的审美，而且翻译质量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就说明，随着语言和时代的变

化，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译者、读者的变化，乃至语言体系的变化，都会促使新的符合读者期待的复译本的产生，这将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第三，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需要翻译批评的参与。但目前，文学翻译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而且翻译批评的批评者的批评活动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他们凭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及相对的评价标准来评价，评价结果很难做到客观和公正，那译本的比较分析还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译本的比较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分析译本的差异来领略不同译本的优秀之处，从而学习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提高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 [1] (越) Nguyễn Quang Tuân (Khảo định và chú giải): *Truyện Kiều* [M],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1997.
- [2] (越) 阮攸 . 金云翹传 [M]. 黄轶球译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9.
- [3] (越) 阮攸 . 金云翹传 [M]. 罗长山译 . 河内 : 越南文艺出版社 , 2006.
- [4] (越) 阮攸 . 金云翹传 [M]. 祁广谋译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011.
- [5] 赵玉兰 . 金云翹传翻译与研究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3.
- [6] 林明华 . 越南语言文化散步 [M]. 香港 : 开益出版社 , 2002.
- [7] 刘宓庆 . 文化翻译论纲 [M]. 武汉 :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999.
- [8] 许钧, 穆雷 . 翻译学概论 [M].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09.
- [9] 刘树森 . 纽马克的翻译批评理论简析 [J]. 中国翻译 , 1992 (2): 49-53.
- [10] 鲁迅 . 非有复译不可 [J]. 文学月刊 , 1935 年 4 月第四卷 .

《口腔医学语言的学习——学科语料库在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评介

肖庚生 姜会敏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近年来,学科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是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有益探索。《口腔医学语言的学习——学科语料库在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基于自建学科语料库,通过对多种体裁文本的考察,揭示了口腔医学学术英语语言特征,探讨了语料库平台在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该书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研究方法与工具多样化等鲜明特点,对我国专门学术英语教学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学科语料库;口腔医学语料库;专门学术英语

A Review of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ntistry: Disciplinary Corpora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XIAO Gengsheng JIANG Huimin

Abstract: Th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sciplinary corpus has been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 (ESAP)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self-built corpora,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ntistry: Disciplinary Corpora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ademic language of dentistr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texts and also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ntistry corpora in ESAP teaching. The book integrate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and tools in a variety of ways, which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ESAP in China.

Key words: disciplinary corpus; dentistry corpus;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社科基金项目“中外作者英文论文语体的多维对比研究”(编号:18WLH33)、湖南省普通高校育厅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体特征的发展规律及对策研究”(编号:2017/229)、湖南省教科研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外学术期刊英文摘要语体多维度多特征对比研究”(编号:20C1583)及南华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课题“基于 MD/MF 的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语体特征考察”(编号:2018JG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肖庚生,男,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和学术英语研究。

姜会敏,女,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0. 引言

在完成通用学术英语学习后，学习者需要及时进阶到与特定学科领域相关的专门学术英语学习，掌握与特定学科专业相关的语类、修辞、元话语和语体知识，培养运用学科知识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蔡基刚，2018）。学界已就专门学术英语的教学内容、手段、模式等展开诸多探索，其中学科语料库的应用被认为兼具可行性与实效性（Charles, 2012；Krishnamurthy & Kosem, 2007）。将学科语料库引入课堂显性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能有效促进学习者对特定学科文本语言特征的规律性认识（李忠华，2015）。在此背景下，彼得·克罗斯威特与张丽莎（Peter Crosthwaite & Lisa Cheung）基于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合著《口腔医学语言的学习——学科语料库在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ntistry: Disciplinary Corpora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一书，经约翰·本杰明（John Benjamin）出版公司推出，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口腔医学专门学术英语语料库研究及教学应用的新视角与新方法，以期为专门学术英语课程资源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1. 内容概述

该书由著名应用语言学家肯·海兰德（Ken Hyland）作序。在序言中，他指出将语料库应用于口腔医学学术英语教学具有两大功效：其一，为师生提供丰富、鲜活的目标语言资源，让其接触到自然、真实的语料，而非虚构的语例；其二，促进教学由知识传授式向引导发现式的转变，推动学生自主学习与反思性学习能力的培养。该书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到第七章为全书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二至四章为第一部分，旨在解决如何创建和分析口腔医学专门学术英语语料库的问题；第五至七章为第二部分，旨在解决如何利用语料库研究成果开发教学资源的问题并实现教学创新。

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本书旨在解决当前棘手的教学实际难题，即为香港大学牙医学院重新设计口腔医学学术英语本科课程。接着，作者对专门学术英语（ESAP）、通用学术英语（EGAP）、学术用途英语（EAP）和专门用途英语（ESP）进行了概念界定。作者进而阐明了口腔医学学术英语课程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最后，作者简要介绍了全书主体结构及各章节主要内容。

第二章重在考察口腔医学实验研究论文的语言特征。研究者从口腔医学与全科医学领域顶级期刊中各选取实验研究论文 100 篇，分别创建口腔医学实验研究论文语料库与全科医学实验研究论文语料库，运用两种多维度分析法（MDA）进行跨库对比：其一，基于比伯（Biber, 1988）的多维度框架，考察两个语料库在 5 个最具解释力的语言维度上的差异，即：交互性与信息性表达、叙事性与非叙事性、指代明晰性与情景依赖型指称、显性劝说型表述、抽象与非抽象性；其

二，根据研究需要重新选取语言特征进行因子分析并识别出新的维度。研究发现被动语态的使用在医学实验研究论文中具有普遍性，但在口腔医学领域更明显；在汇报实验结果时，口腔医学领域更高频使用从属连词 while 或 whilst。研究者还使用统计软件对数似然率计算器（Log-Likelihood Calculator）进行卡方检验，从而提取口腔医学实验研究论文主题词共计 912 个，通过语义归类，作者发现其多与口腔病况相关。最后，研究者借助图形可视化软件散点图（Scattertext）生成了可供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使用的主题词表。

第三章对比分析了口腔医学专家与学习者研究报告语体特征，并诊断学习者研究报告撰写的困难与不足。作者首先使用比伯（Biber, 1988）多维度分析法，提取专家与学习者研究报告语料库中 5 个语言维度；接着使用文本和图像语言标注的工具集（UAM Corpus Tool 3.3）对比两类研究报告中模糊限制语（hedging）、强调语（boosting）和自我提及语（self-mentions）的使用频率；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进一步验证多维度分析结果。研究发现：（1）学习者研究报告更具叙事性、说服性和试探性；专家研究报告避免了上述语言特征，写作内容因此更详实、客观、权威；（2）学习者在研究报告写作时惯于对自己观点进行模糊和强化，同时在论证某些观点时，会显得既谨慎又自信，而且常会自我提及；（3）学习者研究报告更多使用叙事相关修辞特征及有灵指称（animate referents）。最后，研究者指出，基于语料库的中介语对比分析结果尚须在教学中加以验证。

第四章采用情绪分析和认知引擎软件（SEANCE），对口腔医学病例报告与实验研究论文中积极和消极词汇特征进行跨库对比，从而帮助新手专家或牙医更好理解和使用口腔医学学科中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研究发现，与实验研究论文相比，病例报告涵盖更多消极形容词、积极名词和动词，以及与幸福感、恐惧和厌恶情绪相关的词汇。作者通过使用语义标注系统（UCREL）和语料分析工具（Wmatrix），对比口腔医学病例报告与英国国家笔语样本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Sampler Written），提炼出口腔医学病例报告中 25 类明显有别于普通书面语的语义子域，包括药物和医疗（medicines and medical treatment）、健康与疾病（health and disease）、解剖与生理（anatomy and physiology）等。研究者进而采用图形可视化软件，将口腔医学病例报告与实验研究论文语料库进行跨库比较，发现口腔医学病例报告呈现出与实验研究论文近似的牙本质、下颌和咬合等主题词特征。作者指出，该研究成果可应用于口腔医学学术写作教学，但其有效性待进一步探讨。

第五章将焦点转向如何将口腔医学语料库应用于专门学术英语教学，实现由“以学促写”到“以写促学”的转变。研究者创建了一个全新、多功能、高度可视化的语料库查询平台。该平台语言资源丰富、详实，涵盖口腔医学领域实验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病例报告等不同体裁文本。在教学方法上，学习者可利用重

新设计后的语料库查询平台作为数据驱动学习（DDL）的一部分。在语料库驱动教学中，教学材料和技术创新是关键，教师既要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工具支持，亦需引导学习者在面对浩瀚的语言资源时如何自主决策，以推动他们学科写作、语言与内容学习的主动建构。

第六章聚焦于学习者与专家在学科写作目的驱动下的语料库查询行为、习惯及主要检索的信息，考察其如何通过语料库来解决自身的语言问题。研究首先对学习者实施问卷调查，了解其写作时使用计算机与参考工具的情况，随后利用语料库平台对学习者语料库使用行为进行追踪和分析，获取以下参数：（1）用户名；（2）用户登录时间、日期和持续时间；（3）个体语料库查询语法；（4）应用于语料库查询结果的过滤器（即按论文分章查询）；（5）语料库功能（即索引、频数分解等）。对比 10 个高频用户学习者语料库和专家语料库词汇搭配和频数分解等方面发现：（1）词汇搭配在学习者语料库查询中使用更为常见，而频数分解功能则在专家语料库中使用更为广泛；（2）与专家语料库相比，学习者语料库的使用者在查询语料库时所采用的语法字符串更具类别多样性。最后，研究者通过个案分析对语料库用户的学习活动日志进行定性考察，在此基础上将数据驱动学习者分为 4 种类型。

第七章对基于语料库的口腔医学专门学术英语研究及教学应用进行了归纳与反思。作者以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方式获取两位学习者、两位教师与一位专家对数据驱动学习的反馈意见。两位学习者一致认为该库要比一般的搜索引擎更具优势，且提出该语料库的应用应早于第五年学位课程；两位教师均认为，应在第一或第二学期尽早向学习者介绍该语料库，以增强学习者在后续课程学习中使用语料库的动机。此外，他们还认为，可将课程手册中的语料库任务转移到网上，学习者可通过课程管理平台（Moodle）获得即时反馈，以突显该语料库的关键作用；口腔医学专家则对数据驱动学习的教学价值和语料库查询平台在“以写促学”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作者剖析了各类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劣，指出现有的研究主要涉及词汇、语法等较低层面的语言特征，并对其向语篇或体裁层面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前瞻性预测。

2. 简要评价

该书作者彼得·克罗斯威特与张丽莎（Peter Crosthwaite & Lisa Cheung）现分别任教于昆士兰大学与香港大学，他们多年来潜心于语料库语言学、数据驱动学习和专门学术英语研究，理论成果丰硕，同时在语料库学习资源开发及其与课程教学整合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口腔医学语言的学习——学科语料库在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一书作为二位作者多年来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集大成之作，呈现以下两大特色：

其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研究渐趋兴盛，借此获得特定学科专业学术文本词汇、词块、语法等语言特征使用频率与分布信息，形成对其语类、修辞、语体规律性认识（Hyland, 2015）。学术英语语料库研究成果对教学的指导与参考价值已被广泛认同（Flowerdew, 2015），但迄今为止，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脱节仍较严重。该书从3个方面弥补了这一缺憾。第一，全书理论篇与实践篇布局并重。第二至四章为专著的理论部分，基于语料库对口腔医学实验研究论文、专家和学习者研究报告、病例报告进行考察，提炼口腔医学文本语言特征。全书第五至七章为专著的实践部分，考察语料库研究成果在口腔医学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包括教学资源开发、教学平台搭建、数据驱动学习、教学效果评价等。第二，全书既有理论高度，亦有实践广度。该书在语域变体理论与中介语理论框架下，对不同体裁、不同身份作者的口腔医学学术语篇进行跨库对比与分析，从高屋建瓴的理论视角，形成对学术英语宏观维度与微观特征的规律性认识。该书对教学实践的探讨涉及诸多环节，涵盖语料库教学材料生成、语料库查询平台创建、学习策略指导、学习过程监控和教学质量反馈。第三，全书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该书的初衷即为解决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口腔医学学术英语教学存在的困境，研究者开展的3项语料库研究的成果不但对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教学平台的搭建提供了素材与参考，而且对学术英语教学中词汇、语法、语类、修辞、语体知识的讲授具有借鉴意义。同时，通过对学习者数据驱动学习的多方位考察，准确诊断了其学术英语产出中语言使用在微观层面与宏观维度上的不足，验证并充实了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研究。

其二，研究方法与工具多样化。该书两位作者在语料库语言学、专门学术英语及数据驱动学习研究领域造诣颇深，擅长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注重对研究结果的三角互证。首先，作者在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研究与实践中，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灵活、恰当地使用多元研究方法。作者先后运用多维度分析法及因子分析法，旨在考察口腔医学与全科医学实验研究报告语体特征的异同；综合运用中介语对比分析法与多维度分析法，对专家与学习者研究报告语体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运用情绪分析法，对病例报告与实验研究报告的词汇情感色彩及主题词进行对比分析；运用教学实验方法，展开数据驱动学习；运用个案分析法，考察学习者语料库学习行为；综合运用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法，获取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教学评价信息。其次，作者基于研究需求，充分挖掘新兴技术，使用多样化的软件工具。该书中口腔医学学术文本分析工具包括：文档格式转化工具（Antfile converter）、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词性赋码器（POS taggers）、句法分析器（Syntactic parsers）、多维度分析赋码器（MAT）、情绪分析和认知引擎软件（SEANCE）、文本和图像语言标注的工具集（UAM Corpus Tool）、语义标注系统（UCREL）、语料分析工具（Wmatrix）、图形可

视化软件散点图（Scattertext）、文本修辞特征识别软件（DocuScope）等。该书中基于语料库的口腔医学学术英语教学研究工具包括课程管理平台（Moodle）和在线效果图（Sketch Engine）检索工具等。总之，该书作者对研究方法与工具的多样化使用令人耳目一新，对未来专门学术英语研究方法极具启发性。

诚然，该书也存在些许不足之处。首先，该书基于语料库对口腔医学学术英语的研究主要涉及词汇和语法层面，对于更宏观的修辞、语篇等层面的分析力度还不够。其次，口腔医学学术英语学习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纵向研究更能揭示语言学习规律。该书以横向对比考察为主，虽有历时研究的尝试，但尚不充分。最后，尽管该书对基于语料库的数据驱动学习模式进行了探索，但针对该教学模式下学习者学术写作中词汇、语法乃至语篇等层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自动反馈，如何有效提供教师书面纠正性反馈等问题，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3. 结语

《口腔医学语言的学习——学科语料库在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是首部基于语料库的口腔医学学术英语研究与教学专著，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既厘清了口腔医学领域实验报告、研究报告、病例报告等重要体裁的语言特征，亦探索了基于语料库的教学资源开发、教学平台构建及数据驱动学习。该书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前沿、多元、精当，为语言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该书前瞻性强，在当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如火如荼，而专门学术英语教学尚在泥泞中彷徨的大背景下，该书倡导的学科语料库创建、研究与应用理念将引发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注与思考，从而推动我国专门学术英语教学迈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 [1] Biber, D.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 Charles, M. “Proper Vocabulary and Juicy Collocations”: EAP Students Evaluate Do-It-Yourself Corpus-Building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2, 31(2): 93-102.
- [3] Crosthwaite, P. & L. Cheung.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ntistry: Disciplinary Corpora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 [4] Flowerdew, L. Corpus-Based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EAP: From Lexis to Genre [J]. *Language Teaching*, 2015, 48(1): 99-116.
- [5] Hyland, K. Corpora and Written Academic English [A]. In Biber, D. & R. Reppe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92-308
- [6] Krishnamurthy, R & I. Kosem. Issues in Creating a Corpus for EAP Pedagogy and Research [J].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7, 6(4): 356-373.
- [7] 蔡基刚. 中国高校实施专门学术英语教学的学科依据及其意义 [J]. 外语电化教学 , 2018 (1): 40-47.
- [8] 李忠华 . 基于功能语域理论视角的大学分科英语教学 [J]. 外语界 , 2015(3): 25-32+50.